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碩士學位論文

指導老師：吳佩珍教授



吳濁流的大陸經驗及其相關作品研究

研究生：白筱薇

中華民國 102 年 9 月

摘要

日本殖民統治末期（1937-1945）中，因為日本政府所倡導的「戰爭動員」等政策與台灣所具備的地理位置優勢，台灣逐漸成為中日戰爭中協助日本政府的「協力者」。當時部分台籍作家，在這段時間中曾因各種原因，選擇前往大陸生活。這群擁有大陸經驗的作家皆是出生於日本殖民時期（1895-1945），受日式教育的「日語世代」。他們對於中國大陸的印象大多建立在長輩傳達的觀念，模糊卻帶有憧憬。他們前往大陸後，心中的中國印象與實際接觸的大陸事物之間產生了落差。因此他們對於中國大陸的觀感或是戰後（1945-）強調的「祖國」認同感受，比起未離開過台灣的作家們顯得更為深刻且不同。

本文以吳濁流 1941 年至 1942 年之大陸經驗為例。透過戰前報紙《大陸新報》、戰前作品《南京雜感》與《胡志明》，觀看吳濁流的大陸生活。並透過戰後初期小說《波茨坦科長》及戰後回憶錄《無花果》與《台灣連翹》中涉及大陸經驗的內容，釐清大陸經驗「再現」於作品中的含意。以期檢視吳濁流前行研究的缺漏，補足這段研究者忽略的大陸經驗。

關鍵詞：大陸經驗、大陸新報、胡志明、南京汪精衛政府

目錄

| | |
|---|-----|
| 第一章 緒論..... | 1 |
|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 1 |
| 第二節、前行研究回顧..... | 6 |
| 第三節、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 11 |
| 第四節、章節架構..... | 13 |
| 第二章 吳濁流的南京生活（1941-1942）..... | 15 |
| 第一節、大東亞共榮圈下台籍作家的大陸行..... | 15 |
| 第二節、1941-1942年南京《大陸新報》之記者生活..... | 20 |
| 第三節、1941-1942年的南京《大陸新報》..... | 23 |
| 第四節、小結..... | 34 |
| 第三章 返台後大陸生活之相關作品：《南京雜感》與《胡志明》（1942-1945）..... | 37 |
| 第一節、《南京雜感》的發表情形與刪略特點..... | 37 |
| 第二節、批判社會問題的負面描寫..... | 50 |
| 第三節、對中國社會的反思與敏感議題..... | 60 |
| 第四節、小結..... | 72 |
| 第四章 大陸經驗之戰後相關作品探討： | |
| 《波茨坦科長》（1948）、《無花果》與《台灣連翹》（1968-1973）..... | 75 |
| 第一節、《波茨坦科長》中的大陸觀感..... | 76 |
| 第二節、回憶錄之再現與含意：《無花果》與《台灣連翹》..... | 88 |
| 第三節、小結..... | 102 |
| 第五章 結章..... | 105 |
| 參考資料..... | 111 |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歷史上以「日治末期」、「日據末期」或「戰爭期」等名號所指稱的日本殖民統治末期（1937-1945）中，因為受到中日戰爭（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開始，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接受波茨坦條約、宣佈無條件投降為止）影響所發展出的「戰爭動員」意識——殖民者日本向被殖民者傳達，使之透過身體（親上戰場）或書寫（戰爭文學），達到「協力」（宣傳）戰爭的功效——因而影響了當時身為殖民地的台灣。當時因為日本政府所倡導的「戰爭動員」、「協力戰爭」等政策與口號，與台灣本身具備的地理位置優勢，台灣逐漸發展成為中日戰爭中協助日本政府的「協力者」。

在此時空下的1937至1945年間，因時勢所需及殖民政府的大力推行等因素，文學作品已不似1920與1930年代般集中探討反抗日本政府的殖民壓迫與控訴，而是以「協力者」的姿態存在。文學史通常將此時期冠以「皇民文學」的範疇，單從作品題材及文本內容來觀察，此傾向更為明確。舉凡「大東亞共榮圈」口號、日本帝國主義、協力戰爭、南進政策等，呈現濃厚的戰爭氛圍。然而此時期中，並非所有的文學作品皆呈現此種表現形式，1940年之後開始出現了以「大陸生活」為題材的文學作品。

當時部分台籍作家，在中日戰爭爆發後至日本殖民結束前（1937-1945），曾因各種原因，選擇前往大陸生活，這情形於1937年之後開始頻繁出現¹。筆者觀察所見，台籍作家因語言優勢（日語能力）以編輯、記者等職業在大陸生活。停留一段時間後開始將自身的大陸生活反映在作品上，因而導致相關作品多於1940年後出現。而根基於作家實際大陸生活經驗而來的作品有著兩種表達形式：第一種為作家於生活在大陸期間，將其所見所聞即時寫下；另一形式則是作家離開大陸後採取「回憶」方式撰寫的作品，如回憶錄形式的自傳等。無論發表時間為何，這類作品在內容上往往具備相似的情節，以及呈現相同的矛盾感受。但寫作時間與實際大陸生活時間的落差也成為解讀這類作品時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²。

¹ 筆者意思並非1937年之前沒有台籍作家赴大陸生活。由於本文涉及日本殖民末期的戰爭動員政策，將分析殖民地政策與台籍作家前往大陸的連結，因而將討論時間設於1937年之後。

² 例如王詩琅及其大陸生活相關作品〈沙基路上的永別〉。王詩琅於1937至1946年間停留大陸，但〈沙基路上的永別〉一文卻為1980年發表。大陸生活的時間與文本發表時間，相隔34年。

回顧這群擁有大陸經驗的作家生平，可以發現，他們皆出生於日本殖民時期，從小受日式教育長大，使用日語，生活所見所觸皆為日本事物。對於中國大陸的印象皆是建立在家中長輩傳達的觀念。因為沒有實際接觸的機會，因此顯得模糊疏離。當他們離開台灣，前往大陸生活，因為受長輩傳達的大陸印象影響，在實際接觸了大陸事物後，對於大陸的觀感便形成一種交混的特殊樣貌。這樣交錯地理空間發展出的觀察角度，與同時間（1937-1945）在台灣（未離開台灣）「想像」大陸的台籍人士，以及同時期赴日留學（在日本遙望台灣與大陸事物）的台籍知識份子相比，擁有了另一種不同的解讀視角。因此，以擁有實際大陸生活經驗的台籍作家出發探究戰時體制下的作家與作品，成為「皇民文學」範疇之外，另一種切入角度。

這群被稱為「日語世代」的台灣作家³，在戰後必須面臨重新接受另一個新政權、新制度的建立以及語言轉換等問題。在他們之中，擁有實際大陸經驗的作家對中國大陸的觀感或者是戰後強調的「祖國」認同等感受，比起未離開過台灣的作家顯得更為深刻且不同。部份作家在戰後選擇重新以「回憶錄」形式發表紀錄自身戰前大陸生活的作品，藉回顧實際大陸經驗，來觀看或反思戰後國民政府來台後的種種事件。這類作品的討論通常將討論時序置於戰後初期的社會中，因而開始出現回憶錄形式的自傳作品內容（或是帶有自傳色彩的文學創作）與戰後初期社會（國民黨接收台灣、二二八事件等）連結的現象。因此，直至目前為止，針對「台籍作家大陸經驗」的討論，呈現「缺乏作家實際大陸生活的討論以及大陸經驗的系統性整理」的現象。這與研究資料的缺乏與戰前戰後壁壘分明的研究斷面，以及作家本身文學活動的重心等因素皆有所關聯。其中，吳濁流就是個鮮明的例子。

吳濁流的作品，因寫作內容及出版時間皆集中於戰後的特徵，造成研究焦點幾乎集中於戰後，而缺乏針對戰前活動的討論，此現象促使筆者產生回到吳濁流戰前「視角」的發想，尤其是觀察前行研究中缺乏的大陸生活時期（1941-1942）。希望透過文本及報紙等資料的分析，觀察戰前吳濁流的文學活動，並與其相關作品做連結，進而建立系統性的分析。另一方面，吳濁流作品的研究幾乎呈現集中在孤兒文學、認同、民族等議題的探討的現象，即使吳濁流在敏感的戰爭時期擁有實際前往大陸生活的經驗，但是以「大陸經驗」為焦點的研究卻顯得異常薄弱。這段敏感時期的經驗為何被忽視了？此現象促成筆者對此議題的發想，成為筆者欲探討大陸經驗的動機之一。

一、問題意識

日本殖民末期因為受中日戰爭等時局的影響，以及台灣身為日本「殖民地」

³ 這群擁有大陸經驗，並被稱為「日語世代」的台籍作家，例如：吳濁流、王詩琅、鍾理和等。

位置的特殊性，吳濁流在此時間中選擇前往大陸的原因，必須與當時的社會背景一同討論。根據吳濁流本人所述，他於 1941 年 1 月抵達上海，短暫停留後前往南京，直到 1942 年 3 月回台，前後停留一年又三個月⁴。從時間點來看，前往大陸一事與中日戰爭期間日本政府所推行的「南進政策」有所連結，兩者關係有再檢視的必要。

日本政府推行的「南進政策」從 1895 年領台後旋即開始，根據卞鳳奎說法，共分為四期：**第一期**：1895 年（領台）至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為止，為「搖籃期」。此時期總督府將南進佈局定位於華南，同時計劃擴大貿易；**第二期**：1916 年至 1923 年關東大地震為止，即所謂「日本大正南進期」，布局由華南轉進東南亞；**第三期**：1924 年至 1936 年中日戰爭爆發前，因受到當時日本經濟蕭條等因素影響，出現停滯現象，稱為「停滯期」；**第四期**：1938 年至 1945 年二次大戰（與中日戰爭）結束。涉及戰爭動員、協力、派遣等因素，形成「大東亞共榮圈時期」⁵。

上述第三期南進階段中經濟停滯的現象，可追溯至 1923 年關東大地震發生開始。地震之後，日本的經濟產業開始受到影響，而後 1929 年出現的世界經濟大恐慌以來至 1936 年中日戰爭爆發前，為日本經濟蕭條時期，這股波動連帶影響身為殖民地的台灣，開始出現「失業潮」。日本在經歷此經濟危機後，採取以「區域經濟化」的方法試圖解決經濟蕭條的現象，正因如此，以日本為出發的周圍亞洲地區逐漸形成一個由日本主控的「東亞經濟圈」⁶。而四〇年代後，台灣因地理位置等優勢被日本政府視為協助中日戰爭、實施戰爭動員的「南進基地」。由此可以得知，第四期南進階段「大東亞共榮圈時期」與三〇年代旋即開始的「東亞經濟圈」及而後的中日戰爭等背景皆有所關聯。因此，台籍人士在 1937 至 1945 年中選擇前往大陸的行為便成為中日戰爭下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以吳濁流來看，根據吳濁流本人說法，他前往大陸的原因並非軍方派遣或教育等外在因素，而是自願前往：

…然而時局越發吃緊，沒有勞動力的我，一個人是沒法辦農場的。政府又在動員本島人派遣到海外去，保不定我也會給徵去，就乾脆跑到大陸去

⁴ 吳濁流曾於回憶錄中記載停留大陸的時間共一年又三個月：1941 年 1 月至 1942 年 3 月。其中於〈南京雜感〉中提及抵達上海的時間為 1941 年 1 月 12 日，及抵達南京的時間為 1941 年 1 月 18 日。吳濁流，〈南京雜感〉，收於《吳濁流作品集(4)南京雜感》（台北市：遠行出版社，1977 年 9 月初版），頁 51、54；而《無花果》中則記錄了離開大陸後於 1942 年 3 月 21 日平安抵達台灣。吳濁流，《無花果》（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88 年 8 月），頁 138。

⁵ 卞鳳奎，〈第一章 第二節 台灣總督府對華南之政策〉，《日據時期台灣籍民在大陸及東南亞活動之研究（1895-1945）》（合肥：黃山書社，2006 年 5 月），頁 18-41。

⁶ 林繼文，《日本據台末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係之研究》（台北：稻鄉出版社，1996 年 3 月），頁 41。

吧。……恰在這時，同學章君在大陸，任國民政府高級職位。我馬上給章君去了一信，請他為我弄一章聘書來，用它辦理出境，過了兩個禮拜，護照便下來了。⁷

而前往大陸的意願究竟如何形成？吳濁流在《無花果》中曾言自己抵達大陸後不停的為生活奔波，也為了增加尋找工作機會的能力開始學習中文：

目前我的問題應該是語言，……為了熟悉一種語言，三兩個月是沒法辦到的，至少也得下半年乃至一年苦工。我不禁為之黯然，一時雄心都為之動搖了。加上章君那兒又有好幾個仗著他從故鄉來的人都還在失業。他們已經會講此地的話，還是不易找到工作。……但是如今我是騎虎難下，不能就這樣回臺灣，至少也得先試試，幾經熟慮，我想還是先學中國話。⁸

中日戰爭爆發後，影響著殖民地人民的生活。無論是「失業潮」的影響或是隨時可能親赴戰場的「戰爭動員」政策，都加重了台灣生活的不安定性。對照上述第三期及第四期南進時期推動的重點，與四〇年代台灣殖民社會的背景來看，便可以解釋尋求工作機會、受日本政府「動員」（第四期「南進政策」推行重點之一）或是私人因素⁹等，都可能是驅使台籍作家在此時期選擇（或被選擇）前往大陸的原因。

對照當時台灣的狀況，可歸結出同時間下的共通現象：1941年4月台灣成立「皇民奉公會」，由當時的台灣總督長谷川清擔任總指揮，而後成立「台灣文學奉公會」主辦「台灣文學決戰會議」，實行「協力戰爭」的政策；同年，吳濁流在日本殖民政府1939年起發行的日文官方報紙《大陸新報》中，擔任記者的工作。兩地看似不同的活動中，卻有著同樣身為「大東亞共榮圈」的共通性。中日戰爭期間，大陸部分地區成為「淪陷區」（中國大陸說法）的狀況與台灣「被殖民」的狀況，都是隸屬日本政府統治的情形。如此可以推測，1938年日本政府在台灣推行了戰爭動員政策（上述第四期「南進政策」）後，1941年至1942年在大陸生活的吳濁流，他的工作內容極可能與日本政府有關。戰爭體制下大陸與台灣的連結可以說相當具備時代性的意義，此點為本文的重要的中心意識。

二、研究目的

觀察同輩作家時可以發現，同時期中擁有實際大陸經驗的台籍作家並非只有

⁷ 吳濁流，《無花果》，頁118。底線為筆者所加。

⁸ 同上註，頁125。底線為筆者所加。

⁹ 例如鍾理和。文獻顯示，鍾理和前往大陸的原因與和妻子鍾台妹的「同姓婚姻」遭反對有關。彭瑞金編，《鍾理和集》（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1年7月），頁266。

吳濁流一人，然而在同時代同樣前往大陸生活的台籍作家中，在大陸的記者生活使得吳濁流的大陸經驗顯得極為特殊，且無論是戰前或戰後，吳濁流皆有描述其大陸經驗的作品，因此筆者選擇以吳濁流作為本文的研究對象。吳濁流的大陸經驗共可歸納出兩個突顯之處（並由其中延伸出本文試圖釐清的問題點）：

（一）戰爭時期擔任官方報紙《大陸新報》的記者

1941年，吳濁流透過友人章君拿到前往大陸的護照，同年1月抵達上海後轉往南京，一直到1942年3月回台前的時間中，吳濁流在南京擔任當時重要的日文／官方報紙《大陸新報》之記者。《大陸新報》的總社於上海，並在南京、武漢、漢口、東京等多處設有支社¹⁰。放置於當時的背景下來看，透過報紙內容反映的是中日戰爭時期大陸的狀況，並與中日戰爭下日本統治下出現的「大東亞共榮圈」相關。吳濁流由殖民地台灣而來，他的台灣人身份與記者職業是否有所關聯？吳濁流在《大陸新報》中擔任的是哪一類型的記者？撰寫了何種類型的報導？1942年3月，吳濁流返台後將當時實際走訪南京之見聞，以〈南京雜感〉的標題連載於《臺灣藝術》雜誌。這一系列的文章，是否記載著吳濁流的南京記者生活？

對照1942至1943年刊載在《臺灣藝術》上的原文／日文的〈南京雜感〉時可以發現，一系列記載吳濁流會面南京汪精衛政府重要人士¹¹的文章，並未收錄在1977年出版的《南京雜感》中譯本中。這些在戰後未被翻譯、出版的文章，成為推測吳濁流記者類型的重要記錄，以文章內容可推敲當時吳濁流曾接觸南京汪政府。吳濁流當時是以何種角度看待南京的汪精衛政府？這與他在《大陸新報》中的記者身份又有何相關？記者身份對他的南京生活有何影響？這些問題筆者將透過《臺灣藝術》上的〈南京雜感〉原文、《南京雜感》中譯本與《大陸新報》上的報導，試圖獲得解答。

（二）戰前至戰後的作品皆紀錄其大陸生活

觀察吳濁流1942年大陸生活之後的作品，可以看出大陸經驗確實影響他的寫作，譬如文學作品〈波茨坦科長〉、《亞細亞的孤兒》以及兩部自傳形式的作品《無花果》與《台灣連翹》等，文中皆出現大陸生活情節的描寫。本文亦試圖透過作品內容中所描寫的大陸見聞與感受，分析大陸經驗對吳濁流的影響。

特別是吳濁流於1943年至1945年寫作的日文小說《胡志明》（中譯版《亞

¹⁰ 請參照第二章。

¹¹ 包含：汪精衛、褚民誼、周佛海、陳群、梁鴻志，這些人物均在中日戰爭之際於南京汪精衛政府下擔任要職。

細亞的孤兒》第一版原稿)，由於寫作時間點正為吳濁流於大陸返台後的 1943 至 1945 年，是吳濁流最接近大陸經驗的文學創作。對照吳濁流《無花果》及《台灣連翹》中自述的大陸生活，《胡志明》中大陸情節的描述與自傳內容重疊性相當高。因此，《胡志明》中所載之胡志明赴大陸生活的情節，可被視為反映／討論吳濁流大陸經驗的重要文本¹²。

本論文將以「大陸經驗」為主軸，展開相關文本的討論。試圖回歸吳濁流「戰前」的寫作視角，透過當時社會背景的連結，以文本整理、觀看吳濁流 1941 至 1942 年這段較少為人觸及的大陸經驗。其中與大陸生活最直接相關的作品《南京雜感》（1942-1943 年寫作）與《胡志明》（1943-1945 年寫作），以及吳濁流停留南京的 1941 年至 1942 年 3 月中《大陸新報》上的報導文章，將是筆者觀察吳濁流大陸生活的討論中心。另一方面，吳濁流在戰後撰寫的兩本回憶錄《無花果》與《台灣連翹》中，也曾敘述在大陸一年又三個月的生活。對照戰後吳濁流回憶大陸經驗撰寫的內容，與吳濁流寫於日本殖民末期貼近大陸經驗時期的作品來看，兩種於不同時間所撰寫的同一段大陸經驗，分別如何呈現？戰後的回憶內容是否有著不同之處？再次撰寫的大陸經驗是否有著不同視角的內容？期望透過戰後大陸經驗的相關文本，觀看大陸經驗戰後再現的樣態。戰後文本的置入也可加強筆者討論「大陸經驗」的初衷。期望透過觀看台籍作家日本殖民時期的大陸經驗，明瞭殖民地背景下的大陸經驗如何影響作家本身及其之後的作品與寫作視角。

第二節、前行研究回顧

一、吳濁流大陸經驗之前行研究

1983 年翟筱芸在其碩士論文《吳濁流文學の研究—日本統治時代中国人作家の民族意識の考察を中心にして》¹³中，曾提及吳濁流 1942 年前往大陸與創作〈南京雜感〉一事，但並未深入討論。文中翟筱芸主要將焦點放置於吳濁流作品的討論，如文本〈先生媽〉、《胡志明》與〈波茨坦科長〉等，將其置於「民族意識」的範疇討論，呈現以作品為主的討論視角。1984 年宋冬陽發表了〈朝

¹² 對照《胡志明》第一版內容可以發現，之後出版的版本出現了刪減第一版內容的情形，如此造成第一版《胡志明》與《亞細亞的孤兒》中譯本兩者在描寫大陸的內容中出現了落差。依據寫作時間與文本內容，最貼近且最能反映吳濁流大陸經驗的文本為 1943-1945 寫作的第一版本《胡志明》。因此本論文將採用日文版《胡志明》，做為討論文本。【《胡志明》各篇首次出版時間如下：第一篇：1946 年 9 月 3 日；第二篇：1946 年 10 月 10 日；第三篇：1946 年 11 月 20 日；第四篇：1946 年 12 月 25 日；第五篇：1948 年 1 月 10 日。資料出於：河原功主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集成 30：吳濁流作品集》（東京都：綠蔭書房，2007 年 6 月），頁 485。】

¹³ 翟筱芸，《吳濁流文學の研究—日本統治時代中国人作家の民族意識の考察を中心にして》（台北：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1983 年 12 月）。

向許願中的黎明——試論吳濁流作品中的「中國經驗」》¹⁴一文，針對吳濁流一年三個月的大陸生活與後期作品一同分析討論。文中宋冬陽將吳濁流放置在「孤兒文學」的代表作家內，討論範圍包括《亞細亞的孤兒》、《南京雜感》及《無花果》等，文中同樣出現與民族意識、認同等問題，宋冬陽並在文中強調《南京雜感》是吳濁流寫作《亞細亞的孤兒》時的張本之一¹⁵，將兩者連結，但討論重點大多聚焦於《亞細亞的孤兒》中。

同樣的論點於林柏燕 1994 年發表的〈吳濁流的大陸經驗〉¹⁶一文中也曾出現。林柏燕討論了吳濁流的大陸經驗與《亞細亞的孤兒》之間的關係，並指出吳濁流到大陸的原因是為了尋找工作機會¹⁷。而林衡哲在 1988 年發表的〈三讀「無花果」〉¹⁸一文中，則是以《無花果》中所記載的大陸生活為討論中心，指出吳濁流大陸生活時所面臨的語言隔閡、文化認同等困境。2006 年，歐宗智同樣以《無花果》中所記載的大陸生活為討論中心，並加入《台灣連翹》一書內容，發表了〈吳濁流身分認同的心靈轉折——合讀《無花果》與《台灣連翹》〉¹⁹一文。文中提及大陸行與身分認同等主題，但是內容並未涉及《南京雜感》。

褚昱志於 1994 年的碩士論文《吳濁流及其小說之研究》²⁰中，廣泛地討論了吳濁流的作品（包含短篇、中篇與長篇），並對小說內容進行分析，包含小說中呈現的社會環境、人物類型與寫作手法等面向的討論。而盧欣怡 2007 年的碩士論文《吳濁流小說中的臺灣社會》²¹，則集中討論了吳濁流作品中所呈現的台灣社會狀況，包含政治狀況、經濟狀況、教育狀況等面向。但兩本論文對於吳濁流一年三個月的大陸生活只是輕描淡寫的帶過，並未深入探究。

而將《南京雜感》視為「遊記」、「旅行文學」等範疇來討論的前行研究也不少。如 2002 年徐千惠的碩士論文《日治時期台人旅外遊記析論——以李春生、連橫、林獻堂、吳濁流遊記為分析場域》²²中，徐千惠將研究視角集中於吳濁流

¹⁴ 宋冬陽，〈朝向許願中的黎明——試論吳濁流作品中的「中國經驗」〉《文學界》第 10 期（1984 年 5 月），頁 127-146。

¹⁵ 文中寫道：「一九四一年，吳濁流在南京度過一年的記者生涯，返台後立即寫下日文的『南京雜感』一書，這本書是日後吳濁流撰寫『亞細亞的孤兒』的主要張本之一」。出處同上註，頁 136。

¹⁶ 林柏燕，〈吳濁流的大陸經驗〉，收於封德屏主編，《鄉土與文學——「台灣地區區域文學會議」實錄》（台北：文訊雜誌社，1994 年），頁 334-357。

¹⁷ 文中寫道：「吳濁流到南京的目的，非常單純，謀職而已」。出處同上註，頁 340。

¹⁸ 林衡哲，〈三讀「無花果」〉，收於吳濁流，《無花果》（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88 年 8 月），頁 231-255。

¹⁹ 歐宗智，〈吳濁流身分認同的心靈轉折——合讀《無花果》與《台灣連翹》〉，《臺灣文學評論》第 6 卷第 3 期（2006 年 7 月），頁 21-27。

²⁰ 褚昱志，《吳濁流及其小說之研究》（台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1994 年 5 月）。

²¹ 盧欣怡，《吳濁流小說中的臺灣社會》（台北：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7 月）。

²² 徐千惠，《日治時期台人旅外遊記析論——以李春生、連橫、林獻堂、吳濁流遊記為分析場

的《南京雜感》。此論文中，徐千惠除了文本分析外，也表列了當時（2002年之前）吳濁流大陸經驗的前行研究篇章²³，並對照《無花果》與《台灣連翹》內容將吳濁流的交往人物表列說明²⁴，是針對《南京雜感》較完整的文本分析研究。但此論文只集中分析《南京雜感》，並未與吳濁流的其他作品一同討論。2007年陳室如在〈日治時期台人大陸遊記之認同困境：以連橫《大陸遊記》與吳濁流《南京雜感》為例〉²⁵一文中，將《南京雜感》與連橫的《大陸遊記》一同視為「大陸遊記」，比較並分析文本中所顯現的認同問題。陳翠蓮在2008年出版的《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一九二〇～一九五〇》一書中，將吳濁流、謝春木、黃旺成、鍾理和四位擁有大陸經驗的作家並置，討論他們實際生活下對大陸的所思所感。論述到吳濁流時，則以《南京雜感》為討論文本²⁶。

廖炳惠在2000年〈旅行與異樣現代性：試探吳濁流的《南京雜感》〉²⁷一文中，提出了「四種現代性」來分析他對《南京雜感》內容的觀察：

吳濁流在領受台灣被殖民的經驗，以及嚮往祖國的經驗回到南京之後，所發現到了非中、非日的台灣的現代的那種另類經驗。²⁸

這四種現代性分別為「另類現代性」、「單一現代性」、「多元現代性」與「壓抑的現代性」，並說明這四種現代性在台灣是「並存的」。可以說廖炳惠也是以「旅行文學」的角度來解讀《南京雜感》與吳濁流的大陸經驗。同樣以理論來討論吳濁流大陸經驗的文章還有2007年張惠珍〈紀實與虛構：吳濁流、鍾理和的中國之旅與原鄉認同〉²⁹一文。文中張惠珍舉出弗朗茲·法農的論述對照，將吳濁流與鍾理和的大陸經驗放置於原鄉書寫與認同危機的脈絡中，討論大陸經驗下帶來的矛盾的認同問題。

由以上的整理可以看出，關於《南京雜感》的前行研究幾乎將文本放置在「旅行文學」或「遊記」的類別中，討論認同意識、原鄉書寫等問題，部份研究會將吳濁流與其他同樣擁有大陸經驗的台籍作家並置觀看，此趨向成為《南京雜感》

域》（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6月）。

²³ 同上註，頁11。

²⁴ 同上註，頁44。

²⁵ 陳室如，〈日治時期台人大陸遊記之認同困境：以連橫《大陸遊記》與吳濁流《南京雜感》為例〉，《人文研究學報》第41卷第1期（台南：國立臺南大學，2007年），頁33-50。

²⁶ 陳翠蓮，〈第五章 想像與真實：台灣人的祖國印象〉，收於陳翠蓮，《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一九二〇～一九五〇》（台北市：遠流出版公司，2008年8月），頁193-198、203-205、207-222。

²⁷ 廖炳惠，〈旅行與異樣現代性：試探吳濁流的《南京雜感》〉，《中外文學》第29卷第2期（2000年7月），頁288-312。

²⁸ 同上註，頁303。

²⁹ 張惠珍，〈紀實與虛構：吳濁流、鍾理和的中國之旅與原鄉認同〉，《台北大學中文學報》第3期（2007年9月），頁29-66。

前行研究的一貫特色，同質性相當高。另一方面，以上前行研究中所討論的《南京雜感》，皆是 1977 年由遠行出版的中譯本，且討論焦點均集中在吳濁流描寫的南京百態以及對大陸的感受。受限於中文譯本，對於原連載於《台灣藝術》上〈南京雜感〉原文中所記載的汪政府相關人士之文章內容均未提及。簡義明於 2000 年發表的〈孤兒的眼睛——吳濁流遊記中的自我凝視與他者想像〉一文中，就提出了前行研究過於集中同樣的解讀視角、陷入停滯的狀況。此文中簡義明針對了吳濁流較少為後人注意的「遊記」類別作品³⁰抒發己見，並提到吳濁流遊記中因記者身份而出現的「報導性文句」的特徵³¹。

二、前行研究主題與文本之差異

前行研究中關於吳濁流大陸經驗的討論，分析的文本包括《南京雜感》、《亞細亞的孤兒》、《無花果》與《台灣連翹》，除了上述對〈南京雜感〉全文掌握並未完全的問題點外，也未有針對《大陸新報》中報導的討論。而研究者敘述吳濁流的大陸經驗時，討論焦點也幾乎集中在《亞細亞的孤兒》中。簡義明於 2000 年發表的〈孤兒的眼睛——吳濁流遊記中的自我凝視與他者想像〉一文中，清楚地點明了吳濁流的前行研究中焦點過於集中的狀況：

當我們在檢視這些資料的時候，我們可以發現某些研究的主題重疊性太高，如以「孤兒意識」和「殖民經驗」來詮釋吳濁流的小說便是主要的切入角度……太多人著力於此，比較無法開發出新的研究意義。³²

前行研究大多集中探討「孤兒文學」、「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等範疇，並多以《亞細亞的孤兒》、《無花果》及《台灣連翹》三篇文本為討論中心的現象，因而出現「戰後作品研究豐碩，戰前討論缺乏」的情況³³。觀察吳濁流的創作歷程，可以理解此現象的形成原因。

吳濁流在 1936 年發表了處女作〈水月〉，在寫作〈泥沼中的金鯉魚〉、〈筆尖的水滴〉與 1937 年〈歸兮自然〉及教育文章〈下學年數學教授的研究〉後，便辭去了教職前往大陸。據年表記載，吳濁流的創作記錄一直到 1942 年返台後，

³⁰ 如《東南亞漫遊記》、〈印澳紐遊記〉等。幾乎皆為戰後所寫。

³¹ 簡義明，〈孤兒的眼睛——吳濁流遊記中的自我凝視與他者想像〉，收於林柏燕主編，《吳濁流百年誕辰紀念專刊》（新竹：新竹縣文化局，2000 年 12 月），頁 48-63。

³² 簡義明，〈孤兒的眼睛——吳濁流遊記中的自我凝視與他者想像〉，收於林柏燕主編，《吳濁流百年誕辰紀念專刊》，頁 48。底線為筆者所加。

³³ 此外，觀察後可以發現。前行研究中涉及「原以日文發表，後翻譯為中文發行的作品」（如《亞細亞的孤兒》、《南京雜感》）的討論，也呈現以戰後中譯本為討論對象的情形。「回歸日文原文內容」來討論的現象並不多。因此，若是戰後中譯本曾進行刪減的動作，這類研究就有可能出現漏洞。

在《臺灣藝術》上發表〈南京雜感〉時才再次出現³⁴。因此，欲探究吳濁流 1941 年之後的大陸生活，除了返台後連載的〈南京雜感〉及戰爭中所寫作的《胡志明》外，可以分析的文本並不多，這情形與戰後大量出版了長篇作品的情形差異甚大，可以說吳濁流的文學創作與文學活動幾乎呈現「集中於戰後」的情形，作品如：被視為台灣歷史小說的《亞細亞的孤兒》（於戰後多次再版）；與二二八事件相連結的〈波茨坦科長〉；自傳作品《台灣連翹》、《無花果》；評論集成《黎明前的臺灣》、《臺灣文藝與我》；遊記《東南亞漫遊記》³⁵、〈印非遊記〉、〈印澳紐遊記〉³⁶等。再加上他於 1964 年創辦了「臺灣文藝雜誌社」，發刊《臺灣文藝》，對文壇貢獻極大。綜觀以上作品，可得知，大陸經驗研究文本的缺乏，成為此階段不被廣泛討論的第一個原因，也造成前行研究均集中於討論戰後作品的結果。

第二個研究缺乏的原因，在於資料的分析及取得均有其難度。吳濁流於 1941 年開始擔任記者的《大陸新報》是中日戰爭時期中於日本政府管轄下、社會性強烈的官方報紙。因為官方報紙的位置，與擁有支社、本社の龐大體系下，吳濁流於南京擔任記者時，《大陸新報》上關於「南京」方面的報導，皆屬以「南京支社」之名刊登發表，此情形加深了研究的困難（整份《大陸新報》皆是如此呈現。社會性報導中不會顯露出採訪記者的名字，只記載著傳送報導的地區之名。只有在文藝報導或評論文章出現時才有紀錄作者名字的情形³⁷）。因此幾乎不見針對《大陸新報》時期的吳濁流完整系統的研究。因而導致以往在回顧吳濁流的大陸經驗時，研究者通常採用吳濁流戰後發表的回憶錄自傳《無花果》與《台灣連翹》為分析文本，而鮮少採用第一手資料《大陸新報》及第一版本（日文版原文）的《胡志明》，也形成研究者過於依賴戰後自傳作品內容的傾向。並且顯現以下情形：吳濁流的相關研究中，研究者在討論到這段大陸經驗時，通常只輕描淡寫的帶過，並未深入探討。

正因研究過於集中戰後作品，因而導致前行研究多以「戰後」的視角進行分析，對於真正回到吳濁流「戰前寫作視角」的討論，以及橫跨中日戰爭時期「戰前至戰後的寫作連結」等切入點的研究便缺少整理。因此，本論文中筆者將透過吳濁流戰前的大陸經驗與接近大陸經驗時間點所撰寫的作品，進行系統性地分析，觀看大陸經驗是如何影響吳濁流的視角與寫作。大陸經驗後吳濁流的創作受

³⁴ 關於吳濁流的創作記錄，可參考吳濁流生平寫作年表與自撰年譜。彭瑞金編，《吳濁流集》（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1 年 7 月初版），頁 290-291；吳濁流，《吳濁流作品集(6)台灣文藝與我》（台北市：遠行出版社，1977 年 9 月初版），頁 211-212。

³⁵ 吳濁流於 1973 年（昭和 48 年）遊訪東南亞後而寫。

³⁶ 吳濁流於 1975 年（昭和 50 年）遊歷印尼、澳洲、紐西蘭、馬尼拉等地，於同年寫作〈印非遊記〉，發表於《台灣文藝》52 期，後收入《南京雜感》；翌年寫作〈印澳紐遊記〉，同樣發表於《台灣文藝》中。呂新昌在其作《鐵血詩人吳濁流：吳濁流的奮鬥人生》中將吳濁流作品的寫作時間逐一列出。呂新昌，《鐵血詩人吳濁流：吳濁流的奮鬥人生》（台北市：臺灣文藝出版；聯臺文物發行，1984 年初版），頁 207-217。

³⁷ 筆者查閱 1941 年至 1942 年的《大陸新報》，沒有以「吳濁流」或本名「吳建田」或筆名「饒畊」發表的文章。

到何種程度的影響？戰前的吳濁流是以什麼角度看待當時的大陸與南京汪精衛政府？吳濁流於《大陸新報》的記者工作與戰時大陸有何關聯？這些切入點均是吳濁流前行研究中未觸及的部分。期望透過回歸文本與報章雜誌的解讀，補足前行研究中缺乏的「戰前」部分，對吳濁流的大陸經驗與創作之間的相關性能有更深入的探討。

第三節、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範圍

有關吳濁流的大陸經驗，以記者生活與報導類文章方面來看，1941年2月至1942年3月吳濁流擔任南京「大陸新報社」記者時《大陸新報》上的報導文章，是最貼近吳濁流真實生活（大陸生活）的記錄，也是推測吳濁流記者類型的重要資料。另一方面，1942年吳濁流返台後一直到1943年於《臺灣藝術》上所發表的一系列《南京雜感》之連載文章中，也有提及南京生活的紀錄。而1943至1945年撰寫的《胡志明》，亦是能反映吳濁流大陸經驗後反思大陸生活及思辯大陸與台灣問題的作品。而1946年於台灣出版的《胡志明》，在內容上與1956年《アジアの孤兒》（於日本出版的第二版）及之後出現的版本³⁸皆有所不同，因此回歸原版分析，有其必要性。

吳濁流在其自傳《無花果》與《台灣連翹》中也曾以「回憶」之形式敘述這一年又三個月的大陸生活。《無花果》第七章至第十章中，詳細紀錄了吳濁流抵達大陸的過程。在第七章〈終於辭職教員〉結尾處開始，與第八章〈在南京當日本報記者〉及第九章〈糧食缺乏中迎接八·一五〉直到第十章〈歡呼「光復」的陰影〉中，這四章內容皆提到與南京生活相關的資料³⁹；而《台灣連翹》第七章中，同樣敘述了抵達南京後的生活。其中記載了擔任記者時所接觸到的政府重要人物的印象，如汪精衛、周佛海、陳群、梁鴻志、徐良等人，此記錄是《無花果》中未提及的部分⁴⁰。

³⁸ 第三章詳述。

³⁹ 這四章約略內容如下：第七章〈終於辭職教員〉結尾處，吳濁流自述當時心中出現的前往大陸的想法，並請在大陸的友人幫忙寄來一張聘書，之後順利辦理出境，開心地前往大陸。第八章〈在南京當日本報記者〉中，則描述了抵達大陸後的生活，以及擔任《大陸新報》記者的過程。此章表達戰時居住於南京的感受，以及返台後受監視的過程與記者生活。第九章〈糧食缺乏中迎接八·一五〉中則敘述了吳濁流1942年回台後所接觸的社會狀況，如中日戰爭造成的糧食缺乏、戰爭結束前的不安定的台灣社會等情形。在敘述與工藤好美教授的交往中也提到《亞細亞的孤兒》的寫作過程及任職《台灣日日新報》時的記者生活。第十章〈歡呼「光復」的陰影〉中則從戰後初期國民政府來台「真空期」的社會狀況，一直描述到國民政府抵台的情景。

⁴⁰ 此外，部分吳濁流的研究者也曾以「傳記」形式發表過紀錄吳濁流生平的相關書籍。如呂新昌1984年出版的《鐵血詩人吳濁流：吳濁流的奮鬥人生》一書中第六章〈七年的記者生活〉中也有記載，內容與《無花果》一致；石一寧則是在《真實的追問：吳濁流的文學·思想·人

本論文中，筆者將按年代及吳濁流的創作時序，從《大陸新報》(1941-1942)中的相關篇章、《南京雜感》(1942-1943)到《胡志明》(1943-1945)，討論文本中所呈現的大陸經驗，檢視吳濁流在大陸的記者生活。而戰後初期作品《波茨坦科長》中的大陸觀感，與戰後回憶錄《無花果》與《台灣連翹》中所提及的大陸經驗，則放置在戰前文本的討論之後。本論文將透過上述文本，分析吳濁流研究中較少為人觸及的大陸經驗。對吳濁流一年三個月(1941年1月至1942年3月)的大陸經驗，建立一個系統性的整理。

二、研究方法

本文**第一章**將具體鋪陳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範圍，以及研究方法等架構。**第二章**筆者將焦點集中於1941年至1942年吳濁流的南京生活。將先說明吳濁流前往大陸前的台灣生活，並同時觀察1937年至1945年間同樣擁有大陸經驗的台籍作家(王詩琅、鍾理和等人)，探討其共通性，並將上述討論置於殖民地與大東亞共榮圈(協力戰爭、南進政策等)的背景下來觀看。筆者參考李文卿在《共榮的想像：帝國日本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中說法——敘述戰爭末期日本統治下於北京、上海所出現的「大東亞文學圈」，對於1937年之後的北京與上海，將其納入「大東亞圈」的範疇中討論⁴¹。筆者欲透過吳濁流前往南京前的上海生活，結合上述所提及之同時代台籍作家之大陸經驗並置討論。其次，筆者將梳理1941年至1942年間吳濁流的記者工作。將透過分析吳濁流的自述內容，釐清吳濁流擔任的記者類型。接著將焦點放置在1941年至1942年南京的《大陸新報》。將先介紹《大陸新報》的刊載型態，並透過《大陸新報》上以「南京支社」之名刊載的報導中，觀看官方《大陸新報》與南京汪精衛政府之間的關聯性。最後將透過《大陸新報》內文的分析，推測可能為吳濁流撰寫的報導。

第三章將討論吳濁流1942年返台後大陸經驗之相關作品。首先將分析1942至1943年連載於《臺灣藝術》上之〈南京雜感〉系列文章。首先將梳理〈南京雜感〉發表於《臺灣藝術》上的經過，並整理戰後中譯本《南京雜感》內容(1977年出版)與《南京雜感》原文(1942-1943年發表)之間的差異，透過內容的分析統整共通點，以釐清中譯本刪除原文的原因。而後將焦點放置寫作於1943至1945年的第一版日文小說《胡志明》中。將先說明《胡志明》的版本問題，透過回歸《胡志明》原文，討論文本中描寫的大陸生活。並以「主題式」分析不存在中譯本《亞細亞的孤兒》中的內容所呈現的含意。以期明瞭文本中吳濁流的大

格》一書第一章〈淡泊生涯荊棘多〉的第八節至第十節中，也描述了吳濁流1941年至1942年的大陸生活。以內容來看，這三小節是配合著《無花果》第八章到第十章三章的內容而來。

⁴¹ 相關討論可參考李文卿，〈第六章 日章旗下的中國文壇(北京·上海)〉，《共榮的想像：帝國日本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年1月)，頁287-318。

陸觀感與批判之處。

第四章將集中於吳濁流戰後作品的探討。透過戰後初期小說《波茨坦科長》與戰後回憶錄《無花果》、《台灣連翹》，探討大陸觀感延續至戰後小說中的現象，以及重新檢視大陸經驗再次出現於戰後回憶錄中的意義。首先以戰後初期作品《波茨坦科長》為分析文本，整理《波茨坦科長》複製《胡志明》內容之處，藉以觀看戰前作品至戰後作品的連結。其次，將分析《無花果》與《台灣連翹》中的大陸經驗相關內容，透過與戰前作品中所記載的大陸經驗內容之間的差異，探討回憶錄內容是否受到寫作時（戰後）台灣政權等社會背景之影響，以釐清回憶錄再現「大陸經驗」的含意。

第五章將總結吳濁流的大陸經驗。包括《南京雜感》、《大陸新報》與《胡志明》、戰後初期小說《波茨坦科長》中的大陸觀感、回憶錄《無花果》與《台灣連翹》中大陸經驗再出現的真正意涵等面向。透過回歸原文以進行文本間的「差異研究」，並與文本寫作時所面臨的社會背景（如大東亞共榮圈、戰後國民政府）一同討論，梳理吳濁流戰前至戰後的作品連結。本論文將焦點放置在吳濁流於日本殖民末期的大陸經驗中，以期補足吳濁流的前行研究中這段較少被觸及的大陸經驗。

第四節、章節架構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第二節、前行研究回顧

第三節、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第四節、章節架構

第二章 吳濁流的南京生活（1941-1942）

第一節、大東亞共榮圈下台籍作家的大陸行

第二節、1941-1942年南京《大陸新報》之記者生活

第三節、1941-1942年的南京《大陸新報》

第四節、小結

第三章 返台後大陸生活之相關作品：《南京雜感》與《胡志明》（1942-1945）

第一節、《南京雜感》的發表情形與刪略特點

第二節、批判社會問題的負面描寫

第三節、對中國社會的反思與敏感議題

第四節、小結

第四章 大陸經驗之戰後相關作品探討：

《波茨坦科長》(1948)、《無花果》與《台灣連翹》(1968-1973)

第一節、《波茨坦科長》中的大陸觀感

第二節、回憶錄之再現與含意：《無花果》與《台灣連翹》

第三節、小結

第五章 結章



第二章 吳濁流的南京生活（1941-1942）

第一節、大東亞共榮圈下台籍作家的大陸行

在討論吳濁流的南京生活之前，首先必須明瞭吳濁流選擇前往大陸的契機與原因。吳濁流於 1900 年出生，他由祖父帶大，祖父所傳達的是傳統漢式觀念。而吳濁流的成長歲月中所受的是日式教育（殖民地教育），眼睛所看、生活所用都是日本式的事物，1920 年吳濁流從台北師範學校畢業後，開始擔任教師的職業，前後共二十年的時間（1920 年至 1940 年：21 歲至 41 歲）。也就是說，一直到 1941 年選擇前往大陸前的 42 年中，吳濁流的人格養成與認同等價值觀皆在台灣已經形成。而抵達大陸後所開啟的是另一種不同於在台灣生活的視角，所見所觸的不同與成長時期在台灣所生成的認同等價值觀便相互碰撞，所產生的衝擊（或是交融）對作家本身帶來相當深刻的影響。而部分同樣於戰爭期前往大陸的台籍作家也有著同樣的經歷。如此我們可以歸結出所謂的「共通性」，並且將這群台籍作家選擇於戰爭期前往大陸的行為，視為殖民末期的台灣社會中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本節筆者將透過大陸經驗中部份台籍人士停留「上海」的共通性，對日本殖民末期（1937-1945）在大陸生活的台籍人士做初步的觀察。日本殖民末期中前往大陸生活的台籍作家並不少。觀察後可以發現，除了吳濁流外，如王詩琅（1937 年至 1946 年：上海到廣東）、鍾理和（1938 年至 1946 年：北京）、江文也（1938 年至 1983 年：北京）等人，也都選擇（或被選擇）在中日戰爭這段時間中，抵達大陸生活。而張深切（1923 年至 1927 年：上海到廣州；1938 年至 1946 年：北京）與劉吶鷗（1926 年至 1940 年：南京與上海）兩人則是於二〇年代即前往大陸。雖然兩人並非受到 1937 年中日戰爭發生等相關因素才選擇前往大陸，但他們與上述四位作家一樣，皆於日本殖民末期（1937-1945）生活於大陸。筆者認為在進入大陸經驗的討論前需釐清的問題為「在大陸生活的台籍人士的共通處」。首先必須觀察台籍人士前往大陸的原因，與抵達大陸後所從事的活動（或職業）。

由於當時台灣人擁有日本國籍，因此，前往日軍佔領下之「淪陷區」，實際上沒有什麼困難。何況在當時的「淪陷區」，屬於「漢族出身之日本帝國臣民」這種特異存在的台灣人身分，因為被視為「中日橋樑」的關係，所以在謀職上相當容易。⁴²

⁴² 黃英哲，〈張深切的政治與文學〉，收於陳芳明、張炎憲、邱坤良、黃英哲、廖仁義編，《張深切全集（卷 11）北京日記·書信·雜錄》（台北市：文經出版社 1998 年 1 月），頁 41。

這段話是黃英哲敘述張深切北京生活時所提出的觀點，而親身經歷大陸生活的吳濁流則寫道：

彭氏（按：吳濁流友人）告訴我，要在南京做事，不僅要懂北京話，同時也需通曉中國事情。一般意見是與其雇用不諳北京語與中文的臺灣人，還不如雇用日本人較佳。⁴³

上述兩段話雖然對於謀職難易的認知不完全相同，但皆點出了台灣人前往大陸的經驗中，本身具備的「特殊身份」與「語言」的問題。所謂的「身份」即是台灣人身為「被殖民者」的特殊性；而「語言問題」意指不諳中文、但熟知日語的「語言優勢」。「被殖民身份」使台籍作家在抵達大陸後受到不少的衝擊與矛盾（例如被歧視或被視為間諜），然而被殖民的身份卻也同時為他們帶來被注意（被聘雇）的機會（因為此「敏感身份」謀得工作職位），產生如此弔詭的狀況。透過台籍作家抵達大陸後所從事的職業，可以發現其與「被殖民身份」及「語言／日語優勢」兩大因素之關聯，並顯示台籍作家的的工作受到日本殖民末期「戰爭動員」政策影響的事實。

其中，王詩琅的大陸經驗即清楚呈現了日本政府實施「戰爭動員」政策的狀況。王詩琅於 1937 年赴上海，在日本陸軍特務部第一班（宣撫班）工作，1938 年赴廣州擔任官方報刊編輯，1945 年報社受時局影響宣告解散後，同年 10 月王詩琅擔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廣州行營台籍官兵總隊政治教官，並於 1946 年回台，兼任中國國民黨省黨部幹事⁴⁴；1938 年開始以《廣東迅報》編輯一職在廣東生活的王詩琅，以及 1941 年開始聘雇於「大陸新報社」擔任記者的吳濁流，兩人所處的地區雖然不同，但是皆以報社為主要職業場所，並存在著不同語言的差異——《大陸新報》為一日文報紙，而《廣東迅報》則以中日文兩種語言分別刊行⁴⁵。而從兩報同樣處於官方報紙的位置這點來看，可以明瞭台灣人前往大陸後與日本政府的關係並未間斷，並可推測此職業的謀得與他們前往大陸的原因以及被殖民身份皆有所關聯。而當時台灣受到日本經濟蕭條影響所出現的失業潮，以及實施「南進政策」派遣台人前往大陸的行為，均是驅使台籍人士前往大陸的

⁴³ 吳濁流，《無花果》，頁 126。

⁴⁴ 以上資料出於：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台北：稻鄉出版社，2000 年 7 月），頁 232；李獻璋編，〈王詩琅先生信札集—其所反映的光復初期生活〉，《臺灣風物》第三十五卷第三期（台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85 年 9 月 30 日），頁 75；〈王詩琅生平寫作年表〉，收於張恆豪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1 年 2 月），頁 140。

⁴⁵ 關於《廣東迅報》，王詩琅寫道：「筆者是在日人創辦的一間報社工作。這家報社原是由日本軍方於佔領廣州時創立，後來移由臺灣總督府的一個分支機構善隣協會經營，規模不大不小，員工有三、四百人，出有中日文兩種日報，算是日人的喉舌。」，此段話出於王詩琅，〈臺灣光復前後旅居廣州的臺胞〉，收於張良澤編，《王詩琅選集第八卷—臺灣人物表論》（台北市：海峽學術，2003 年 6 月），頁 352-353。

重要原因。在歸結他們的大陸經驗與「殖民」的關係之前，筆者將先觀察作家大陸經驗中所從事的職業與參與的活動。由抵達大陸後的行走路徑來看，首先出現的是台籍作家擁有上海經驗的共通性。

台籍作家的上海經驗早在二〇年代時就已出現。如上述的張深切與劉吶鷗，兩人分別於 1923 年與 1926 年時就已前往大陸。其中不乏如張深切等台灣人以「學生」身份參與社會運動的組織。例如二〇年代的上海出現的「上海臺灣青年會」。這個被稱為「抗日學生團體」的組織，於 1923 年 10 月由上海台灣留學生蔡惠如、彭華英、許乃昌等人於上海成立，並於 1924 年 1 月召開「上海台灣人大會」，參加五九國恥紀念會等政治性活動，後因經費不足於同年 11 月 6 日解散⁴⁶。從組織成立過程中可以得知，二〇年代的上海已有一群台籍知識份子聚集，對於社會政治問題有所關注。換句話說，當時「上海」是台灣學生醞釀社會運動的核心地之一，如組織成員中的張深切，即為 1923 年前往上海留學，寄居「台灣青年會館」⁴⁷，參與「上海臺灣青年會」，並於 1924 年 5 月於上海創辦「台灣自治協會」⁴⁸。以上資料足以顯示二〇年代起「上海」地區對台灣知識份子的重要性。

同樣於殖民時期前往上海參與社會活動的台籍人士中還有楊肇嘉。楊肇嘉在其回憶錄中寫道：

我們有志者十數人，於一九三六年春，到祖國去考察。我們這一考察組織，是以臺灣新民報社為骨幹，包括社長林獻堂先生、經理羅萬俸夫婦、董監事林資彬……，定名為「華南考察團」，以林獻堂先生和我任正副團長。我們計畫考察的地方有：廈門、福州、汕頭、香港、廣州、上海等處。重點當然置在上海。因為上海是中國的經濟中心。⁴⁹

楊肇嘉的紀錄呈現了三〇年代台籍人士前往大陸的經驗，其中領導者林獻堂同時也是二〇年代台灣社會運動的重要領導人物。觀看二〇年代起上海所出現的台灣人組織，不難明瞭楊肇嘉等人選擇前往上海的原因，是與兩地（上海、台灣）同樣具備的社會運動氛圍有關。李文卿在其博士論文《共榮的想像：帝國日本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中，曾以〈日章旗下的中國文壇（北京·上海）〉一章節敘述戰爭末期日本統治下於北京與上海。對於 1937 年之後的北京與上

⁴⁶ 相關資料可參考楊碧川編，《臺灣歷史辭典》（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7 年 8 月初版一刷），頁 221-222。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 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台北市：南天書局，1939 年 7 月初版），頁 69-73。

⁴⁷ 陳芳明、張炎憲、邱坤良、黃英哲、廖仁義編，《張深切全集（卷 1）里程碑—又名：黑色的太陽（上）》（台北市：文經出版社 1998 年 1 月），頁 242。

⁴⁸ 張志相編，〈張深切年譜〉，收於陳芳明、張炎憲、邱坤良、黃英哲、廖仁義編，《張深切全集（卷 11）北京日記·書信·雜錄》，附錄頁 10。

⁴⁹ 楊肇嘉，〈回祖國考察〉，收於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二）》（台北市：三民書局，1970 年 7 月三版），頁 312。

海，將其納入「大東亞共榮圈」的範疇中討論。文中說道：

日本對北京與上海除了展開政治的操控外，為了鼓吹「八紘一宇」、「東亞共榮」的國策概念也推動日語教育與文化事業的出版宣導工作，特別對於留京以及留滬的文化人之收編可說是不遺餘力，欲透過文學者與日本的協力型塑出日中友好的樣貌。檢視日本對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藍圖，除了以兩個殖民地作為戰爭協力的兩翼之外，東北的滿洲國、華北的華北政務委員會以及華中的汪精衛南京國民政府也都在日本的扶持下支撐此共榮圈之建構，名義上為獨立政權，實質上接受日本軍部所指派的顧問之主導與支配，也成為日本對中國的戰事中重要經濟、軍需的重要補充地。⁵⁰

經由上述說明可清楚明瞭上海、北京、東北與南京等地，皆屬日本政府勢力下的一環，並且支撐著 1937 年至 1945 年間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當時身為殖民地的台灣也是處在相同的位置上。以此脈絡下展開，便可以檢驗台籍作家於這段時間中的上海經驗、北京經驗或東北經驗。王詩琅即是一例。王詩琅於 1938 年赴廣州擔任編輯的「廣東迅報社」，為台灣總督府經營的「善隣協會」所管轄⁵¹。「善隣協會」的組織章程為「促進日本與隣邦之親善，並對該地區之通商貿易及其他事業予以援助，以增進該地區共同之福祉」⁵²，明顯為總督府推行南進政策的重要機構之一。這與他於 1937 年受軍事派遣前往大陸一事有著同樣的背景，也就是說，王詩琅在戰爭時期一直處於任職於日本政府下的狀況，相同的經歷也出現在劉訥鷗身上。

滿洲事變（1931 年）前，劉訥鷗曾於南京的中央電影攝影所工作⁵³，並長期停留上海與日人松崎啟次等人合作發展電影事業，並在穆時英遭到暗殺後，受汪精衛政府宣傳部長林柏生之邀，接替穆時英擔任《國民新聞》（南京汪精衛政府下的機關報紙）社長一職⁵⁴；同樣的例子還有張深切。1938 年 3 月，原本生活於上海的張深切，由上海抵達北京後認識了「北京藝術專科學校」校長王石之，因而謀得了教授的職位⁵⁵，開始從事教職。1939 年 9 月《中國文藝》創刊，張深切

⁵⁰ 見李文卿，〈第六章 日章旗下的中國文壇（北京·上海）〉，出於《共榮的想像：帝國日本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 年 1 月），頁 287。底線為筆者所加。

⁵¹ 〈王詩琅先生口述回憶錄〉，收於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頁 233；梁華璜，〈「善鄰會設立計畫書」—台灣總督府之南侵計畫〉，《臺灣風物》第三十四卷第四期（台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85 年 12 月 31 日），頁 65。

⁵² 梁華璜，〈「善鄰會設立計畫書」—台灣總督府之南侵計畫〉，《臺灣風物》第三十四卷第四期，頁 63-64。

⁵³ 康來新、許秦蓁合編，《劉訥鷗全集：增補集》（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10 年 7 月），頁 252、257。

⁵⁴ 同上註，頁 285、322；隨後（1940 年）劉訥鷗遭到槍殺，不治身亡。同上註，頁 292-293。

⁵⁵ 張志相編，〈張深切年譜〉，收於陳芳明、張炎憲、邱坤良、黃英哲、廖仁義編，《張深切全集（卷 11）北京日記·書信·雜錄》，附錄頁 24。

擔任其主編，從事文藝活動。當時的北京⁵⁶也同樣位於日本政權的統治之下，而鍾理和與江文也同樣於這段時間中前往北京生活。鍾理和因家庭因素於 1938 年隻身前往東北，1940 年返台將妻子帶往瀋陽並在 1941 年舉家遷往北京，直至 1946 年返台⁵⁷。江文也為 1938 年受音樂家柯政和的邀請前往北京擔任北京師範大學音樂系教授，並於課餘從事創作與民俗音樂研究等活動⁵⁸。綜觀以上的大陸經驗，台籍作家的大陸生活，無論是從事藝術工作（電影與音樂），或是任職於報社、擔任教育者等，他們的工作環境皆處於大東亞共榮圈下。簡單來說，他們選擇（或被選擇）停留的地方／城市，都屬日方的權力範圍。

「上海」從二〇年代起即出現台籍知識份子組織的狀況，到三〇年代相繼前往上海的台籍作家楊肇嘉、王詩琅、吳濁流（四〇年代出發）等例子，這些經歷都顯示了「上海」的重要性。再加上十九世紀時上海因殖民者的介入帶起都市的發展，繼而形成「新聞中心」的特性（上海新聞業事業的發展，與都市的形成是同步的）⁵⁹。另一方面，上海亦因為帶有「文化」上的吸引力，而逐漸成為文化人的聚集之處。李歐梵在《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 1930-1045》一書中提及，上海因為「租界」的特性與港口位置，成為中西文化的匯流之處。「事實上，現代都市生活的絕大多數設施在十九世紀中葉就開始傳入租界了。因此在二〇世紀三〇年代，上海已和世界最先進的都市同步了」⁶⁰。因為西方文化的進駐，隨之而來的是上海周邊如百貨大樓、咖啡廳、電影院與舞廳等建築的林立。此外他更提到上海電影文化的興盛，「電影院既是風行的活動場所，也是一種新的視聽媒介，與報刊、書籍和另外的出版種類一起構成了上海特殊的文化母體」、「三〇年代末，上海已經有了三十二到三十六家電影院」⁶¹。而租界的西式建築與電影文化都成為上海作家的消遣地，甚至是寫作素材。如施蛰存、穆時英、劉吶鷗等上海「新感覺派」作家，其中劉吶鷗更曾親身參與電影的製作。以上特性，都是台籍作家之所以選擇「上海」為抵達大陸第一站（或最後一站）的重要原因。

同樣擁有上海經驗的吳濁流，1941 年短暫停留上海後即前往南京，擔任《大陸新報》的記者。《大陸新報》的總社設於上海，這與上海身為大陸重要新聞資訊交流中心的特徵有關，此點亦可印證在殖民關係中「上海」擔任傳播日本政府傳遞資訊的重要據點，以及在大東亞共榮圈中所處的特殊性位置。以下將依此展

⁵⁶ 1937 年由王克敏於北京組織「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北京）」，1940 年之後改名為「華北政務委員會」，隸屬南京汪精衛政權統治之下。

⁵⁷ 參註 9。

⁵⁸ 林瑛琪，《夾縫中的文化人——日治時期江文也及其時代研究》（台南市：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5 年 7 月），頁 296。

⁵⁹ 秦紹德，《上海近代報刊史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 年 7 月），頁 14。

⁶⁰ 李歐梵著、毛尖譯，《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 1930-1945（增訂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7。

⁶¹ 同上註，頁 97、99。此外李歐梵也提到與電影同步風行的還有電影雜誌與電影指南，以及流行期刊上的電影專欄與專文。同上註，頁 101-107。

開吳濁流停留南京時期(1941年至1942年)記者生活的討論,第三節將討論《大陸新報》中的具體內容。

第二節、1941-1942年南京《大陸新報》之記者生活

本節筆者將透過吳濁流敘述大陸生活的作品與回憶錄內容,推測1941年至1942年吳濁流於「大陸新報社」中可能擔任的記者類型,並討論吳濁流的記者生活與日本殖民末期的殖民地台灣之連結。根據《無花果》及《南京雜感》中記載,吳濁流於1941年1月18日抵達南京後,第一個職業是為南京日本會議所的機關書籍《南京》擔任翻譯(將中文譯成日文),後來因為與同事發生衝突憤而離職,任職僅十天。吳濁流記載自己失業後的第五天便獲得南京《大陸新報》記者的工作職缺。依吳濁流敘述的時間推敲,顯示吳濁流應於1941年2月後才至《大陸新報》擔任記者的工作⁶²。

在推測吳濁流的記者類型時,首先需探究吳濁流前往大陸的方式,這與吳濁流後來的工作機會或許有關。吳濁流中學時代的友人章君是此行中相當重要的人物。吳濁流敘述自己是透過同學在大陸任職的章君,請他幫忙弄一張聘書來,用聘書辦理出境後,順利取得護照前往大陸⁶³。如果把章君視為吳濁流大陸行的引介者的話,吳濁流記者工作的契機便可從他抵達大陸後行走的路線中獲得解答。吳濁流抵達大陸後為什麼從上海前往南京,也可推測應是章君的安排(章君於南京汪精衛政府下工作)。而吳濁流因而擁有汪政權的聘書或許對他的工作機會有所助益⁶⁴。

⁶² 據《無花果》及《南京雜感》中記載,吳濁流於1941年1月18日抵達南京後,於南京日本會議所的機關書籍《南京》擔任翻譯工作,因與同事起衝突後,憤而離職,任職僅十天。並記載失業後第五天便獲得南京大陸新報的記者工作職缺。因此筆者推測吳濁流應該於1941年2月後才至《大陸新報》擔任記者工作。吳濁流,《南京雜感》,頁54;吳濁流,《無花果》,頁126-129。

⁶³ 吳濁流,《無花果》,頁118。

⁶⁴ 關於「章君」,呂新昌在為《鐵血詩人吳濁流:吳濁流的奮鬥人生》一書中曾寫明「章君」的真實姓名為「鍾王壽」,並提及日據末期時,鍾王壽在南京汪精衛政府宣傳部工作。呂新昌,《鐵血詩人吳濁流:吳濁流的奮鬥人生》,頁134-136;而吳濁流本人於《無花果》與1942年《臺灣藝術》上發表的〈南京雜感〉原文(日文)及《台灣連翹》中,皆是以「章君」稱此友人。吳濁流,《無花果》,頁118;吳濁流,〈南京雜感〉,《臺灣藝術》第三卷第十一號(昭和17年/1942年11月1日發行),頁29;而在中譯版的《南京雜感》中,張良澤則將此人譯為「鍾君」。吳濁流,《南京雜感》,頁54;吳濁流在自傳《無花果》中曾提及與章君的交往,並說道「後來竟成為我去大陸的原因。我四十二歲時到大陸去,完全是因為當時他在南京的緣故」,及「同學章君在大陸,任國民政府高級職位」。以上兩段話出自:吳濁流,〈無花果〉,《臺灣文藝》第五卷第十九期(1968年4月),頁77-78;吳濁流,〈無花果〉,《臺灣文藝》第五卷第二十期(1968年7月),頁70。但吳濁流本人並未在作品中提及章君全名。因此推測呂新昌的說法應是參考吳濁流《無花果》及《台灣連翹》內容而來(鍾、章日文讀音皆為シヨウ,也可能為呂新昌推測的原因之一)。即使吳濁流本人從未在作品中提及章君真實姓名,但透過《無花果》中所述,可推測章君應於南京汪精衛政府下任職,此層關係應是吳濁流前往南京的原因之一。

吳濁流前往南京後，因通曉日語的優勢，在一邊學習中文的同時，一邊尋找工作機會：「我就開始找關係以便在日本機關謀職」⁶⁵。之後順利獲得的南京日本會議所機關書籍《南京》的編輯工作中，工作內容為將南京民間風俗習慣一類的文字譯成日文。此工作內容與他後來寫作的〈南京雜感〉內容極為相似，均是紀錄南京百態、市民生活等。另外，在《南京雜感》中吳濁流說道自己需要雇用洋車夫到處去蒐集新聞材料，並說道自己有固定的工作時間：

我當記者時代，雇用了一個姓曹、年齡二十四歲的誠厚的青年車夫。我要坐著他的車子到各地方去蒐集新聞材料，……。尤其我的工作是在六點鐘以後，……。⁶⁶

綜合以上原因，筆者推測，吳濁流因之前於南京「日本會議所」的工作內容，因此導致後來任職於「大陸新報社」時，也撰寫了相似的報導（即紀錄南京民俗風情一類的文章）。此點成為筆者找尋吳濁流撰寫的《大陸新報》報導時，推測的第一種可能性。

「你儘管把臺灣話講得如何好，一旦到祖國去，便知祉（按：只）是個井底之蛙而已」⁶⁷。這是吳濁流返台後於 1947 年 6 月〈黎明前的台灣〉（夜明け前の臺灣）一文中所寫下的一段話，顯示「語言的使用」是台籍人士抵達大陸後的第一個難題。要推測吳濁流擔任的記者類型時，日常生活所使用的「語言」便成為重要的參照之一。據吳濁流記載，自己是抵達大陸後，居住在友人章君家時，開始學習中國話，是透過傅君介紹的女家教密集的上課、學習，以及透過與友人余君的夫人（滿洲人）談話中練習中文⁶⁸。換句話說，吳濁流在抵達大陸前，並沒有具備任何的「中文」能力。前往大陸之前，吳濁流在台灣生活了四十一年時間，受的是殖民地的日語教育，日常生活使用的語言應為日語以及客家語（吳濁流為客家人），如果吳濁流在大陸擔任的是在一般民間蒐集採訪這類型的記者，對當時的他來說採訪的過程中必然存在著「語言」的問題，吳濁流要在短時間內以剛學習的語言「中文」來採訪南京民間，是有其困難性的。

然而此點卻不能完全否認吳濁流曾撰寫過南京風俗民情類型的報導的可能性。不過可以說明的是，當時的吳濁流並無法完全以中文與南京民眾溝通，因此他在《大陸新報》所撰寫的報導中，紀錄南京生活民情的題材的篇章⁶⁹可能只是

⁶⁵ 吳濁流，《無花果》，頁 126。底線為筆者所加。

⁶⁶ 吳濁流，〈南京雜感〉，《吳濁流作品集(4)南京雜感》（台北市：遠行出版社，1977 年 9 月初版），頁 78。底線為筆者所加。

⁶⁷ 吳濁流，《吳濁流作品集(5)黎明前的台灣》（台北市：遠行出版社，1977 年 9 月初版），頁 97。

⁶⁸ 吳濁流，《無花果》，頁 125-126。

⁶⁹ 而且紀錄南京的文章與吳濁流返台後於《台灣藝術》上所發表的「南京雜感」系列文章內容

少數（並非主要的採訪內容）。而透過吳濁流通曉日語這點來看，以日語與日本人交談或是於日本政府的相關機構工作的可能性很大。此點與他前往大陸的方式（友人章君的安排）以及本身具備的「台灣人」的特殊身份一樣，皆加強了吳濁流的記者工作應與日本政府有關。

1941年吳濁流開始擔任《大陸新報》的記者，《大陸新報》所具備的官方色彩影響著報紙的走向，並與當時位於南京的汪精衛政府有所連結。從吳濁流的採訪記錄中可見其端倪。觀看吳濁流 1942 年至 1943 年發表於《臺灣藝術》上的「南京雜感」系列文章時便可發現，有六篇文章並未被收入在戰後出版的《南京雜感》中譯本中。這些文章皆紀錄了吳濁流對汪精衛與汪精衛政府中擔任要職的重要人士之接觸與觀感，分別是汪精衛、褚民誼、周佛海、陳群、梁鴻志（分別為：敘述汪精衛的〈國府要人印象記〉、〈南京要人印象記：褚民誼〉、〈南京要人印象記：周佛海的容貌〉、〈南京要人印象記：陳內政部長的豪邁樣態〉、〈南京要人印象記：梁院長的穩健人物姿態〉⁷⁰，另有一篇提到汪政府委員張永福的文章〈南京雜感（五）：南京的明朗色〉也被刪除）。透過文章容可以窺見當時吳濁流與汪政府間的互動⁷¹。這些文章也記載著吳濁流會面的原因是前往「採訪」，進而呈現記者身份：

我在昭和十六年的夏天，我與西島支社長、上野編輯部長曾經一起受到他（按：陳群）的款待。……昭和十七年的春天，孫文紀念日的前一天，我也曾和中澤君一起在古色蒼然的內政部會客室中訪問他。⁷²

在〈南京雜感（五）南京の明朗色〉中也曾寫道採訪曾參與同盟會組織的重要人物張永福一事：

我進入大陸新報開始沒多久之後，就曾經和朝日新聞的安田君一起訪問莫

相似，所以吳濁流曾撰寫相關報導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關於《臺灣藝術》上的「南京雜感」系列文章，筆者將於第三章詳述。

⁷⁰ 以上三篇原文篇名分別為：〈南京要人印象記：周佛海氏の容貌〉、〈南京要人印象記：陳內政部長の豪華ぶり〉、〈南京要人印象記：梁院長の大人ぶり〉。要人，意指擔任要職的人。

⁷¹ 文中亦提及於汪政府任職的台籍友人彭參事。「我的車直接在公館的中庭停下來後，彭參事已經在那邊等著了，我慌張的跳下車，打了招呼。彭參事要僕役將大陸新報贈送的畫運入公館中」。（原文：私の車が直接公館の中庭に止ると、そこにはもう彭參事が待ってゐた。私はあわて、車から跳び降りて、挨拶を交した。彭參事は使用人を手配して、大陸新報贈呈の絵を公館に運び入れた）。吳濁流，〈南京要人印象記：周佛海氏の容貌〉，《臺灣藝術》第四卷第七號（昭和 18 年／1943 年 7 月 1 日發行），頁 34；「彭氏是同文書院的教授，汪政權成立時即被攬為財政部參議。彭太太曾是公學校教員，也是我五湖時代的舊知」。〈無花果〉，《臺灣文藝》第五卷第二十期（1968 年 7 月），頁 73。

⁷² 原文如下：「私が昭和十六年の夏、西島支社長、上野編纂部長と一緒に氏の招宴に預ったことがある。……昭和十七年の春、孫文紀念日の前日、私が中澤君と一緒に古色蒼然たる内政部接應室に氏を訪問したことがある」。吳濁流，〈南京要人印象記：陳內政部長の豪華ぶり〉，《臺灣藝術》第四卷第八號（昭和 18 年／1943 年 8 月 1 日發行），頁 32。

愁路觚園的主人張永福先生。⁷³

另一方面，吳濁流曾敘述自己任職《大陸新報》的契機，是因為在南京日本會議所擔任書籍《南京》的翻譯時，因為衝突事件被《大陸新報》的上野部長認識，進而邀請至報社工作。吳濁流並說道自己與上野一見如故，後來成為肝膽相照的好友⁷⁴。筆者查閱《大陸新報》後發現，吳濁流口中的上野應該就是《大陸新報》上海總社的發行人上野祝二。與發行人上野祝二的良好關係，以及「大陸新報社」的官方報紙角色，加上上述一系列《臺灣藝術》上記載與南京汪政府相關人士會面的文章內容，筆者認為吳濁流的工作內容應與南京汪精衛政府有關。由此推斷第二種可能的記者類型為專門採訪南京汪政府相關新聞的社會線記者。

由上述記者生活的討論中，可以歸結一個重要的問題點，即吳濁流的行走路徑與日本政府之間的連結。吳濁流為何選擇在四〇年代這個敏感的時間點前往同樣為日本政權統治下的南京？與吳濁流來自殖民地台灣應該有關。首先是吳濁流自身所具備的「身份」的敏感性——「被殖民」的「台灣人」的「身份」前往大陸受日本扶持的汪精衛政府所用——。因而筆者認為吳濁流當時擔任社會線記者的可能性相當高（而非為文藝版撰稿）。下節筆者將進行《大陸新報》的介紹，並融合上述推論展開吳濁流記者時期（1941年至1942年）之篇章的討論。

第三節、1941-1942 年的南京《大陸新報》

《大陸新報》(THE TAIRIKU SHIMPO)為中日戰爭期間日本政府於大陸「淪陷區」的重要官方報紙。從昭和 14 年（1939 年）1 月 1 日創刊開始，至昭和 20 年（1945 年）9 月為止，共刊行 7 年時間。報紙每日的第一版中即寫明發行機構「大陸新報社」位於上海（地址：上海市西華德路二八八號），發行人為上野祝二，社長為福家俊一，南京支局長為西島五一。報紙刊登內容清楚記載社長與支局長的名字⁷⁵、總社與支社與支局所等所在地的資訊（除了總社上海外，《大陸新報》在武漢、南京、漢口等地甚至是東京皆設有支社），以及與日本政府的連結⁷⁶。每日第一版即寫明「大陸新報社」的分支有《新申報》、《武漢大陸新報》

⁷³ 原文如下：「私が大陸新報に入ってから間もない頃、朝日新聞の安田君と一しよに莫愁路觚園の主人張永福先生を訪問した」。吳濁流，〈南京雜感（五）南京的明朗色〉，《臺灣藝術》第四卷第二號（昭和 18 年／1943 年 2 月 1 日發行），頁 38。

⁷⁴ 吳濁流，〈無花果〉，頁 129。

⁷⁵ 記載篇名：福家俊一，〈大陸新報の使命〉（昭和 14 年 1 月 1 日創刊號第二版）、本社南京支局長 西島五一，〈新聞使命に邁進—南京新聞から大陸新報へ—〉（昭和 14 年 1 月 6 日第五號第八版）。

⁷⁶ 昭和 14 年（1939 年）1 月 1 日（日曜日）創刊號（第一號）第一版中〈本社通信網〉寫道：「本社上海西華德路二八八 東京支社、東京市麴町區有樂町一ノ二 南京支社、南京中山北路 支局所在地 漢口、廣東、香港、杭州、蘇州、蕪湖、鎮江、無錫、北京、天津、青島、南京、大連、京城、張家口」；昭和 16 年（1941 年）10 月 29 日（水曜日）第 1020 號第一版的〈社告〉一文中記載：「本社於昭和 14 年 1 月 1 日在漫布於硝煙中的上海創刊……，社長福家

與《南京大陸新報》三報。其中《新申報》為中文報紙⁷⁷，其餘皆為日文報紙。

透過報導時事的篇章中，常見從不同支社傳遞而來的文章，這些報導通常依記者所在地屬名【東京支社○日特電】、【武漢支社○日特電】、【南京支社○日特電】或是【東京特派記者】、【南京特派記者】、【南京支社○日發】等標記。透過這些標記可印證支社存在的事實，並由各地支社互通報導一事來看，可瞭解上海總社與日本東京之間保持著聯繫的關係。

《大陸新報》每日約有四至八版不等，其中報紙每日的頭版（第【一】版與第【二】版）所刊載的文章通常皆為記載時事的社會性報導。在每日第【三】版之後才會出現生活及文藝面向的文章。第【一】、第【二】版的社會性報導包含：中日戰爭記錄、國際要聞（美國、新加坡等國動向）以及大東亞共榮圈的宣導等記載。無論每日的版面多寡，從整份報紙所刊載的報導類型中可以發現，報紙呈現了非常明顯的社會性色彩，而「文藝欄」⁷⁸及「生活欄」在整份報紙中所占的篇幅並不多，如此可見《大陸新報》所具備的濃厚時代性與官方立場的角度。

後一……」。(原文：本社は硝煙濺ふ上海に昭和14年1月1日創刊して……，社長福家俊一……)；吳濁流於《無花果》第八章〈在南京當日本報記者〉中也曾提到「我請上野先生(筆者按：《大陸新報》發行人)替我連絡上海的本社……」。吳濁流，《無花果》，頁138；另外，昭和14年1月的報紙中也刊載日本政府相關人士的文章，如「大陸新報の發刊を祝す」專欄中的四篇文章(昭和14年1月1日創刊號第一版)：內閣總理大臣 近衛文麿，〈建設之筆的期待〉(建設の筆に期待)、海軍大臣 米內光政，〈新文化創造方向〉(新文化創造へ)、陸軍大臣 板垣征四郎，〈開展興亞的筆陣院〉(興亞の筆陣を張れ)、外務大臣 有田八郎，〈中南支言論的重鎮〉(中南支言論の重鎮)。以上文章符合《朝日新聞社史》中記載：「昭和十四年1月創刊の『大陸新報』，是在華中地區的日本的國策報紙，在陸軍、海軍、外務三省以及興亞院的後援下設立，本社在上海。部分大陸新報的人員是由從朝日新聞移轉而來」。(原文：昭和十四年元日創刊の『大陸新報』は、華中における日本の國策新聞で、陸軍、海軍、外務三省と興亞院の後援で設立、本社を上海においた。朝日から相当の人員が大陸新報に転じた)。《朝日新聞社史(大正・昭和戦前篇 1912-1945)》(東京：朝日新聞社，1995年7月25日)，頁625(底線為筆者所加)；以上引述均可證實「大陸新報社」的位置及其與日本殖民政府間之聯繫，足見戰爭時期這份報紙在大陸的重要性。

⁷⁷ 「《新申報》，大陸新報社在上海發行的親日派新聞。日中戰爭下的中國有三個政權。蔣介石於重慶的國民政府、溥儀的滿洲國、汪精衛於南京的新政府。……《新申報》的「親汪」、「親日」立場明確。日本占領上海後，中文報紙有一半被迫廢刊，唯有《新申報》、《中華日報》、《新中國報》與《國民新聞》等報紙殘留，那是因為這些報紙皆被視為親日派的報紙」。(原文：『新申報』、大陸新報社上海で発行された親日派の新聞。日中戦争下の中国には三つの政権があった。蔣介石の重慶にあける国民政府、溥儀の満洲国、汪精衛の南京における新政府である。……『新申報』は「親汪」、「親日」の立場を明確にしている。日本軍による上海占領後、中国語新聞の大半が廃刊を余儀なくされ、『新申報』、『中華日報』、『新中国報』、『国民新聞』など数紙を残すのみとなったが、これらはいずれも親日派と目される新聞である)。西野嘉章編，《プロパガンダ 1904-1945 新聞紙・新聞誌・新聞史》(東京都：東京大学総合研究博物館，2004年5月14日)，頁85。而在《朝日新聞社史》中也記載：「又，大陸新報社與現地軍報道部發行的中文報紙《新申報》合併為姐妹報」。(原文：また、大陸新報社は、現地軍報道部が発行していた華字紙『新申報』を合併して姉妹紙とした)。《朝日新聞社史(大正・昭和戦前篇 1912-1945)》，頁625；以上敘述均證實《新申報》為中文報紙之事實。

⁷⁸ 在此所稱的「『文藝』欄」由報紙版面中註明「文藝」兩字而來。如1941年1月18日第【八】版。

而在第【三】版之後的《大陸新報》，也出現了專門針對中國大陸生活的介紹與報導，如：支那料理、戲劇、流行歌等介紹、涉及語言的篇章，以及關於日本消息的篇章，如：「日本市況」、「日本留學」（日本留学に）等專欄。其中，當時報紙的「文藝欄」即出現了青野季吉、中村地平、林芙美子等知名日本作家的作品。觀察後可以發現，「文藝欄」刊載的評論與文學創作，發表人幾乎為日本作家，大陸作家較少。由此筆者歸納出戰爭時期的《大陸新報》有著「文藝作品與作家偏向以日本為主，而生活方面則集中於中國大陸的討論」這樣的特性；另一方面，1941年3月的《大陸新報》的第【五】版中，出現了一系列屬名「紙上『上海語速成講座』開設」的連載文章，刊載的內容包括：以日文拼音，介紹中文數字的唸法的文章〈數字的唸法〉（数の呼び方），或以日文拼音介紹中文數量詞（一個、一隻等）的唸法的文章〈數人數的方法〉（人数の数へ方），等。透過此系列文章，可推測此報的讀者群應集中於日常生活中習慣使用日語者。

正因《大陸新報》身為重要「官方報紙」的角色，報紙內容呈現著以時局為重的特性。若是報導時正面臨國際重大事件，報紙就會呈現「時代性更加鮮明，文藝或生活方面的文章顯得更為薄弱」的狀況。如1941年12月8日開始，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大陸新報》充斥著戰爭消息的報導，如1941年12月9日及12月18日的「夕刊」⁷⁹第一版中，即以斗大標題寫明「帝國今早與美英的戰鬥開始」（帝國今曉米英と戦闘開始）、「皇軍的攻擊越來越急！」（皇君の攻撃愈よ急！）。從報紙刊載：推行的大東亞共榮圈、紀錄汪精衛活動與近衛文磨消息等報導中，清楚呈現著《大陸新報》身為彙整日方消息的官方機關報的事實。透過報紙內容反映的是中日戰爭時期大陸在日本政權之下的狀況，以及成為連結日本政府、南京汪精衛政府以及殖民地台灣三重關係的媒介之一。此點更加強化筆者上述關於吳濁流擔任的記者類型之推測。

《大陸新報》從1939年1月1日發行開始，刊行時間重疊了中日戰爭的敏感時期，加上報紙本身的官方立場角度，因而呈現偏向社會性報導為主的狀況。因此，吳濁流擔任記者時所撰寫的報導，便可能顯現以掛名「南京支社」發表的狀況。正如上述筆者對於吳濁流記者類型的推測，因而筆者認為吳濁流極可能是撰寫報紙每日刊載社會性報導的第【一】、第【二】版中屬名【南京支社○日特電】、【南京特派記者】的時事報導。這類報導內容通常涉及紀錄汪精衛以及汪政府重要人士的言論與行程；本節筆者將透過文章內容的對照，找出證實報導文章為吳濁流所寫的證據。並分析這些報導內容，為吳濁流的《大陸新報》記者生活做一個系統性的整理。

⁷⁹ 「夕刊」（ゆうかん），即晚報。筆者查閱《大陸新報》發現，於1941年1月9日（木曜日，第729號）時就已出現一天發行兩種型態（早報與晚報）報紙的趨向。而與《南京雜感》內容相似的文章幾乎都刊行在「夕刊」的第二版上。

首先是筆者參照〈南京雜感〉內容後整理而來的可能為吳濁流撰寫的篇章⁸⁰：

| 刊行處 報紙 日期 | 《大陸新報》 | 《南京雜感》 (相似的內容) |
|--|--|---|
| 1941/03/28 (金曜日) 「夕刊」 第 806 號第 (二) 版 | <p>專欄「還都一周年を迎える南京」(三)：〈水温む玄武湖〉</p> <p>此處にも市民の取り戻したもう一つのもの一安●〔=息?〕玄武湖は南京唯一の公園。周囲の五、六里もある湖で湖中に五大洲を●〔=象?〕った欧洲、英洲、亜洲、澳洲、●〔=菲?〕洲と五つの湖があつて五洲公園とも呼ばれてゐる。春に湖水ようやく温む、今日この頃、三々伍々とと姑娘達が湖畔の楊柳芽ふく木蔭を●●〔股阪?〕湖上を畫舫に棹さしてゐる、姿は正に一篇の詩であり一幅の画である。(写真は湖畔を散策する姑娘)</p> | <p>〈南京雜感：四、南京の名勝古蹟巡禮——玄武湖の畫舫〉⁸¹</p> <p>花的明孝陵和蓮的玄武湖是南京的兩大遊覽地，經常遊客不絕。玄武湖在玄武門外，近鬧區，是散心最方便的地方。傳說孫吳——即孫子和吳子曾在此湖上練武，周圍四、五里，到夏季，湖上一面是蓮花，載著遊客的畫舫，由姑娘操著槳，在花間來來往往。玄武湖一帶，稱為五洲公園，名為新洲、老洲、長洲，菱洲、芷洲，是由世界五大洲而來的名字。各洲之上，有湖神廟、賞河廳、觀音亭、湖心亭、大仙樓等，在那裡啜飲龍井茶，眺望蓮花，是南京情調之一。</p> |
| 1941/11/09 (日曜日) 「夕刊」 第 1031 號 第 (一) 版 | <p>〈國民黨四中全会 明日から南京で開く〉</p> <p>【南京支社八日發】 純正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會議は九日から十一日まで南京</p> | <p>〈國府要人印象記〉⁸²</p> <p>第一次見到汪主席是在全國中央宣傳會議上。全國中央宣傳會議在上海路的中獨文化協會舉</p> |

⁸⁰ 此處整理的《南京雜感》內容，均以 1942-1943 年刊登於《臺灣藝術》上的原文為主。而因部份《臺灣藝術》期數未尋獲，有原文散佚的情形，這些沒有原文的內容，筆者將採取中譯本內容分析（每篇文章標題旁皆會註明使用版本）。而《大陸新報》中無法辨識的字，以「●」代替。

⁸¹ 吳濁流，《南京雜感》中譯本，頁 101。

⁸² 吳濁流，〈國府要人印象記〉，《臺灣藝術》第四卷第四號（昭和 18 年／1943 年 4 月 1 日發行），頁 32。

| | | |
|--|--|--|
| | <p>において開催される。目下中央執行委員同常務委員陳公博、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氏以下中央執行委員同監察委員第一百十六名が南京に参集してゐるが会議は九日早朝汪主席以下全員が孫文総理の眠る中山陵に参拝した後、九時から議事に入るが、世界趨勢に対処する態度、日華基本條約の實踐策、新中國建設に対する國民黨の具體策を全面的に決定するものと見られてゐる。</p> | <p>辦，……昭和十六年十一月九日至十一日三天間，於南京召集全國和平地區的中央執監委員，並於湖南路丁家橋的中央黨部舉辦第四回全國中央委員會議。</p> <p>原文： 汪主席のお顔を最初に拜見し得たのは全國中央宣傳會議の席上であつた。全國中央宣傳會議は上海路の中獨文化協會に於て開催され……、昭和十六年十一月九日より十一日まで三日間にわたり、全國和平地區の</p> |
| <p>1941/11/12 (水曜日) 第 1034 號 第(一)版</p> | <p>〈四中全會宣言内容〉</p> <p>昨年十一月卅一日中日基本條約締結せられ同時に中日滿共同宣言が發表せられて相互愛敬の下に東亜復興の使命を負担せん事を期し爾來国府は全國を領導し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方面において計画と建設を推進めたのであるが、これに反し重慶方面においては尚頑迷にして悟らず内においては無意義な抗戰を繼續し国力を挙げて価値なき消耗となし、外に對しては英米帝國主義の力に依存し以て余喘保たんとして売国的行為を敢へて為しつつあり、こゝにおいて全面和平は尚實現するに至らず、戦火尚繼續され危機は日と共に深まりつつあるのである、惟ふに茲數ヶ月間若し重慶における共匪の操縦と攪乱及び英米の資産凍結封鎖の實行がなかつ</p> | <p>中央執監委員を南京に召集し、湖南路丁家橋の中央黨部に於て第四回全國中央委員會議が開催された。</p> |

| | | |
|--|--|---------------------------------|
| | <p>たならば国府治下における財政の困難、民生の窮迫は必ずや解除せられ文化の整備も軍備の拡充も必ずや成就したであらう、吾人は環境の困難と実力の不十分なるを常に顧みては自ら戒め同時に奮闘努力の対象としてゐるのであるが過去一ヶ年来の對内對外工作にして吾人の執りたる方針は遅しく前進した、最も必要なことは吾人の精神と赤誠と責任觀念であつて国家の危機は唯吾人の堅忍沈着によつてのみ救ふことが出来るのである、しかし中国の現在に最も必要なことは新国民運動の展開である 我々は須く新国民運動を發揮すべきであり、この運動は精神建設と物質建設を併して一とし精神方面においては至誠奉公の誠を致し、物質方面においては克苦勉勵小を加へて大をなす習慣を起さしめしかして和平反共建国は中国にとって唯一の出路であることを確信し心力物力を一にして各自の努力を期すべきである、この努力を先づ一般の同志に普及せしめてその●●となし次いで一般同胞に普及せしめて中華民國の全域鐵壁を決意せねばならぬのである。</p> | |
| <p>1941/11/13 (木曜日) 第 1035 號</p> | <p>〈國府要人中山陵參拜(孫總理 生誕紀念日)〉</p> | <p>1、〈國府要人印象記〉⁸³</p> |

⁸³ 出處同上註。

| | | |
|---|--|---|
| <p>第(一)版</p> | <p>中国の父と仰がれる孫文の第七十六回の生誕紀念むかへて昨十二日國民政府各要人等は汪主席を始めうちそろひ午前九時中山陵に、嚴肅なる祈りをさゝげた。 (写真は中山陵参拜の汪主席)</p> | <p>全部的委員在第一天九日的上午八點於中山陵集合一同參拜國父的陵墓。我與當日擔任記者的同事醍醐君與野田君，一起在上午七點半前往中山陵。一百一十六名的委員伴隨著緊張的笑容陸續地登上中山陵。</p> |
| <p>1941/11/13 (木曜日) 「夕刊」 第 1035 號 第(二)版</p> | <p>〈汪主席中山陵参拜〉 これより先、汪主席は僅か数名の関係者を随へ秋冷の氣爽やかな中山陵に参拜、師父の遺像に向ひ和平建国への邁進を誓つた後、奥殿の国父靈柩に禮拜を行った。 午前八時半公館を出発した汪主席一行の車は青天白日旗に埋る街道を中山陵に到着、端麗な正装の支那服の裾をなびかせつつ朝日に輝く石段を些かの疲れも見せず靈前へと急いだ。 紫金山の秋色はます々々濃く紅葉は一しほ美しい、黙々と登る汪主席の顔は紅潮し、昨日閉幕の四中全会で発表した宣言の興奮はまだ余韻を残してゐるかのやうだ。 花輪にかこまれ紅燈たゆたふ中にそびえた国父の像はけふのよき日に愛弟子を迎へて一入和やかに見える、感慨無量の面持ちで師父に相對した汪主席は、静かに三拜の禮を行ひ、馥郁と香る菊花一束を尊像に捧げた。</p> | <p>原文： 第一日の九日午前八時全委員は中山陵に参集して國父の陵墓に拜謁した。當日記者は同僚の醍醐君野田君といしよに午前七時半中山陵に赴いた。百十六名の委員は緊張せる笑を漂べ乍ら續々中山陵に上った。 2、〈中山陵的偉容〉⁸⁴ 紫金山南面中腰上有中山陵，和明孝陵相距不遠。陵墓之前有廣場，上了數段臺階，入口處是像旌表似的門，懸著「博愛」的匾額，自此便有大石板鋪路直達。陵門。…陵門是膜拜的地方，一般瞻仰者都在此行禮。陵門有三個，裝有鐵柵，進入裏面，便有大石碑，刻著「民國十八年六月一日中國國民黨葬總理孫先生於此。」…祭堂在紫金山中腹，是全無俗塵的清淨之地。祭堂內部頗為廣闊，有典禮的時候，能容納數百人，中央有著漢服，大理石的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白色雕像。</p> |

⁸⁴ 吳濁流，《南京雜感》中譯本，頁 109-110。

| | | |
|--------------------------------------|--|---|
| | 胸中に去来する感慨を真一文字に結んだ唇にかくして汪主席は国父像背後の靈柩室に歩を運び入口で直立不動の姿勢を取り厳かな敬礼を行ひ、こゝに意義深き参拝の儀式を終へた、只一人廣場の片隅に立ち晴れてゆく霧の間に浮べ出る南京市街を暫く俯瞰した、かくして終始沈黙を守り続けた汪主席は再び車上の人となり九時四十分大禮堂の儀式に臨んだ。 | |
| 1941/10/03 「夕刊」 第995號第 (一)版 | <p>〈駐日大使に徐良氏 褚民誼外交部長へ〉</p> <p>【南京支社二日發】 国民政府では二日中央政治委員會議を圍き駐日大使更迭を決定した、即ち新駐日大使には現外交部長徐良氏を任命、現駐日大使褚民誼氏は外交部長に●●〔転任?〕せしあることになつたが、徐新大使は本月末或は十一月初旬には赴任の予定である。 (写真は徐駐日大使(上)と褚外交部長)</p> | <p>〈南京要人印象記：褚民誼〉⁸⁵</p> <p>我最初訪問他(按：褚民誼)的时间是在昭和十六年，他由駐日大使轉職擔任外交部長於南京出發的前天。</p> <p>原文： 私が最初に氏を訪問したのは昭和十六年で、氏が外交部長から初代駐日大使に榮轉され南京を出發する前日であつた。</p> |

根據以上表格內容，可歸結出吳濁流可能撰寫的兩種文章類型，第一類即「南京風俗類」文章。1941年3月26日發行的《大陸新報》「夕刊」上「南京素描」的專欄中，有一篇名為〈南京驛⁸⁶(一)〉的文章，內容敘述作者自身於南京車站的所見所聞。這樣紀錄著南京生活民情的題材，對照吳濁流返台後在《臺灣藝術》上發表的「南京雜感」系列文章，相似度相當高。雖然此篇文章以「一」的標題刊出，然而直至1942年3月(吳濁流離開南京的時間點)為止，《大陸新報》中卻未曾再出現屬名「南京素描」的連載文章。正因報紙中沒有再出現標號「二」

⁸⁵ 吳濁流，〈南京要人印象記：褚民誼〉，《臺灣藝術》第四卷第六號(昭和18年/1943年6月1日發行)，頁26。

⁸⁶ 驛(同駅)：えき，車站。「南京驛」意指南京車站。

以後或是「南京素描」標題的文章，因而筆者認為，之後刊出的同系列文章，或許有更換專欄標題的可能。

依筆者所推測，〈南京驛(一)〉一文刊出後的隔天，即出現標號「二」的第二篇相同類型的文章，為 1941 年 3 月 27 日「夕刊」中專欄「迎接還都一周年的南京⁸⁷」(原題：「還都一周年を迎へる南京」)中出現了〈圓環(二)〉一文(原題：(ロータリー⁸⁸(二)))。此文描寫的是南京新街口的熱鬧情景。這篇與〈南京素描：南京驛(一)〉相差一天的報導，則是以「二」的標題刊出，雖然兩篇文章的專欄名稱不同，但就兩篇文章題材的相近度(車站、十字路口以及街口等相關描寫)，以及「一」與「二」這樣連貫的標題兩點來看，使得筆者產生兩篇文章為同一作者的聯想。然而對照〈南京驛(一)〉、〈圓環(二)〉兩文與〈南京雜感〉的完整內容，卻沒有找到完全相符的内文，雖然〈南京驛(一)〉⁸⁹與〈圓環(二)〉⁹⁰兩文所呈現的場景與〈南京雜感〉的寫作題材相似度很高⁹¹，但無法證實兩篇文章為吳濁流所寫。

而在 1941 年 3 月 28 日「夕刊」中同樣的專欄「迎接還都一周年的南京」(「還都一周年を迎へる南京」)中，也有一篇以「三」的標題刊出的文章〈溫暖的玄

⁸⁷ 所謂的「還都一周年」指的是 1940 年成立的「南京國民政府」屆滿一年之意。

⁸⁸ 英文 rotary 之意，意指圓環。

⁸⁹ 此文以南京車站為描寫對象，如交通擁塞、頻繁出現的日本人乘客、火車通行上海與南京的情形，以及中國調查員調查行李等情景。原文如下：「さすがに首都の表玄関、入る列車の全部鈴なり満員、その交通量はすさきじいものである、開通当時は日本人の乗客が多く何となく内地の省●を思ひ出す風景だったが、近頃では南京と上海がら午前と午後にそれぞれ出る各二本の特急エ馬の大部分は支那人の乗客なのか新首都の成長が僥ばれて頼母しい、南京驛では荷物を調べるのも支那人巡捕、この間をまるで引為のやうに 沢山荷物を持った支那人乗客がゴツタ返して正に交通地獄うっかりすると席をとれずに上 上海南京間を五時間半を立ち通しなどといふ悲惨(らき)にある。それでも新生支那の息吹がヒシヒシと身に生まれば嬉しい情景である」。刊登於昭和 16 年(1941)3 月 26 日(水曜日)第 804 號《大陸新報》「夕刊」第【二】版。

⁹⁰ 此文描寫南京繁榮的新街口街景。原文如下：「新街口 上海と対●的な支那の●●〔=南京?〕を想像する人々はこのロータリーに立ったちその大街的景にビツクリするだらう、こゝは駅からは江門をくぐって真直に走る中山北路と南山門へ抜ける中山東路の交差点の繁華街で●●●●●●とへ住良い、立派なアスファルトの通りにマーチョ(馬車)がパカパカと春風に快い音●〔=奏?〕でるのが伝統支那のほひをまいて奥床しい、向ふに見へる白●の堂々たる建物は新興支那●●〔=金融?〕の●●中央●〔=準?〕備銀行の本店である」。刊登於昭和 16 年(1941)3 月 27 日(木曜日)第 805 號《大陸新報》「夕刊」第【二】版。底線為筆者所加。

⁹¹ 《大陸新報》上〈圓環(二)〉一文與吳濁流的〈南京雜感〉中皆有「新街口」的相關內容。〈南京雜感〉的相似文章：「新街口の西の漢中路には小商人がアンペラで建てた小店が多い。価が安くて日本人好みのものが並べられ、奥様連中を相手に相互とも不自由な外國語をあやつり乍ら品物の選擇に餘念のない場面は確に日華提携の美しい縮圖である」。吳濁流，〈南京雜感(五)南京の明朗色〉，《臺灣藝術》第四卷第二號(昭和 18 年/1943 年 2 月 1 日發行)，頁 38。底線為筆者所加；〈圓環〉的中山東路與〈南京雜感〉的漢中路，分別是南京商業聚集地「新街口」的東邊道路與西邊道路。然而比對文章內容後，僅能說明兩文寫作題材相同，而非內容完全相同，因此無法斷言兩篇文章為同一人所寫。

武湖) (水温む玄武湖)，文章內容與〈南雜感〉中吳濁流所撰寫關於遊歷玄武湖的內容一致性相當高。諸如描寫到乘坐畫舫（遊覽船）穿梭於湖上的蓮花與湖畔的楊柳間詩情畫意的感受，或是介紹玄武湖一帶以五大洲比擬的五洲公園：

湖中五大洲是因相似歐洲、英洲、亞洲、澳洲與非洲世界五大洲而來，因此被稱作五洲公園。⁹²

玄武湖一帶，稱為五洲公園，名為新洲、老洲、長洲，菱洲、芷洲，是由世界五大洲而來的名字。⁹³

以上三篇《大陸新報》中的文章，文章內容／題材皆涉及南京相關事物，且都刊載於「夕刊」的第二版中。刊載版面的固定加上標號的連貫性，是筆者認為三篇文章為同一系列文章的原因。加上文章內容皆與「南京」有關，如此加強了文章為吳濁流撰寫的可能性。

第二種吳濁流可能撰寫的報導類型，是與南京汪精衛政府相關的文章（「社會報導類」文章）。這些文章紀錄的是汪精衛在 1940 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曾參與的活動，並可由此觀看當時與日本政府相關的事務。〈南京雜感：國府要人印象記〉中曾記載吳濁流初次見到汪精衛的時間為昭和十六年（1941 年），此時間正是吳濁流擔任「大陸新報社」的記者之時，也是吳濁流與記者同業們一同參加 1941 年 11 月 9 日至 11 日於南京舉行的「第四次全國中央宣傳會議」（簡稱「四中全會」）之前：

第一次見到汪主席是在全國中央宣傳會議上。全國中央宣傳會議在上海路的中獨文化協會舉辦，……昭和十六年十一月九日至十一日三天間，於南京召集全國和平地區的中央執監委員，並於湖南路丁家橋的中央黨部舉辦第四回全國中央委員會議。⁹⁴

這段記載內容與 1941 年 11 月 9 日《大陸新報》第 1031 號「夕刊」第（一）版

⁹² 原文：「湖中に五大洲を●〔=象？〕った歐洲、英洲、亜洲、澳洲、●〔=菲？〕洲と五つの湖があつて五洲公園とも呼ばれてゐる」。「還都一周年を迎へる南京」（三）：〈水温む玄武湖〉。刊於昭和 16 年（1941）03 月 28 日（金曜日）第 806 號「夕刊」第（二）版的《大陸新報》。

⁹³ 〈南京雜感：四、南京の名勝古蹟巡禮——玄武湖の畫舫〉。吳濁流，《南京雜感》，頁 101。

⁹⁴ 原文如下：「汪主席のお顔を最初に拜見し得たのは全國中央宣傳會議の席上であつた。全國中央宣傳會議は上海路の中獨文化協會に於て開催され、……昭和十六年十一月九日より十一日まで三日間にわたり、全國和平地區的中央執監委員を南京に召集し、湖南路丁家橋の中央黨部に於て第四回全國中央委員會議が開催された。」。吳濁流，〈國府要人印象記〉，《臺灣藝術》第四卷第四號（昭和 18 年／1943 年 4 月 1 日發行），頁 32。底線為筆者所加。文獻亦顯示汪精衛曾參與「四中全會」。蔡德金，王升編著，《汪精衛生平紀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 年 6 月第一版），頁 327。

中標明【南京支社八日發】的報導〈國民黨四中全会 明天開始於南京展開〉（國民黨四中全会 明日から南京で開く）以及 1941 年 11 月 12 日第 1034 號第（一）版中的文章〈四中全会宣言內容〉，內容是完全符合的。

吳濁流寫道，1941 年 11 月 9 日至 11 月 11 日「四中全会」於南京舉行，11 月 9 日會前一百一十六名的委員一起前往中山陵祭拜：

純正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會議於九日開始十一日為止於南京舉辦。中央執行委員兼常務委員陳公博、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等人帶領下屬中央執行委員兼監察委員一百一十六名於南京集合，並於早上九點會議開始之前由汪主席帶領全體委員一同前往國父長眠的中山陵參拜，參拜之後，九點會議準時開始，將全面的討論：世界趨勢的對應態度、日華基本條約的實踐政策、國民黨對新中國建設的具體政策等議題。⁹⁵

關於祭拜一事，吳濁流在《臺灣藝術》發表的〈國府要人印象記〉一文也有記載：

全部的委員在第一天九日的上午八點於中山陵集合一同參拜國父的陵墓。我與當日擔任記者的同事醍醐君與野田君，一起在上午七點半前往中山陵。一百一十六名的委員伴隨著緊張的笑容陸續地登上中山陵。⁹⁶

而全員共一百一十六名委員前往參拜的壯觀場面，吳濁流在中譯本《南京雜感》〈中山陵的偉容〉一段也曾寫下中山陵祭拜場地寬廣一事：「祭堂在紫金山中腹，是全無俗塵的清淨之地。祭堂內部頗為廣闊，有典禮的時候，能容納數百人」⁹⁷，中山陵寬廣的場地，容納一百一十六名委員一事也得以理解。再者，《大陸新報》上 1941 年 11 月 13 日第（一）版〈國府要人中山陵參拜（孫總理生誕紀念日）〉一文（報導中並附上汪主席的祭拜照片），以及同天「夕刊」第（二）版的〈汪主席中山陵參拜〉一文，皆為記載中山陵祭拜一事之報導。透過上述文章內容的對照，均可證實這些以「南京支社」之名刊登的汪精衛報導，應為吳濁流所撰寫。

⁹⁵ 原文：「純正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會議は九日から十一日まで南京において開催される。目下中央執行委員同常務委員陳公博、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氏以下中央執行委員同監察委員第百十六名が南京に参集してゐるが會議は九日早朝汪主席以下全員が孫文総理の眠る中山陵に参拝した後、九時から議事に入るが、世界趨勢に対処する態度、日華基本條約の實踐策、新中國建設に対する國民黨の具體策を全面的に決定するものと見られてゐる」。〈國民黨四中全会 明日から南京で開く〉，刊於昭和 16 年（1941）11 月 9 日（日曜日）第 1031 號「夕刊」第（一）版的《大陸新報》。底線為筆者所加。

⁹⁶ 原文如下：「第一日の九日午前八時全委員は中山陵に参集して國父の陵墓に拜謁した。當日記者は同僚の醍醐君野田君といしょに午前七時半中山陵に赴いた。百十六名の委員は緊張せる笑を漂べ乍ら續々中山陵に上った」。吳濁流，〈國府要人印象記〉，《臺灣藝術》第四卷第四號（昭和 18 年／1943 年 4 月 1 日發行），頁 32。底線為筆者所加。

⁹⁷ 吳濁流，《南京雜感》，頁 110。底線為筆者所加。

另一方面，吳濁流也曾採訪汪政府中幾位擔任要職的人物，如褚民誼。吳濁流本人曾在〈南京雜感〉中寫道，採訪褚民誼的時間，是在褚民誼從卸下駐日大使轉而接任外交部長的前一天⁹⁸。根據歷史資料記載，褚民誼為 1940 年 12 月 22 日接任駐日大使，任期至 1941 年 10 月 2 日（之後由徐良接任），10 月 3 日褚民誼正式轉職為外交部長⁹⁹。對照《大陸新報》來看也獲得了契合的項目。昭和十六年（1941 年）十月三日第 995 號「夕刊」第（一）版中，刊載著〈駐日大使徐良 褚民誼就任外交部長〉（駐日大使に徐良氏 褚民誼外交部長へ）一文，內容清楚地記載「徐良接任駐日大使、褚民誼轉任外交部長」一事，報導寫明了出處為「南京支社二日發」，並刊登了徐良與褚民誼兩人的照片¹⁰⁰。而吳濁流在《南京雜感》中也寫道，自己於昭和十六年（1941 年）褚民誼轉任外交部長離開南京的前一天曾對他進行採訪。文章內容的重疊以及時間點上的契合，均可證實此篇文章也為吳濁流所寫（轉職的前天 10 月 1 日採訪，10 月 2 日刊登採訪報導）。

第四節、小結

上述三節的敘述，清楚地顯示了在大東亞共榮圈下《大陸新報》所處的重要位置。二〇年代起「上海」出現的台灣留學生組織，與三〇、四〇年代以來楊肇嘉、吳濁流、王詩琅等台籍作家共同擁有的「上海經驗」，說明了上海台籍人士匯集的現象。從中日戰爭爆發（日本殖民末期）開始，日本政府在東北（滿洲國）、北京（華北政務委員會）、南京（汪精衛國民政府）紛紛成立的政權，對照 1937 年之後台籍作家接連在上海、北京、南京各地就職的狀況，可說明當時台籍作家的停留地區與政府推行的「大東亞共榮圈」相關。另一方面，第一章所述的「南進政策」與日本經濟蕭條帶起的「失業潮」等因素，也是影響此時期台籍作家選擇前往大陸的原因之一。綜合上述背景及原因，因而形成台籍人士 1937 至 1945 年間前往大陸的趨勢。

觀察吳濁流大陸生活的行走路徑，是分析 1941 至 1942 年吳濁流記者生活的重要角度。吳濁流透過任職於南京汪精衛政府之友人章君拿取前往大陸的護照後，抵達大陸後先停留上海、後前往南京，此行走路徑應是友人章君的安排。抵達南京後，透過吳濁流自述與「大陸新報社」發行人上野祝二的友好關係，以及

⁹⁸ 原文如下：「私が最初に氏を訪問したのは昭和十六年で、氏が外交部長から初代駐日大使に榮轉され南京を出發する前日であつた」。吳濁流，〈南京要人印象記：褚民誼〉，《臺灣藝術》第四卷第六號（昭和 18 年／1943 年 6 月 1 日發行），頁 26。

⁹⁹ 〈褚民誼〉。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 增訂版（下）》（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 年 1 月），頁 2211；〈徐良〉。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 增訂版（上）》，頁 1196。

¹⁰⁰ 原文：「国民政府では二日中央政治委員會議を團き駐日大使更迭を決定した、即ち新駐日大使には現外交部長徐良氏を任命、現駐日大使褚民誼氏は外交部長に●●〔転任？〕せしあることになったが、徐新大使は本月末或は十一月初旬には赴任の予定である」。刊於昭和 16 年（1941）10 月 3 日（金曜日）第 995 號「夕刊」第（一）版的《大陸新報》。

〈南京雜感〉中對於汪政府下相關人士的會面等記錄，皆顯示了《大陸新報》的記者工作與南京汪精衛政府有關。另一方面，加上當時吳濁流受自身語言能力的限制（不諳中文），以及實際對照《大陸新報》與吳濁流返台後發表的〈南京雜感〉原文後所找出的相同內容。因此筆者認為，以「日語」採訪南京汪精衛政府，再以「南京支社」之名刊登於上海發行的《大陸新報》中，是 1941 年至 1942 年間吳濁流擔任《大陸新報》記者時最主要的工作內容。

另一方面，關於《大陸新報》的討論，除了吳濁流記者生活與汪政府報導的分析外，在閱讀此報的過程中，筆者也找到足以證實當時的大陸與台灣互相連結的資料，此資料強化著（日本殖民末期中）台灣與大陸一樣身為「大東亞共榮圈」下的一環之事實。如此說來，同時期在台灣應該有著與《大陸新報》相同性質的官方報紙的存在，或許也會刊登著與《大陸新報》上相同的報導內容。

依此推論來觀察，筆者找到一份於 1937 年發刊，由台灣總督府情報部編輯出版的報紙《部報》。此份報紙於台北市（台灣總督府所在地）發行，報導內容與同時期在上海、南京等地發行的《大陸新報》有著極大的相似性。且兩報同屬日本政府管轄下的官方報紙（皆以日文刊出），並皆於日本殖民末期開始刊行。筆者對照後發現，兩報在 1941 年 3 月 30 日與 4 月 1 日時刊登著同一篇報導。

上述《大陸新報》的討論中，於 1941 年 3 月 27 日至 28 日相繼出現的「迎接還都一周年的南京」（「還都一周年を迎へる南京」）專欄之後，3 月 30 日的報紙中也刊載了與「還都一周年」相關議題的報導，即標題為「今日還都一週年的盛典」（けふ還都一周年の盛典）的〈拋卻苦惱的重慶 邁向建設第二年！ 洋溢大地的和平之春〉（苦惱の重慶尻目に 建設第二年へ！ 大地に満々和平の春）一文。這篇同樣為南京支社撰寫的報導，內容記載了汪精衛將於「還都一周年紀念日」時於國府大廳召開演講，演講內容將涉及和平建國以及與重慶當局之關係等談話¹⁰¹。而筆者對照同時間於台灣發行的《部報》時發現，1941 年 4 月 1 日發行的《部報》第一一九號中也刊載了相同內容的報導¹⁰²，報導名為〈邁向和平建國之道——國民政府還都一周年紀念 汪主席吐露建國的至情〉（和平建國への

¹⁰¹ 全文如下：【南京支社二十九日發特電】大地に薫る満々たる和平の春と共に喜びの國府還都一周年記念日は遂に來た、想ひ起す去年のけふ、和平反共の大願を●〔掲？〕げつつ維新臨時兩政府を吸収して汪主席に領導された改組國民政府が新東亜建設の世界史的使命を分擔すべく南京還都を成就した日だ。以來一ケ年、条件必ずしも順調であつたとは言へないにも拘はず同政府は幾多の困難を克服し今や文字通り新中國を内外に代表する中央政府としての基礎成り敗殘重慶の苦惱を尻目に巨大な前進を続けてゐる、意義あるけふの、還都記念日を慶祝すると同時に更に和平建設の決意を新たにすべく國民政府では午前九時から國府大礼堂に嚴肅盛大な記念式を挙げるほか、管下各地機關でそれ々々慶祝紀念行事を催しかくて建設第二年の巨歩を踏み出すことはなつた。刊於《大陸新報》第 808 號第（一）版，昭和十六年三月三十日（日曜日）。

¹⁰² 《部報》的發行日固定為每月 1 日及 15 日，因此 3 月底的報導自然被刊登於 1 日發行的報紙中。

道——國民政府還都一周年記念 汪主席建國の至情を吐露)¹⁰³，此篇報導同樣記載了汪精衛參與了三月三十日召開的「國府還都一周年紀念式典」，並詳細紀錄其演講內容（演講內容多為強調透過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努力，中國應與東亞各先進國家團結一致，達到共存共榮東亞復興的共同目的，實現和平建國的願景）。

相同報導分別刊登在同時間、相同政權下不同地區的兩份官方報紙上的情況，已證實大陸與台灣兩方的官方報紙彼此相互聯繫的情況（擴大來看，《大陸新報》刊載的南京汪精衛政府、《部報》刊載的台灣總督府因同樣隸屬於日本政權，具備相似的性質，正如兩報刊登著共同的報導一樣）。也就是說，當時無論是大陸或台灣，皆被納入日本政府所推行的「大東亞共榮圈」體制下。因此汪精衛於南京的演講消息同樣也傳遞到台灣發行的《部報》上。正如《大陸新報》中不時會刊登由「東京支社」傳遞來的報導的情形一樣，再次證實了台灣、大陸與日本三者在日本殖民末期中受「戰爭協力」等政策的影響下相互連結的情景，也符合著日本政府大力推動的「大東亞共榮圈」之願景。同樣的願景一直持續影響著大陸與台灣；1942年3月吳濁流離開南京，返回台灣。



¹⁰³ 加藤聖文、谷ヶ城秀吉，《台灣總督府臨時情報部「部報」第10卷第113第124号／昭和十六年一月～六月》（東京都：ゆまに書房，2005年3月24日），頁304-308。

第三章 返台後大陸生活之相關作品：

《南京雜感》與《胡志明》（1942-1945）

1942年3月吳濁流返回台灣後，起筆撰寫的文章中，有著涉及1941年至1942年大陸經驗的內容。因為寫作時間接近吳濁流的大陸生活，因此在討論這段大陸經驗時，這些文本便被視為相當重要的參考資料。根據吳濁流創作歷程的記載，返台後寫作時間最接近1941年至1942年大陸生活的文本，為1942年至1943年連載於《臺灣藝術》上的〈南京雜感〉系列文章，以及1943年起稿、1945完稿，並於1946年出版的日文原文（第一版）《胡志明》（《亞細亞的孤兒》前身）。上述兩部作品皆在戰後被翻譯成中文出版，然而實際對照文章原文／日文內容時，發現了部份的原文內容並未被在中譯本《南京雜感》與《亞細亞的孤兒》中出現，因而出現日文與中譯本間內容上的差異。由於兩部作品的寫作時間與出版時間皆橫跨戰前至戰後，且出版前皆經過翻譯程序。寫作與出版時間的落差以及翻譯過程中所產生的文本差異，必須回歸原文對照才能清楚分析。由於前行研究幾乎使用戰後中譯本作為研究對象，分析時僅呈現中譯本內容，忽略了遭中譯本刪除的原文中存在的作家想法。中譯本出版時為何刪除原文？刪除原文後的中譯本內容是否與作家原文中表達的想法有所不同？這些都是尚待處理的議題。因此，本章將以兩部作品的日文原文內容為主，嘗試透過原文內容的細讀，分析吳濁流的大陸經驗。

本章第一節中筆者將先說明《南京雜感》的發表與刪略狀況，再透過刪略內容的整理與分析，歸納其共通點及前行研究忽略的部份。由於《胡志明》的刪略情形較為複雜，涉及的面向也較為廣泛，第二節開始筆者將集中針對《胡志明》刪略內容的探討。由於兩部作品在內容上有著重疊的情形，因此分析的過程中筆者將適時加入《南京雜感》的相關內容，嘗試統整分析。本章第二節與第三節將採「主題式」探討文本中的大陸生活內容，試圖從中分析吳濁流所描繪的大陸觀感，尤其將以戰後中譯本已刪除的內容為主，歸納這些內容的共通點，繼而呈現表達於原文中的想法，顯示戰後文本與前行研究的缺乏之處。第四節將總結以上內容。

第一節、《南京雜感》的發表情形與刪略特點

吳濁流於1942年返台後，開始撰寫一系列名為〈南京雜感〉的文章，發表於黃宗葵主辦的《臺灣藝術》。在四〇年代眾多的文學雜誌中，為何這系列記錄

大陸生活的文章會刊登在以「大眾化路線」著稱的《臺灣藝術》上呢？此點是第一個需釐清的問題。1944年吳濁流曾擔任《台灣新報》的文化部記者¹⁰⁴，對於記者工作以及撰寫〈南京雜感〉之事，後來的回憶錄中吳濁流如此敘述：

由於從南京回來後一年多，一直在「臺灣藝術」執筆南京雜感，因此得以認識該誌的和歌欄編輯。此人也是臺灣日日新報主筆，我便請這位主筆介紹，希望能進報社工作。經過幾次試驗，終於獲得採用。於是昭和十九年一開年，我就進了臺灣日日新報，再次開始記者生涯。¹⁰⁵

透過上段敘述，首先必須先釐清的是，《臺灣藝術》的和歌欄編輯為誰，以及此編輯與《臺灣日日新報》之間的關係（便可得知〈南京雜感〉系列文章的刊登契機）。河原功在〈《臺灣藝術》雜誌與江尚梅〉¹⁰⁶一文中指出，四〇年代台灣文壇的研究中，大多集中於1940年1月由「台灣文藝家協會」創刊的《文藝台灣》與1942年以張文環為首的《台灣文學》的探討。因為兩誌對於文學運動的貢獻，繼而成為四〇年代台灣文壇的代表性文藝雜誌。而另一份以「大眾取向」為主的文化雜誌《臺灣藝術》（1940年3月4日由「臺灣藝術社」創刊，黃宗葵擔任編輯兼發行人），在當時是一份擁有廣大讀者群的雜誌，影響力也不容小覷。

與《文藝台灣》與《台灣文學》兩誌不同的是，《臺灣藝術》並非隸屬於某個特定機關（團體），而是屬於以黃宗葵個人經營的雜誌¹⁰⁷，也可稱為小眾的（通俗的）文化雜誌。因為非隸屬於特定的團體，經營時就必須透過個人贊助以及刊登大量廣告（賺取廣告收入）作為發行的資金，在這當中，發行人黃宗葵便成為相當重要的角色。黃宗葵的人脈及交友狀況即是《臺灣藝術》內部成員（贊助人員）組成之因素¹⁰⁸。吳濁流寫作的〈南京雜感〉系列文章之所以能刊登在《臺灣

¹⁰⁴ 1944年台灣總督府將《臺灣日日新報》、《興南新聞》、《台灣新聞》、《台灣日報》、《高雄新報》以及《東台灣新聞》六報合併為《台灣新報》。黃得時曾言：「而我繼續服務於臺灣新報，地位也升為文化部長，負責主編文化版。而此時從『大陸新報』回臺的吳濁流兄也服務於文化部，幫忙我向臺北大學以及各方面拉稿」。黃得時，〈日據時期臺灣的報紙副刊——一個主編者的回憶錄〉，《文訊》第21期（台北市：文訊月刊雜誌社，1985年12月），頁64。

¹⁰⁵ 吳濁流，《無花果》（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88年8月），頁143。底線為筆者所加。

¹⁰⁶ 河原功，〈雜誌『台灣藝術』と江尚梅〉，《翻弄された台湾文学——検閲と抵抗の系譜》（東京都：研文出版，2009年），頁280-306。

¹⁰⁷ 原文：「文芸誌『文芸台灣』が台湾文芸家協会の機関誌であり、短歌中心の文芸誌『台湾』が台湾歌人倶楽部と強力な関係にあったのに対して、『台湾藝術』は機関誌でもなく、特定の団体との関係もなかった。まだ文芸雑誌や芸術雑誌が商業ベースに乗るような時代でなかったにもかかわらず、『台湾藝術』は黄宗葵の個人経営による商業雑誌として創刊されたのであった」。河原功，〈雜誌『台湾藝術』と江尚梅〉，《翻弄された台湾文学——検閲と抵抗の系譜》（東京都：研文出版，2009年），頁282。

¹⁰⁸ 資料記載，三〇年代時黃宗葵曾在東京開設中華料理店，因而結識不少台灣留學生，料理店並成為「臺灣藝術研究會」成員討論組織事務的場地。原文：「東京左翼臺灣人青年林兌、王白淵、吳坤煌、葉秋木、張文環等の手に結成せられる在京臺灣人文化サークルは、…其発展の間に於て非合法の實質的活動を併行せしむべきなりとし『臺灣藝術研究會』の名を以て當

藝術》上，應與《臺灣藝術》的內部成員有關。

1941年，黃宗葵透過友人蘇維焜，結識當時擔任教職的詩人江肖梅，黃宗葵力邀江肖梅擔任《臺灣藝術》的編輯長，經過多次溝通，同年9月江肖梅進入「台灣藝術社」工作¹⁰⁹。〈《台灣藝術》雜誌與江肖梅〉一文中也記載了吳濁流與江肖梅兩人的朋友關係，以及〈南京雜感〉系列文章刊登在《臺灣藝術》的原由：

吳濁流與江肖梅同為新竹人，（按：吳濁流）1920年由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是晚江肖梅三屆的後輩。之後因為成為公學校教師的關係（筆者按：因為與江肖梅擁有一樣的經驗），因此與江肖梅的關係頗深。吳濁流於1941年1月開始至1942年3月為止的大陸經驗，在江肖梅的安排下，陸續以「南京雜感」（第3卷第11號至第4卷第2號）「國府要人印象記」（第4卷第4號）「南京要人印象記」（第4卷第5至8號）為題刊登於《台灣藝術》上。¹¹⁰

上述記載可證實「南京雜感」系列文章刊登在《臺灣藝術》一事應是擔任編輯的江肖梅引薦¹¹¹，也可推測吳濁流於自傳中所述之《臺灣日日新報》主筆應為江肖梅。以上敘述足以說明1942年至1943年間吳濁流的〈南京雜感〉系列文章為何刊登於《臺灣藝術》上之原因。

依據文章內容，此系列文章內容以「南京雜感（記載南京的街景與民情）」

時官憲の信用ありとせる高砂寮長張福興を動かして会長とすべく計畫し、……次で更に王白淵が岩手県立女子師範學校教諭を罷免され、上京し来れるを機とし、十一月二十七日碓橋區相木町黃宗葵經營料理店に於て林添進、張文環、吳坤煌、吳鴻秋、魏上春、黃波堂等會合して同人の慰安會を催し、……」。台湾總督府警務局編，《台湾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 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台湾社会運動史》（台北市：南天書局，1939年7月初版），頁55-57。以上敘述足以說明，黃宗葵早在三〇年代便開始接觸《福爾摩沙》等雜誌的相關成員，因而擁有一些人脈。引文底線為筆者所加。

¹⁰⁹ 河原功指出，江肖梅入社後，《台灣藝術》的發行量激增。另一方面，編輯內容以追求「大眾性」與「娛樂性」而呈現著「大眾化路線」之趨向。原文：「江肖梅が編集長として入社して以来、『台湾芸術』の発表部数は急上昇を遂げた」、「江肖梅の入社で、『台湾芸術』が内容面で、より大衆性と娛樂性を追求することとなったことがわかる」。河原功，〈雜誌『台湾芸術』と江肖梅〉，《翻弄された台湾文学——検閲と抵抗の系譜》，頁289、291。

¹¹⁰ 原文：「吳濁流は江肖梅と同じく新竹の人間であり、国語学校師範部を一九二〇年に卒業、江肖梅の三年後輩にあたる。そしてやはり公学教師であった関係で、江肖梅との関係が深かった。吳濁流の一九四一年一月から四二年三月までの大陸体験は、江肖梅の計らいで、『南京雜感』（3—11～4—2）『国府要人印象記』（4—4）『南京要人印象記』（4—5～8）と題して『台湾芸術』に発表された」。河原功，〈雜誌『台湾芸術』と江肖梅〉，《翻弄された台湾文学——検閲と抵抗の系譜》，頁298。

¹¹¹ 吳濁流撰寫的〈悼江肖梅兄〉一文，也提到江肖梅採用自己作品一事。「我一畢業就與江前輩認識，爾來四十餘年成為志同道合的朋友，尤其是我由大陸回來之後，他主編『臺灣藝術』，我時常投稿，蒙他特別垂青，所投之稿通通採用」。吳濁流，〈悼江肖梅兄〉，發表於1966年4月第十一期的《台灣文藝》上，收於吳濁流，《吳濁流作品集(6)台灣文藝與我》（台北市：遠行出版社，1977年9月初版），頁170。

與「南京汪精衛政府重要人士採訪記錄」兩個類型為主，兩類型的內容皆有被刪除的情形，刪除的狀況以「南京汪精衛政府重要人士採訪記錄」一類為多。此處筆者將先對照〈南京雜感〉原文與中譯本，整理未被收錄於中譯本《南京雜感》中的文句與篇章。而後再依整理的內容，分為「文句」與「篇章」兩部份討論，分析這些內容被刪略之原因。

以下是筆者對照《臺灣藝術》上的〈南京雜感〉原文與中譯本《南京雜感》後所整理的刪略內容。首先是遭到中譯本刪除的原文文句：

一、中譯本《南京雜感》中刪略的文句

| 篇名／出處 | 刪略的日文（原文）文句 |
|---|---|
| <p>〈南京雜感〉 (一) 南京の相貌； (二) 南京の第一印象 《臺灣藝術》 第三卷第十一號 (1942年11月1日)</p> | <p>汪主席帶領四億民眾為今日即將成為和平建國首都投注不少心血，為即將瓦解的支那進行再建設，改造成為與日本一起合作朝完成大東亞戰爭邁進的新中國的首都。</p> <p>原文： 今や和平建國の首都として汪主席が四億の民眾を領導し心血を注ぎ込み、將に瓦解せんとする支那の再建を計って日本と提携して大東亞戰爭の完遂に邁進する新中國の都に変わって来たのである。</p> <p>章君是如彗星般一躍而起的時代性人物，報紙中也時常可以看到他的畫作。在求學階段，我與章君是好朋友，一直到今天只要想到章君，讓我抑鬱的心情就像是潰堤的湖水，如奔流般的湧出無法收拾。想到將渡海見到章君，我馬上作了一首詩送給他，告訴他自己想到中國的意願。</p> <p>優遊不斷廿餘年／忍靚雲迷東海天／拙策非驚才不足 ／雄心益壯意纏綿／漫教熱血匡時願／誓努和平濟大千 ／豈為封侯遊大陸／敢將文字博金錢。</p> <p>原文： 章君は彗星の如く一躍して時代の人物として登場し新聞にもときどきカツトに入れられてゐる。在學中、私は章君と仲好しで、それに刺戟されて今まで鬱積さ</p> |

| | |
|---|---|
| | <p>れた気持が堰を切り落された湖水の如く奔流されてしまった。私は早速章君に渡支することを打明け次の詩を送った。</p> <p>優遊不斷廿餘年／忍靚雲迷東海天／拙策非驚才不足 ／雄心益壯意纏綿／漫教熱血匡時願／誓努和平濟大千 ／豈為封侯遊大陸／敢將文字博金錢。</p> |
| <p>〈南京雜感〉 (四)章公館に於ける 閑遊 《臺灣藝術》 第四卷第一號 (1943年1月1日)</p> | <p>但是現在以清算這樣實行過頭的歐美思想為目的，標榜日本女性的良妻賢母主義的知識份子很多。國立模範女子學校校長萬女史與俞女史等女性也主張日本的良妻賢母主義，透過教育來實踐（按：良妻賢母主義）是個新方法。</p> <p>原文： しかし現在では此の行き過ぎた歐米思想を清算するため、日本女性の良妻賢母主義を標榜する有識階級が多い。國立模範女子學校長の萬女史や俞女史等の女性でも日本の良妻賢母主義を主張し、教育に實踐してゐる所は新しい方法であらう。</p> |

中譯本《南京雜感》已譯出的篇章中，究竟為何刻意刪除這些文句？試圖分析這些文句或許可以找出它們的共通性。1942年11月《臺灣藝術》所刊載的第一篇〈南京雜感〉中刪除的文句為：

汪主席帶領四億民眾為今日即將成為和平建國首都投注不少心血，為即將瓦解的支那進行再建設，改造成為與日本一起合作完成大東亞戰爭邁進的新中國的首都。¹¹²

這段文句是寫於文章第一部份「南京的相貌」中。吳濁流敘述自己抵達南京的時間及抒發中國性格的己見等感受後，開始將敘述焦點放置在「南京」地區上，如：南京為中國之樞紐、身為「和平建國首都」等定義，文章中並出現汪主席、「大東亞戰爭」、「新中國」等詞彙。透過當時的背景，可推測此段敘述應是受到1941年至1942年間，日本政府於大陸大力推行的戰爭協力以及「大東亞共榮圈」等意識的影響，而刊登當時（1942年）台灣同樣處於日本政府大力推行這些政策的狀況下，因此在《臺灣藝術》中刊登這樣的內容並不會受到日本政府的禁止，

¹¹² 原文：「今や和平建國の首都として汪主席が四億の民眾を領導し心血を注ぎ込み、將に瓦解せんとする支那の再建を計って日本と提携して大東亞戰爭の完遂に邁進する新中國の都に変わって来たのである」。吳濁流，〈南京雜感（一）南京の相貌〉，《臺灣藝術》第三卷第十一號（昭和17年／1942年11月1日發行），頁28。

反而有著推波助瀾的效力。但這樣涉及支持日本政府與南京汪精衛政府的言論，在戰後被視為敏感話題(尤其戰後接收台灣的國民政府並不承認戰時汪精衛於南京成立的政權)，中譯本的刪減動作得以理解。

吳濁流在此篇文章的第二部份「南京的第一印象」中提及在南京的友人章君，內容誇讚章君是如彗星般的時代性人物，並寫了一首詩送給章君及抒發自己的心情，這段文句也在中譯本出版時被刪除了。觀於此點可往後觀看〈南京雜感〉的第四部份「在鍾公館的閑遊」(中譯本標題)。此部分於1943年1月《臺灣藝術》上的原題為「章公館に於ける閑遊」。吳濁流於原文中是以「章君」稱呼友人，但《南京雜感》中譯本中皆改為「鍾君」，此點應與友人章君／鍾君的身份有關¹¹³，筆者認為章君任職於汪精衛政府下的身份，是此段文字被刪除的真正原因。此外，〈南京雜感〉第四部份中還有一段提及日本的良妻賢母主義的內容，中譯本並未收錄：

但是現在以清算這樣實行過頭的歐美思想為目的，標榜日本女性的良妻賢母主義的知識份子很多。國立模範女子學校校長萬女史與俞女史等女性也主張日本的良妻賢母主義，透過教育來實踐(按：意指實踐良妻賢母主義)是個新方法。¹¹⁴

由描述來看，吳濁流對日本的良妻賢母主義是抱持著肯定的態度，但這一段文句卻刻意被忽略，筆者認為，中譯當時不需再對日本昔日盛行的思潮多加褒揚的想法，應是這段文字被刪略的主要原因(筆者認為刪除此段文句並不影響「在章公館的閑遊／章公館に於ける閑遊」一篇中的其他內容)。以上是戰後發行的中譯本中，遭刪除的原文文句的整理與討論。以下筆者將討論未收錄於中譯本中的原文篇章(整篇遭刪除的狀況)：

二、未收錄於《南京雜感》中譯本中的篇章

| 原文篇名 | 主要內容 | 刊行之處 |
|---------------------|---|---------------------------------|
| 〈南京雜感(五) 南京の明朗色〉 | 闡述南京受中日戰爭影響的狀況。並提及曾採訪張永福 ¹¹⁵ 一事。 | 《臺灣藝術》 第四卷第二號 (1943年2月1日) |

¹¹³ 關於章君／鍾君的身份與翻譯問題，請參考本論文第二章第二節〈1941-1942年南京《大陸新報》之記者生活〉。

¹¹⁴ 原文：「しかし現在では此の行き過ぎた歐米思想を清算するため、日本女性の良妻賢母主義を標榜する有識階級が多い。國立模範女子學校長の萬女史や俞女史等の女性でも日本の良妻賢母主義を主張し、教育に實踐してゐる所は新しい方法であらう」。出處同上註，頁34。

¹¹⁵ 張永福(1872-1957)，1905年8月中國同盟會成員；1940年6月被委任為汪精衛國民政府

| | | |
|--------------------------|---|---------------------------------|
| 〈國府要人印象記〉 | 敘述會面汪精衛的過程 並介紹汪精衛詩作。 | 《臺灣藝術》 第四卷第四號 (1943年4月1日) |
| 〈南京要人印象記：褚民誼〉 | 敘述會面褚民誼（汪政府 外交部長）的過程。 | 《臺灣藝術》 第四卷第六號 (1943年6月1日) |
| 〈南京要人印象記： 周佛海氏の容貌〉 | 敘述會面周佛海（汪政府 財政部長）的過程。 | 《臺灣藝術》 第四卷第七號 (1943年7月1日) |
| 〈南京要人印象記： 陳内政部長の豪華ぶり〉 | 敘述會面陳群（汪政府內 政部長）的過程。 | 《臺灣藝術》 第四卷第八號 (1943年8月1日) |
| 〈南京要人印象記： 梁院長の大人ぶり〉 | 敘述會面梁鴻志（1938年 3月南京成立的「中華民國 維新政府」之行政院 長，1940年後擔任汪政府 的監察院長）的過程。 | 《臺灣藝術》 第四卷第九號 (1943年9月1日) |

在對照〈南京雜感〉的日文原文與中譯本後，可以發現有全篇未收錄於中譯本的情形，分別是〈南京雜感〉的第五部分「南京の明朗色」（南京の明朗色）及五篇與汪政府相關的文章：〈國府要人印象記〉¹¹⁶、〈南京要人印象記：褚民誼〉¹¹⁷、〈南京要人印象記：周佛海的容貌〉¹¹⁸、〈南京要人印象記：陳内政部長の豪華ぶり〉¹¹⁹、〈南京要人印象記：梁院長的穩健人物姿態〉¹²⁰，共六篇文章。透過這幾篇文章的內容，可以歸結它們的共通點，進而推測未收錄於中譯本的原因。

首先是〈南京雜感〉的第五部分「南京の明朗色」（南京の明朗色）。這篇文章的大略內容如下：吳濁流首先敘述自己對「南京」一地的瞭解，後提及南京在中日戰爭發生後的狀況，在提及人口（七萬人之中有一萬個以上的日本人居住在南京，南京街上時常出現充斥著日本人）與商業（提及日本人與中國人互相進行

委員會委員。〈張永福〉。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 增訂版（下）》（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頁1781。

¹¹⁶ 日文原題：〈國府要人印象記〉，收於《臺灣藝術》第四卷第四號（昭和18年／1943年4月1日發行），頁32-33。

¹¹⁷ 日文原題：〈南京要人印象記：褚民誼〉，收於《臺灣藝術》第四卷第六號（昭和18年／1943年6月1日發行），頁26。

¹¹⁸ 日文原題：〈南京要人印象記：周佛海氏の容貌〉，收於《臺灣藝術》第四卷第七號（昭和18年／1943年7月1日發行），頁34。

¹¹⁹ 日文原題：〈南京要人印象記：陳内政部長の豪華ぶり〉，收於《臺灣藝術》第四卷第八號（昭和18年／1943年8月1日發行），頁32。

¹²⁰ 日文原題：〈南京要人印象記：梁院長の大人ぶり〉，收於《臺灣藝術》第四卷第九號（昭和18年／1943年9月1日發行），頁34。

商賣的商店有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皮革商、日本人喜愛的餐館和雜貨店紛紛於中山路、中山東路、太平路等南京繁榮市集中開張）面向後，吳濁流說道「南京現在確實到達一個安定的狀態了，事變當時的樣子已經消失無蹤，現在全部轉而明朗」、「國府要人中，低調隱藏自己且不被人知道的勇士應有無數吧」¹²¹。後便提到自己曾採訪張永福一事。張永福也是任職於汪精衛政府的官員（汪精衛政府委員會委員，早在 1905 年參加中國同盟會，是與孫中山一同活動的政壇長老），吳濁流對張永福與而後提到的汪精衛夫人陳璧君，均是採以正面評價。〈南京雜感〉的第一、第二與第四部份中，主要記載吳濁流於南京接觸的人，與這些人的生活模式及觀念帶給他的反思，而到了第五部份則呈現強烈的戰爭時期社會性色彩。由於整篇涉及了太多中日戰爭以及南京汪政府的相關話題，此點應是中譯本刪除此文章的原因。

而五篇敘述汪精衛政府相關人士的文章中，紀錄了吳濁流與汪精衛政府重要人士及汪精衛本人會面的經過與感受，行文中較缺乏深入性的分析。在〈國府要人印象記〉一文，吳濁流分三個部份來闡述自己對汪精衛的印象，第一部份描述自己初次見到汪精衛的經過，並提及聆聽汪精衛演講的內容：

為了將中國從危急存亡的深淵中救出，無論如何都必須與日本合作，一同為和平建國的目標邁進，非常直率地訴求這樣的信念，為了實現以上目標克服所有困難是非常重要的。¹²²

此段演講內容呈現相當濃厚的時代氛圍，刊登在 1943 年《臺灣藝術》上，十分符合當時受戰爭影響的台灣與政府極力提倡的「大東亞共榮圈」意識。而後並記錄了 1941 年 11 月 9 日至 11 日與汪精衛一同出席「第四回全國中央委員會」，以及與汪精衛和記者們一同前往中山陵祭拜國父陵墓等經歷。第二部份記載汪精衛與張永福、夫人陳璧君的認識經過。第三部份敘述汪精衛的詩人身份，並用了近半頁的篇幅列出汪精衛早期的詩作¹²³。以上內容可以看出，這些記錄幾乎是以汪精衛生平或參與的活動為主，呈現客觀的事實，並未加入吳濁流個人的主觀意見。筆者認為這樣的闡述方式與「記者」撰寫報導的口吻十分相似。比起前述幾篇名為〈南京雜感〉中偏向主觀描述的內容，確實有很大的不同。

¹²¹ 原文：「南京は今では実に落着いてゐる。事變の様子が何処かに消えてしまつて全く明朗色に變つてしまつた」、「国府要人は勿論蔭に隠れて人の餘り知られない勇士が無数にあつたであらう」。吳濁流，〈南京雜感（五）南京の明朗色〉，《臺灣藝術》第四卷第二號（昭和 18 年／1943 年 2 月 1 日發行），頁 38。

¹²² 原文：「中国を危急存亡の深淵から救ふにはどうしても日本と提携し和平建國のために邁進しなければならぬ信念を最も率直に訴へそれを實現すべく總ゆる困難と闘ふことが大切であると説いてゐた」。吳濁流，〈國府要人印象記〉，《臺灣藝術》第四卷第四號（昭和 18 年／1943 年 4 月 1 日發行），頁 32。

¹²³ 同上註，頁 33。

而第二篇描寫褚民誼的〈南京要人印象記：褚民誼〉、第三篇描寫周佛海的〈南京要人印象記：周佛海的容貌〉、第四篇描寫陳群的〈南京要人印象記：陳內政部長之豪邁樣態〉以及第五篇描寫梁鴻志的〈南京要人印象記：梁院長的穩健人物姿態〉，四篇文章的敘述方式一致，文中首先描述吳濁流與這四位人物初次見面的經過，再描述他們的個性、外型或喜好。例如褚民誼為虔誠的佛教徒，興趣是詩、書法與攝影等，個性敦厚；周佛海是位面貌姣好的男子；陳群是位喜好飲酒的豪邁詩人；梁鴻志是位漢詩人、為人親切且擁有長者風範。相較於〈國府要人印象記〉中對汪精衛行為的客觀記錄，這四篇〈南京要人印象記〉則偏重描寫吳濁流與四位人物的交往過程，敘述方式與〈南京雜感〉中呈現的主觀感受較為相同。四篇文章中最後皆交代了四位人物的生平以及現職，似乎在向台灣讀者介紹汪政府的相關人物。透過上述分析，可歸納出這些未被收錄於中譯本的內容之共通點為均記載著南京汪精衛政府的相關內容，且這些內容對汪精衛與汪政府相關人士皆賦予「正面評價」。為何敘述汪精衛政府的內容皆遭到戰後中譯本的刪除？此點可由戰後執政的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與汪精衛（及其政府）之間的關係來釐清。

關於兩方關係的討論必須回歸戰前複雜的歷史背景來看。在 1940 年日方成立「南京汪精衛政權」之前，汪精衛原為中國國民黨黨員。1905 年汪精衛加入「同盟會」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運動，曾先後擔任中國國民黨委員（1924）、中國國民政府之行政院長（1932-1935）、外交部長（1933）等職¹²⁴。汪精衛熱絡於政治運動中，與蔣中正同為中國國民黨中的傑出者，由於蔣、汪兩人政治意見上的分歧，而後經歷 1926 年的「中山艦事件」¹²⁵、1927 年的「寧漢分裂」（『寧』：蔣中正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漢』：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¹²⁶，及

¹²⁴ 許育銘，《汪兆銘與國民政府：1931 至 1936 年對日問題下的政治變動》（台北：國史館，1999 年初版），頁 2-5。

¹²⁵ 蔣中正與汪精衛的關係也受 1926 年 3 月 20 日發生的「中山艦事變」影響。文獻顯示，此事變是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合力策劃的「倒蔣」行為（汪精衛也參與其中）。當時蔣中正擔任中國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是頗具聲望的領導者。事變情形如下：中國共產黨人士李之龍擅自指派中山艦開抵黃埔軍校，目的是中國共產黨欲掌握黃埔軍校（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的武力，因此打算挾持當時擔任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中正前往俄國，並使汪精衛繼任。此事件使得蔣中正與汪精衛的關係更加惡化，此事件發生後汪精衛即赴法國療病，短暫離開中國。李雲漢，《中國近代史》（台北市：三民書局，2005 年 3 月增訂二版），頁 341-344。；桂崇基著，沈世平譯，《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台北市：臺灣中華書局，1973 年 2 月），頁 41-43；蔡德金，王升編著，《汪精衛生平紀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 年 6 月第一版），頁 87-89。

¹²⁶ 1927 年蔣中正實行北伐後，由法國養病歸國的汪精衛反對蔣中正主張的「清黨」（清除共產黨）政策，蔣汪兩方意見分歧，故 4 月蔣中正於南京另組新的「國民政府」，汪精衛則領導「武漢國民政府」，是為歷史上的「寧漢分裂」。李雲漢，《中國近代史》，頁 345-351；王克文，《汪精衛·國民黨·南京政權》，頁 69-120；文獻顯示，汪精衛於 1927 年 9 月 13 日致電向武漢國民政府聲明引退，也就是說，「武漢國民政府」存在近六個月的時間（1927 年 4 月至 9 月）。蔡德金，王升編著，《汪精衛生平紀事》，頁 109；1927 年蔣中正於南京另組的「國民政府」與汪精衛 1940 年成立的「南京國民政府」並不同。

抗戰期間的對立事件¹²⁷等，蔣、汪間長期存在著不融洽的關係，而汪精衛在 1940 年 3 月出任日方成立的「南京國民政府」主席一職後更加深了兩人的對峙情形。對當時的（蔣中正領導的）「重慶國民政府」來說，在日方扶植下成立的「南京國民政府」（或稱「南京汪精衛政府」）是「敵方」，汪精衛的選擇顯然是公開對立的「反叛」行為。

透過汪精衛與蔣中正兩人相悖的政治路線，也可統合中國國民黨在二、三〇年代對應中國共產黨的相關政策，並呈現權力抗衡下國民黨與共產黨逐漸崩壞的關係。早在 1922 年 8 月孫中山領導中國國民黨時期，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曾發表宣言，提出「國、共同盟」的主張，不過遭到孫中山方面的拒絕。而後孫中山表示允許中國共產黨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黨籍，以國民黨員身份信仰三民主義，受中國國民黨之約束，即所謂的「容共」政策。此政策的目的是希望中國共產黨黨員的加入可以加強黨的內部力量，使國民黨成為國民革命的領導中心（而非國共聯盟）。1923 年孫中山和蘇俄代表越飛共同發表〈聯合宣言〉，表示「為求實現民國統一，接受蘇俄的援助」，歷史上將以上事件統稱為中國國民黨的「聯俄容共」主張。「聯俄容共」為二〇年代中國國民黨的重要政策，且持續延用在國民黨改組等決策中¹²⁸，直至 1928 年 2 月才宣告結束。

然而 1926 年中山艦事變的發生，使得中國國民黨對於中國共產黨的行為逐漸產生懷疑，認為中國共產黨有其野心存在。加上 1927 年中國共產黨份子企圖分化革命陣營、煽動農民暴亂等行為已成為一股威脅到國民黨的力量，於是同年 4 月蔣中正便在上海發動「清黨」，限制中國國民黨內中國共產黨員之活動，除了上海外，四川、安徽、福建及廣東等地亦分別採取行動，越演越烈下逐漸發展成全面性的反共運動。清黨的行為汪精衛並不認同，蔣、汪意見分歧下因而導致

¹²⁷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國民政府（蔣中正領導）因日軍逼近南京，故於 11 月 20 日將根據地由南京遷往重慶，史稱「重慶國民政府」。李雲漢，《中國近代史》，頁 425。徐吉村在其碩士論文中曾指出，在汪精衛政府成立前汪精衛與「重慶國民政府」間所發生的政治暗鬥。包含「河內刺殺汪案」、吳佩孚工作的角力戰以及重慶方面的和談謀略共三件事。徐吉村指出，1938 年汪精衛由重慶出走越南河內，主張以「近衛聲明」為基礎向日方談判，由於汪精衛與日方持續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國民政府便派遣專員至河內監督汪精衛，亦同時監督汪派相關要員，蔣中正曾派宋子文致電汪氏，勸其赴歐，但汪並不接受。多次交涉之後，國民政府的勸戒無效，汪精衛附日的傾向越趨明顯，1939 年 3 月 21 日國民黨特務闖入汪精衛在河內的住家，秘書曾仲鳴因而身亡，史稱「河內刺汪」，汪精衛與重慶國民政府也因此徹底決裂。而後在拉攏吳佩孚的過程以及為阻止汪精衛成立新政府所提出的「和談」策略，都清楚地顯示了重慶國民政府與汪精衛間的對立情形。以上資料出於〈第三章 汪政權成立前的交鋒〉，徐吉村，《地下戰場：戰時重慶國民政府與汪政權的暗鬥》（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1 月），頁 19-79。（「河內刺殺汪案」相關記錄：蔡德金，王升編著，《汪精衛生平紀事》，頁 257。）

¹²⁸ 李雲漢，《中國近代史》，頁 322-326；桂崇基著，沈世平譯，《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頁 8-12；汪精衛曾表示：「聯俄與容共是國民黨 1924 年改組的兩個『重要政策』，其背後之精神在於『認識蘇聯革命之意義，而與之共同反對帝國主義』，此種精神與政策決不可犧牲」。王克文，《汪精衛·國民黨·南京政權》，頁 77。

了「寧漢分裂」¹²⁹。而後於 1937 年出現了「南昌暴動」，即中國共產黨採行暴動路線在廣州等地進行燒毀等破壞性行為，為了抑止這些行為，蔣中正在 1940 年提出「肅清共匪」政策，並在 1940 年至 1943 間前後發動五次圍剿¹³⁰。這些事件層出不窮，都足以說明中國共產黨與國民政府間的不融洽關係。統合以上汪精衛及中國共產黨的相關政治事件，也可以說，不僅僅只有 1940 年日方成立的「南京汪精衛政權」，由二、三〇年代開始的國民政府（蔣中正為首）與汪精衛之間所存在的不一致的政治路線下所連結的「中國共產黨」，也是國民政府的禁忌話題。因此得以理解，此議題對國民政府的敏感性是汪精衛及其政權的相關內容未被收錄於戰後中譯本的原因。

釐清中譯本的刪除原由後，觀看《南京雜感》的前行研究，即可明瞭刪除動作所帶來的影響。觀察後發現，前行研究幾乎將《南京雜感》視為「遊記」來討論，如：徐千惠¹³¹、陳室如¹³²、張惠珍¹³³與廖炳惠¹³⁴的論文。徐千惠的碩士論文的主軸為台籍作家的旅行遊記，吳濁流的《南京雜感》即為分析對象之一；陳室如將《南京雜感》冠以「大陸遊記」之稱呼，並將吳濁流與同樣擁有大陸經驗的鍾理和並置討論；張惠珍的論文著重於「中國之旅」與「原鄉認同」之間的關係；廖炳惠則是以理論分析《南京雜感》中所記載的南京事物，論述旅行與現代性之間的關係。以上研究皆將《南京雜感》放置於「旅行文學」的範疇下討論，並以《南京雜感》中譯本為分析對象。造成如此研究趨向的原因在於刪去南京汪政府的相關敘述的《南京雜感》中譯本，內容以呈現南京街景、人物與生活的記錄為主（如前述〈南京雜感〉的第一、二、四部份），因而造成使用中譯本的前行研究在分析時將《南京雜感》視為「遊記」。

因此，透過前行研究中的敘述，可釐清僅分析中譯本而忽略的部份。首先是前行研究的特點。《南京雜感》的前行研究中，研究者在論述時均有套入戰後盛行的相關理論的現象，廖炳惠、陳室如與張惠珍的論文皆是。廖炳惠在〈旅行與異樣現代性：試探吳濁流的《南京雜感》〉一文中，提出克利佛德（James Clifford）與艾略特（T.S. Eliot）等人的理論，再將其套入《南京雜感》中分析：

克利佛德提出旅行與「不協之都會文化」(discrepant cosmopolitanisms)

¹²⁹ 「清黨」與「聯俄容共」等事件資料請參考：桂崇基著，沈世平譯，《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頁 50-69；李雲漢，《中國近代史》，頁 348-353。

¹³⁰ 李雲漢，《中國近代史》，頁 382-385。

¹³¹ 徐千惠，《日治時期台人旅外遊記析論——以李春生、連橫、林獻堂、吳濁流遊記為分析場域》（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6 月）。

¹³² 陳室如，〈日治時期台人大陸遊記之認同困境：以連橫《大陸遊記》與吳濁流《南京雜感》為例〉，《人文研究學報》第 41 卷第 1 期（台南：國立臺南大學，2007 年），頁 33-50。

¹³³ 張惠珍，〈紀實與虛構：吳濁流、鍾理和的中國之旅與原鄉認同〉，《台北大學中文學報》第 3 期（2007 年 9 月），頁 29-66。

¹³⁴ 廖炳惠，〈旅行與異樣現代性：試探吳濁流的《南京雜感》〉，《中外文學》第 29 卷第 2 期（2000 年 7 月），頁 288-312。

的關係，認為旅行者與居住者 (dweller) 形成一種對比，旅行者在異地時空中的經驗，往往改變、形塑其現代文化想像，而從他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局限。…他把旅行看作是「去疆界」與移位的活動，從中，不同的歷史彼此接觸，構成「不協的都會文化觀」。…吳濁流的《南京雜感》，其實可發現到吳式之旅行（運動與移位）一直是在將祖國文化加以物化的情況下，企圖以旅行來移替 (displace) 並舒展他在台灣這個殖民社會的另一種身份（中國人）。¹³⁵

艾略特是以固定的一點（羅馬、維吉爾）為其旅行目標，他認為那是人類普遍文化記憶及心靈旅行的座標。…艾略特的批評方法（「客觀對應」）即是以非人格的沈浸於大傳統中，作跨越時空的旅行與自我抹煞。這種都會中心主義及其詞彙一直是殖民霸權用來行使其征服、壓迫之修飾與掩飾。艾略特的旅行是以「他處」（羅馬文化）為其目標，旅行其實是返回與寓居。…對吳濁流與艾略特來說，「祖國」或羅馬是閱讀、想像的「重新組合」(re-membered) 家園。¹³⁶

而後廖炳惠再針對論文主題「現代性」，提出傅柯等人的看法：

尼采所提出的那種強調權力意志 (will to power) 以及落差 (gaps) 的理論往往成為文化現代性理論及多元文化論述的基礎。尼采的道德譜系觀點，整個將弱勢族群的問題以及詮釋對整個歷史真相的權力知識所凝聚的論述架構，有非常深入的描寫。在這方面，傅柯可以說是尼采在本世紀中葉以來最重要的代言人。在傅柯的現代性論述底下，空間、知識、身體形成了權力的論述架構，用這個方式形成知識的自我指涉以及文字跟器物之間的新的再現體系。¹³⁷

其他還有韋伯 (Max Weber)、哈伯瑪斯 (Habermas)、史碧瓦克 (Gayatri Spivak) 等人的理論也貫穿其中。由廖炳惠的論文可以看出，這類加入理論的研究，呈現著理論介紹較多、文本解讀較少的不平衡現象，對於《南京雜感》的文本分析則顯得薄弱，理論變成整篇論文的重要主軸。

而《南京雜感》中吳濁流敘述所接觸的底層人物及記載街道等內容中，陳室如提出納迪克·安德森的理論，指出這些描寫彰顯了吳濁流對於「民族認同」的人道關懷：

¹³⁵ 同上註，頁 295-297。底線為筆者所加。

¹³⁶ 同上註，頁 298-299。底線為筆者所加。

¹³⁷ 同上註，頁 307。

誠如班納迪克·安德森所言，民族成員之間的關係之所以建基於想像的基礎上，乃是因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國家，大多數的成員也彼此不瞭解，他們甚至也沒有機會相遇，沒有聽說過對方，可是他們的心目中卻存在此同屬於一個社群的想像，這是民族認同的基礎。基於共同的民族情感，站在知識分子的位置來觀看這些社會底層人民，吳濁流表現出的不是一味的優越感，而是另一種更深沉的反思與檢討。…在描述中國大陸的社會亂象時，吳濁流卻抱持著與連橫類似的民族情感。¹³⁸

同樣的寫法也出現在張惠珍的論文中。張惠珍在〈紀實與虛構：吳濁流、鍾理和的中國之旅與原鄉認同〉一文中也提出的法農（Frantz Fanon）的後殖民理論來解讀吳濁流在殖民地時期的南京之行：

要求殖民地知識分子保持絕對的、固定的、單一的國族認同，其實是苛求，因為誠如法農所言，認同的分裂危機，正是殖民冒險的直接結果，因此殖民地的子民必須宿命般地被承受殖民主義所導致的多元的、錯亂的、流動不居的認同分裂的痛苦。¹³⁹

上述三篇以《南京雜感》為研究對象的論文，皆在文本中套用理論，而分析的焦點包含：民族認同（身份認同）／民族情感、殖民主義／殖民地權力關係（論述）、旅行／移位這些面向，將「旅行」的行為延伸與這些面向及理論結合，得到「旅行是為了尋求認同，在殖民主義下以空間的轉換，重新思考自身（身份認同）或家國（民族認同）的意義」的結論，前行研究中幾乎呈現一致的描述。陳室如把兩個不同時空的文本（連橫《大陸遊記》與吳濁流《南京雜感》）並列解讀的原因，而徐千惠也把四位不同時期前往不同地點的台籍作家（李春生 1890 年代前往日本、連橫 1910 年代前往上海等地、林獻堂 1920 年代前往歐美、吳濁流 1940 年代前往南京）並列觀看。不考慮旅行時間的差異、旅行的原因、文本寫作時的社會背景或旅居地點的相異等因素，而僅以「台籍作家」作為主線串連多篇作品的研究方法，均是因為陳室如與徐千惠皆把《南京雜感》視為「旅行遊記」來觀看的緣故。

從上述遭中譯本刪除的內容與篇章的整理中，可以看出吳濁流的南京生活中接觸了許多汪精衛政府的相關人士，可知吳濁流的大陸經驗與他的記者工作是密切相關的。前行研究因為過於集中對殖民主義與民族認同的探討，而忽略了吳濁流的大陸生活，也就是未仔細探究吳濁流「在四〇年代前往大陸」這樣特殊的時間點與地點中所從事的記者工作。造成這樣的研究趨向與中譯本刪除了記載汪政

¹³⁸ 陳室如，〈日治時期台人大陸遊記之認同困境：以連橫《大陸遊記》與吳濁流《南京雜感》為例〉，《人文研究學報》第 41 卷第 1 期（台南：國立臺南大學，2007 年），頁 41。

¹³⁹ 張惠珍，〈紀實與虛構：吳濁流、鍾理和的中國之旅與原鄉認同〉，《台北大學中文學報》第 3 期（2007 年 9 月），頁 61。

府的相關內容有關，也就是說閱讀中譯本無法看出吳濁流在「大東亞共榮圈」體制下擔任記者的事實。換句話說，吳濁流前往大陸的行為並非單純的遊歷，而是牽扯了複雜的時代背景在其中。

第二節、批判社會問題的負面描寫

第一節中所述的刪除情形也出現在小說《胡志明》中。吳濁流於戰爭期間（1943年起稿，1945年完成）冒險寫作的日文版《胡志明》，在被翻譯為現今通行的中文版本《亞細亞的孤兒》之前，一共擁有六個版本與書名¹⁴⁰，並曾分別在日本及台灣出版，出版時間幾乎為戰後。六個版本分別為：1946年於台灣出版的第一版《胡志明》¹⁴¹；1956年於日本出版的第二版《アジアの孤兒》¹⁴²；1957年於日本再版《歪められた島》¹⁴³；1959年於台灣更名出版的《孤帆》¹⁴⁴；1962年於台灣出版的《亞細亞的孤兒》中譯本¹⁴⁵；1973年於日本出版《アジアの孤兒》¹⁴⁶。由於《胡志明》的寫作時間與出版時間橫跨戰前至戰後，戰前寫作以及戰後出版兩個時間點所面對的不同政權與社會狀況，以及再版時出現的內容刪減與改寫的問題，皆可能造成文本解讀的歧異。對照《胡志明》、《亞細亞的孤兒》兩版本便可發現，內容有著明顯的刪減情形。因此無法以戰後出版的中譯本《亞細亞的孤兒》來解讀吳濁流的大陸生活，需回到戰前以日文寫作的第一版《胡志明》來分析。

河原功在〈吳濁流的秘密抵抗精神——小說《胡志明》中隱含的謎〉一文中，

¹⁴⁰ 六個版本資料可參考：（日文版本整理）河原功，〈吳濁流の秘めたる抵抗精神——小説『胡志明』に隠された謎〉，河原功，《翻弄された台湾文学——検閲と抵抗の系譜》（東京都：研文出版，2009年），頁79-81。（中譯本版本整理）劉孝春，〈試論《亞細亞的孤兒》〉，洪宜勇主編，夏潮聯合會、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主辦，《台灣殖民地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海峽學術出版社，2004年2月），頁361-362。

¹⁴¹ 《胡志明》全文共五篇，出版時間分別如下，第一篇：1946年9月3日（台北市國華書局出版）；第二篇：1946年10月10日（台北市國華書局出版）；第三篇：1946年11月20日（台北市國華書局出版）；第四篇：1946年12月25日（台北市民報總社出版）；第五篇：1948年1月10日（台北市學友書局出版）。以上五篇複製版由河原功整理後，收於河原功主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集成30：吳濁流作品集》（東京都：綠蔭書房，2007年6月30日），頁5-409。本章《胡志明》內容皆出自河原功整理的複製版。為使脈絡清晰，以下敘述皆以第一版《胡志明》之頁數標註。

¹⁴² 吳濁流，《アジアの孤兒》（東京都：一二三書房，1956年4月15日）。

¹⁴³ 吳濁流，《歪められた島》（東京都：ひろば書房，1957年6月1日）。

¹⁴⁴ 吳濁流著，楊召慈譯，《孤帆》（高雄市：黃河出版社，1959年6月）。

¹⁴⁵ 1962年《胡志明》首次以《亞細亞的孤兒》之書名出版：吳濁流著，傅恩榮譯，黃渭南校閱，《亞細亞的孤兒》（台北市：南華出版社，1962年6月）。而後，《亞細亞的孤兒》也由廣鴻文出版社、草根出版社、新竹縣政府文化局、華夏出版社（簡體版）等單位相繼出版。《亞細亞的孤兒》成為此書的通用書名。由於《亞細亞的孤兒》中譯本眾多，在此均將中譯本視為同一版本討論（不多加分析各中譯本間的差異）。本論文採用1980年遠景出版社出版之版本作為分析對象：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台北市：遠景出版社，1980年3月初版）。

¹⁴⁶ 吳濁流，《アジアの孤兒》（東京都：新人物往来社，1973年5月25日）。

已針對《胡志明》的版本問題做了清楚地說明。此文簡略的描述了《胡志明》的五篇內容以及出版時書名更改的狀況，包含：《アジアの孤児》（一二三書房，1956年4月出版）、《歪められた島》（ひろば書房，1957年6月出版）、《アジアの孤児》（新人物往来社，1973年5月出版），以上三個版本是針對「在日本出版」的日文版《胡志明》所做的整理。河原功接著指出第一版《胡志明》與第二版《アジアの孤児》間內容上的相異處，可歸納為三點：一、主角的名字由胡志明改為胡太明；二、第二篇中胡志明的心儀對象「月英」的自殺情節以及對胡志明造成的衝擊等內容只存在第一版的《胡志明》中，其餘版本皆刪除；三、第一版《胡志明》與第二版《アジアの孤児》的字數出入。全文主要針對第三點深入論述。河原功指出，與《胡志明》原文相比，第二版《アジアの孤児》有著非常明顯地縮減情形，其中第四篇與第五篇是縮減最多的部份（縮減了將近50%的字數）¹⁴⁷，並在之後以「主題性」羅列遭到縮減的內容，指出《胡志明》中所呈現的批判性遠遠超過第二版的《アジアの孤児》。

河原功的這篇論文雖然與本節討論的主題相關，不過河原功主要針對了刪除篇幅最多的第四篇與第五篇進行分析，對於描述主人公大陸生活的第三篇並沒有多加撰述。另一方面，這篇論文中河原功以《胡志明》的日文版本為主要討論對象，並未涉及中譯本的整理，因此也未探討中譯本可能因戰後政權轉換等因素影響文本內容的原因，以及只存在中譯本的刪除情形。然而戰後中譯本的翻譯問題及前行研究多使用中譯本分析的特色，都是分析《胡志明》或《亞細亞的孤兒》時必須注意的問題。這些要素同時也影響著前行研究的焦點，以上幾點皆是本章試圖分析的內容。

第一版《胡志明》中主要記載主人公胡志明大陸生活的內容是第三篇〈悲戀之卷（大陸篇）〉／〈悲恋の卷（大陸篇）〉。吳濁流在第二篇〈悲戀之卷〉／〈悲恋の卷〉尾聲交代胡志明決定前往大陸的原因與心境後，由第三篇〈悲戀之卷（大陸篇）〉開始，集中描寫胡志明的大陸生活。而第二篇與第三篇的內容（如：在大陸工作的友人協助寄來聘書協助胡志明前往大陸、短暫的上海生活與胡志明南京生活的所見所聞等），對照《南京雜感》及《無花果》中吳濁流對大陸生活的自述，一致性相當高，因此筆者欲透過小說中描寫的大陸生活，來解讀吳濁流對大陸的想法。

筆者對照第一版《胡志明》及戰後中譯本《亞細亞的孤兒》中的第三章內容後，發現兩版篇幅呈現相當明顯地差異。例如描寫主人公胡志明與淑春相識、交往到結婚的敘述以及胡志明送別友人曾君等情節，中譯本皆有刪略與改寫的情

¹⁴⁷ 以上三點差異處出於：河原功，〈吳濁流の秘めたる抵抗精神——小説『胡志明』に隠された謎〉，河原功，《翻弄された台湾文学——検閲と抵抗の系譜》（東京都：研文出版，2009年），頁86-88。

形。然而再對照第二版《アジアの孤児》與中譯本《亞細亞的孤兒》後，發現兩版內容幾乎呈現一致。因此筆者推測戰後中譯本應是依據《アジアの孤児》翻譯而來。如此說來，戰後中譯本與吳濁流於戰時寫作的最初版本，內容的差異早已存在。因此，筆者將回歸吳濁流 1943 年至 1945 年寫作的第一版《胡志明》，以第三篇〈悲戀之卷（大陸篇）〉的原文內容為主，分析胡志明的大陸生活¹⁴⁸。尤其將針對第二版《アジアの孤児》以及中譯本中已刪略的內容來討論，這些內容表達了吳濁流的哪些想法？與討論戰後中譯本的前行研究是否有著不同之處？以補足前行研究缺乏的部份。

《胡志明》中以第三篇〈悲戀之卷（大陸篇）〉集中描寫胡志明抵達大陸後的生活（以南京生活為主）。其中，對於上海與南京的街景有著不少篇幅的描寫，例如澡堂、餐廳、廣場等地點，以及與小偷、乞丐、車伕、阿媽等人物的接觸。這些內容皆以「負面評價」的形式出現，文本先描寫街景的混亂狀態，而後藉著接觸後所產生的驚訝感受呈現台籍知識份子抵達大陸後的衝擊。這些內容隱含著吳濁流對大陸的觀看角度，進而顯現吳濁流的價值觀以及教育對他的影響。

因為生長環境與所受教育的影響，吳濁流描寫大陸生活的內容中，首先出現的是對於中國傳統的憧憬以及自身的價值觀。以台灣養成的價值觀觀看混亂的南京街景時，吳濁流感到相當大的衝擊。此衝擊的原由首先可由《胡志明》中回憶台灣求學的內容來看。小說描述，胡志明在南京回想自己停留上海的日子時，如此闡述自己對中國的印象：

他抵達大陸後曾在上海度過數日。見到大上海豐富樣貌後（胡志明）感覺自己完全是個鄉下人，對中國的認識也是老舊的觀念，只是學生時代聽過的知識罷了。現在所聞所見皆是新的事物，（相較之下）在學校習得的中國觀彷彿十年如一日般沒有進步。他就讀師範學校時，從老師那邊聽說中國是鄰近的老大國，是鴉片的國家、纏足的國家、戰爭必敗的國家、恐怖攻擊頻傳的國家、日常當中未有內憂外患意識的國家。從那之後，他就一直抱持著這樣曲解的觀念，對中國也少有研究。但是，這樣的想法下為何還

¹⁴⁸ 1956 年出版的《アジアの孤児》中主人公已改名為「胡太明」，「胡志明」一名只存在於 1946 年台灣出版的第一版《胡志明》中。主角「胡志明」正與越南共產主義者同名。胡志明（1890-1969），為越南共產主義領導者阮必成在二次大戰期間的化名。阮必成早年曾前往廣州，1942 年 8 月以「胡志明」一名前往中國試圖與越南的抗日份子聯繫，隨後在廣西省靖西縣遭到逮捕，在囚禁 18 個月後，1943 年 9 月在中國共產黨的協助下，國民政府將其釋放，1945 年胡志明宣告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此書於以《アジアの孤児》書名在日本出版時，為避免「胡志明」一名遭到誤解，因此將主角姓名改為「胡太明」。以上資料出於：河原功，〈吳濁流の秘めたる抵抗精神——小説『胡志明』に隠された謎〉，河原功，〈翻弄された台湾文学——検閲と抵抗の系譜〉，頁 86；〈第九章 胡在中國被捕與加入越南革命同盟會〉，收於莊永敬，〈胡志明在中國：一個越南民族主義的偽裝者〉（台北市：傳記文學出版社，1972 年），頁 143-176。為使脈絡清晰，以下論述筆者將統一使用「胡志明」一名（若是引用《アジアの孤児》與之後版本的內文，有提及胡志明的狀況，才會使用書中所寫的「胡太明」一名）。

是同時對中國抱持著憧憬呢？就像追求遙遠夢中世界的美麗彩虹的心情一樣。童年時，從村中長輩那邊聽說天下的美人都是從蘇州、上海、杭州而來，從絕世美人西施開始，西廂記的崔鶯鶯與八美圖等女性也是。他在法國租界漫步時看見了，非常驚訝有如此多的古典（優雅）美人。他感到，五千年來的中國女性的歷史被編入進入近代的風潮，彷彿就像滲入特有的香氣般。¹⁴⁹

這段回憶求學階段的內容在後來的版本中有所改寫。第二版的《アジアの孤児》中則將此段縮短改寫成：

他想起上陸後，無所事事，曾在上海度過的數日。那時他對中國存有淺薄的知識及老舊的認知，而現實的中國的姿態，特別是法國租界周圍充斥的西歐的近代空氣中，完全壓倒鄉下（農村）出生的他。而步行於街道的年輕女性們，在她們近代的裝扮下，蘊藏著五千年來文化傳統的奧秘，感覺散發著高貴的香氣。¹⁵⁰

改寫之後的文句在敘述自己對中國觀念的淺薄以及法國租界女性的部份文意不變，可是卻完全刪去前半部敘述「求學時期接受老師傳達的中國負面印象」以及

¹⁴⁹ 原文：「彼は上陸して上海で数日過した。大上海を見て自分は全く田舎者であり、中国に対する認識は古い觀念的なものであって、学生時代聞き覚えた知識に過ぎなかった。どれもこれも目新しいもの、耳新しいものばかりで、学校で習った中国觀が十年一日の如く進歩しなかった。彼は師範時代、中国と云へば、隣の老大国で、阿片の国、纏足の国、戦争すれば必ず敗ける国、テロの多い国、外患内憂常なき国、と先生から習った。彼はその後も中国に対して少しも研究しないために、その曲った觀念をその儘、持ちつづけて認識を改めなかった。しかし、さう思ひ乍らも何かしら中国に対して或る種の憧れを覚えるのだった。遠い遠い夢の世界で美しい虹を追ふやうな気持であった。子どもの時、村の長者から天下の美人は蘇州、上海、杭州から産れると聞かされてゐたが、絶世の美人西施を始め、西廂記の崔鶯々や八美圖は總べてこの辺りの女性だった。彼はフランス租界を歩いて見たが、第一に古典的な優雅な美人の多いのに驚くのであった。近代風の中に五千年來の中国女性の歴史が織り込まれて特有な薫りが滲んでゐるやうに感ずるのであった」。吳濁流，《胡志明（第三篇）》（台北市：國華書局，1946年11月20日），頁4-5。底線為筆者所加。

¹⁵⁰ 原文：「彼はなすこともないまま、上陸後数日を過した上海のことを思い出していた。そこには彼の中国に対する予備知識の浅さ、古さを思い知らせる、現実の生きた中国の姿があった。ことに、フランス租界あたりに漂っている西歐的で近代的な空氣に、田舎者の彼はすっかり圧倒されてしまった。しかも、街を歩く若い女などは、その近代的な装いの下に、五千年來の磨かれた文化の伝統を秘めていて、それが高い香氣を放って感じられるのだった」。吳濁流，《アジアの孤児》，頁83。此段內文為筆者自譯，中譯本《亞細亞的孤兒》將此段譯為「他整日無事可做，不禁回憶起上岸時曾經住過幾日的上海的情形來。那地方的現實而生動的中國風物，使他證實自己對於中國大陸的知識委實太膚淺、太古舊，尤其對於沉滯在法租界一帶的近代西歐的氣息，使在農村出生的他驚惑不已。而且，在街上經過的年輕女性，從她們的摩登裝束中，散放著高貴的芳馨，似乎蘊藏著五千年文化傳統的奧秘」。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台北市：遠景出版社，1980年3月初版），頁121。由內容可見中譯本是依照《アジアの孤児》內文翻譯而來。因《アジアの孤児》與中譯本內文幾乎一致，故以下論述筆者將以《アジアの孤児》做為與《胡志明》的比較對象。

「童年由長輩口中得知的傳統觀念」兩事。然而這兩個部份正是釐清吳濁流的中國觀念的重要內容。

這段描寫清楚呈現主角胡志明先後受傳統漢學與日式教育的雙重影響。胡志明在師範學校（殖民地日式教育）從老師口中習得許多中國的負面印象後，卻同時對中國懷有憧憬，這樣矛盾的想法究竟為何？此段是釐清胡志明矛盾感受的重要描述。雖然在日式教育中傳達許多中國的負面評價，但胡志明仍對中國抱有憧憬，「就像追求遙遠夢中世界的美麗彩虹的心情一樣」。後段敘述其實已說明造成此心境的原因。「從村中長輩那邊聽說天下的美人都是從蘇州、上海、杭州而來」，對胡志明來說童年時期由長輩口中得知的中國印象非常深刻，因而抱持著美好的想像。所以即使受日式教育時老師傳達了「中國是鄰近的老大國，是鴉片的國家、纏足的國家、戰爭必敗的國家、恐怖攻擊頻傳的國家、日常當中未有內憂外患意識的國家」這樣與童年時期不符的中國印象，也無法抹滅胡志明心中對中國固有的憧憬。也導致胡志明一到上海時，將由長輩口中得知的觀念投射在所見到的大陸女性身上。顯然胡志明是抱著對中國的憧憬離開台灣的。吳濁流的自身經歷與小說中胡志明的經歷幾乎一致（可透過描述胡志明的內容得知吳濁流的真實感受），可知吳濁流的中國印象在童年時期就已形成¹⁵¹。

明瞭傳統漢學對吳濁流的影響後，便可由文本中的負面描述觀看吳濁流的寫作視角與價值觀。《胡志明》中敘述胡志明在抵達南京之前曾短暫停留上海，上海生活的內容中即出現對所見街景的負面評價。例如胡志明對買水果時在光天化日下見到小偷的情景感到不可思議¹⁵²，以及對於「走到哪裡都看到非常多的乞丐

¹⁵¹ 類似的內容在 1942 年發表的〈南京雜感〉中也曾出現：「曾聽說中國是鄰近的老大國，是鴉片的國家、纏足的國家、戰爭必敗的國家、恐怖攻擊頻傳的國家、日常當中未有內憂外患意識的國家。雖然一直想去探個究竟，但由於沒有機會，心中一直抱持著這樣從學生時代實習得的曲解的觀念，持續而沒有改變」。（原文：中国と云へば隣りの老大国で阿片の国、纏足の国、戦争すれば必ず敗ける国、テロの多い国、外患内憂常なき国で一度は行って見度いけれども機会がなかったため、学生時代の曲った觀念が進歩せずにその儘、持ちつゞけてゐた）。吳濁流，〈南京雜感（一）南京の相貌〉，《臺灣藝術》第三卷第十一號（昭和 17 年／1942 年 11 月 1 日發行），頁 28。此段話中譯本並未刪除。吳濁流，《南京雜感》中譯本，頁 51。這段話中吳濁流自述初抵大陸時的心態，但是只表達了對中國印象的負面觀，沒有指出童年時期聽聞長輩傳受的中國觀，也未顯現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憧憬。描寫不似《胡志明》原文完整。文本分析時僅限於對中國的負面印象，無法看出胡志明受「兩種」教育影響的特徵。

¹⁵² 「有次他在北四川路買水果。賣水果的商人正秤著蜜柑的重量時，商人突然把蜜柑丟棄在一旁，拿起扁擔飛也似的衝出門去。他回過頭，視線隨著商人追的方向看去。一位體型壯大的男性把衣服扔在人來人往的街道上拼命的跑著。再看一眼時他的身影已經消失了。商人把衣服撿起來拍拍上面的灰塵後回來。因為這樣一瞬間發生的事情短暫地感到驚嚇後，（胡志明）明白原來是小偷。在大白天且有這麼多人環視的情形下還發生這樣的事情，真的是非常的大膽」。（原文：彼は北四川路で果物を買はうとした。小賣商人が蜜柑を計つてゐた。突然商人は蜜柑を置き捨てて傍にある擔棒を擲んで、飛鳥の如くかけ出した。ふり返つて視線を商人の追ふ方向へ向けた。大きな男が着物を投げすてて往來の雜沓へ懸命に走つてゐた。見てゐる中に姿が消えてしまった。商人が着物を拾ひ上げて塵を拂ひ乍ら戻つて来た。一瞬の出来事でしばらくはあつけにとられてゐたが、やつと泥棒だと分つた。白晝、しかも大勢環視

與人力車夫」等情形感到驚訝，感嘆「我想上海是個難以居住的地方」¹⁵³。

「這樣的事情在上海每天都能見到。」曾這麼說之後便急忙的走了。關於生為人是不幸的這件事，我想更不幸的是生為中國人，在無意識中，意識到自己的身世，不自覺地（胡志明的）眼淚就流了下來。¹⁵⁴

曾君的話帶出街景混亂的情形是為常態的事實。而後胡志明在曾君的帶領下接連參觀了上海租界的飯店、大街小巷，甚至是娼妓居住的街角，這些混亂的街景與之前親眼所見的小偷盜竊等事件，皆對胡志明產生了強烈的衝擊。上海生活的感受也為小說接下來的南京生活埋下伏筆。胡志明感到「對上海完全沒有留戀的向著南京前進。對於沿路荒涼的景色也未激起特別的感情」以及「好想早點抵達南京的心情」¹⁵⁵，因此以一種逃避的心態前往南京。

而以描寫南京街景與民情為主的《南京雜感》中，吳濁流多次提及親眼所見的奇異場景。例如回想自己第一次進大陸澡堂的經驗：「我第一次跟傅君去的時候，心想若洗澡水進了眼睛，恐怕眼睛要瞎掉」¹⁵⁶。然而久了之後也成習慣，這與《胡志明》中的描述一致：

事實上中國的澡堂是個不可思議的地方。一開始曾君帶我進去的時候，我擔心污濁的水會讓我的眼睛因此瞎掉。然而不知不覺中，自己因為貪圖安逸、耽溺享樂，逐漸習慣了起來。澡堂也跟鴉片一樣嗎？他（按：胡志明）對此感到疑惑。¹⁵⁷

此外吳濁流也提到南京生活中當自己遇到無法接受的不乾淨環境／物品的時候，旁人所提出來的「馬馬虎虎」的觀念：

の下に行はれたことでその大膽さには舌を捲かざるを得なかった。吳濁流，《胡志明（第三篇）》，頁6-7。

¹⁵³ 原文：「彼はどこを歩いても乞食と人力車夫の夥しいのに驚いた。」；「上海は住みにくい所だと思った」。同上註，頁7。

¹⁵⁴ 原文：「曾は『そんなものは上海では毎日見るよ。』と云って、さつさと歩き出した。抑々人間と生れるのが不幸で、更に不幸なのは中国人と生れることであると思って無意識の中に自分の生立ちが意識されて、故なく涙が出て来るのであった」。同上註。

¹⁵⁵ 原文：「彼は上海に対して未練なく南京に向った。沿路の景色はただ荒涼たる感じで特別の感情も起らなかった」；「一刻も早く南京に着きたい気持であった」。同上註，頁8-9。

¹⁵⁶ 吳濁流，《南京雜感》中譯本，頁60。此部分因未尋獲《臺灣藝術》刊載原文的期數，故使用中譯本為參考標準。以下敘述若有使用中譯本的情形，皆為同樣原因。

¹⁵⁷ 原文：「實際中国風呂は不思議なものだ。始め曾につれられて入ったときは汚なくて目がつぶれはしないだらうかと心配してゐた。その中に自分もその安逸を貪り、つひにその享樂に耽けるやうになった。風呂も阿片か？彼はついに疑った」。吳濁流，《胡志明（第三篇）》，頁16。

南京一、二月的時候是雨季，要是下起雪來一兩週內不融化的情形很頻繁。…雨天時走在全是污濁泥濘的人行道上我感覺很不舒服。巫君卻一邊踢著泥濘悠然地走著，我總覺得腳下的泥濘似乎會滲入身體一樣。…即使我數度嘆氣說泥濘太多，巫君也總是回答「馬馬虎虎」。有一次我在撫湖參加張司令的邀宴，因為餐館女侍送來的毛巾黑黑的我不敢使用而還給她時，女侍也勸我說「馬馬虎虎」。¹⁵⁸

對於大陸「馬馬虎虎」的生活觀念，吳濁流顯然不能接受。因為餐館女侍送來的毛巾不乾淨而不敢使用並歸還，呈現了吳濁流描寫大陸的街景時的一致性，即「髒亂」的負面感受。這些街景與觀念的描述中，表達的是與其價值觀不符之下所產生的排斥感。這些負面描寫中吳濁流十分強調場景的「髒亂」，這與日式教育傳達的「整潔」觀念相悖，而小偷猖獗與「馬馬虎虎」等觀念也與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維持著良好「秩序」的社會狀態不符，因此產生強烈的衝擊以及排斥感。由此可以得知吳濁流在寫作時所抱持的是受日式教育影響而來的價值觀。

在這些負面描述中，除了顯現吳濁流的價值觀外，亦呈現了吳濁流批判中國社會問題的意味，此情形可由描述胡志明與底層人物接觸的內容中看出。例如《胡志明》敘述胡志明與曾君漫步南京街頭時遇見一位乞丐，乞丐沿路跟隨了好久，雖然不停地乞討，但是曾君一直置之不理。越是不理睬，乞丐的哀嚎聲越是淒厲，無可奈何之下，曾君才拿出零錢給乞丐。對於曾君明明有零錢卻遲遲不願施捨的行為，胡志明無法理解，那天夜晚，因為這件事胡志明這樣想著：

成群的洋車夫、私娼的世界、破壞公園的動物、大量的乞丐、街道上的小偷、痛苦地掙扎而去世的男子、東亞的暴發戶、氣燄高漲的無禮者、忠誠的「看門狗」、美人、大廈、高樓…等等，到今天為止看過的事情一件一件的想起，越到夜晚就越清楚。想起在前往大陸的船上所作的吟詠的詩：「半生荊棘潛潛淚」，我想不只是半生，就算是一輩子以淚度日也無可救藥。對於即將沉淪的中國社會，只有眼淚是無法救援的。我想到可能必須付出許多的犧牲以及血淚，悲哀的眼淚不覺地就從兩頰流了下來。¹⁵⁹

¹⁵⁸ 原文：「南京の一二月頃は雨期で、若しも雪でも降れば一週間も二週間消えないときが多い、…雨の日には人道はきたない泥がどろどろして歩くのに実に悪い気持であつた。巫君は泥を蹴り乍らどろ道を悠々として歩く。私はそのねばねばした泥が身にしみ込む思ひであつた。…私は泥がきたないと嘆聲を度々漏らしたが巫君の答は何時も馬々虎々であつた。私が或るとき、撫湖で張司令の招宴に預つたが料理屋の女給の持つて来たタオルが黒くて使ふ気になれなかつたからその儘返したら女給は馬々虎々と勧めたのである」。吳濁流，〈南京雜感（四）章公館に於ける閑遊〉，《臺灣藝術》第四卷第一號（昭和18年／1943年1月1日發行），頁34。

¹⁵⁹ 原文：「洋車夫の群、野鷄の世界、公園を荒す動物、夥しい乞食、大通りの泥棒、死に咽ぶ男、東亞の気取屋、鼻の高い無禮者、忠實な番犬、美人、大廈、高樓…など、今まで見たことが次ぎから次ぎへと蘇って来る。夜が更けるに従つて目が冴える。渡華の際、船中で賦した詩を思ひ出して見た。『半生荊棘潜々涙』と詠んだが、恐らく半生ではなく一生涙で暮し

筆者認為，曾君明明有零錢卻遲遲不願施捨的行為與前述「一開始認為澡堂髒亂，但久而久之反而享受了起來」的心態是一樣的。以乞丐的行為帶出的是吳濁流對社會問題的批判。第一、吳濁流曾於《南京雜感》中指出「中國應該還有很多餘裕。但是，從南京大眾的生活看來，並不豐裕」¹⁶⁰，點出了中國社會長期存在的「貧富不均問題」。第二、指出中國對這些問題根本沒有解決的決心。中國人久而久之產生「習慣」的心態並採取「視而不見」的行為，乞丐持續乞討、施捨者則同樣無視，只會造成惡性循環，對社會與民眾都是無益的。由乞丐群聚的現象帶出社會對待的貧困問題的批判，顯現著吳濁流對此問題的真正想法：僅以施捨而沒有從根本解決，「貧困問題」將會持續存在。

而不放棄乞討行為的乞丐也使胡志明腦中浮現了一路從上海到南京見到的光景，如上海的娼妓街、親眼所見小偷的盜竊行為等，親身體驗的這些畫面讓胡志明對情勢已趨不利及存在貧困等社會問題的中國現況更為憂心，因而發出「對於即將沉溺的中國社會，只有眼淚是無法救援的」這樣的感嘆。以上這段話，《アジヤの孤児》以及後來的中譯本中，僅以「上海的事、台灣的事與日本的事等等，時間、場所與人物全都混合在一起，想了這些事情之後，才逐漸有了睡意」¹⁶¹簡單幾句帶過。兩段文句的含意明顯不同。前者（原文）描述胡志明見到諸多混亂狀況後，對於目前處境的反思。後者（改寫後）則是強調上海、台灣與日本三方交雜的感受。相較之下，改寫後對於中國社會現況的反思性則顯得薄弱，而以強調空間轉換下（從台灣到大陸）所產生的交混性為主。原文中所帶出的大陸逐漸沉溺的現況以及吳濁流親身體會後的感受，這些部份皆是改寫後的版本中缺乏的。

這類透過所見街景帶出社會問題的描寫手法，還有對於衛生問題的評論。胡志明對於寄居的曾公館前的大廣場見到的清洗馬桶一事感到詫異，因而延伸至「衛生問題」的討論：

曾公館前有一個相當大的廣場。他每天早上經過的時候，一定會看到阿媽們在那裡清洗馬桶。污濁的糞水四散，臭氣也迎面而來，令他非常厭煩。

でもだめだと思った。將に溺れんとする中国の社会は、涙だけでは救へない。幾多の犠牲と血涙が必要であらうと思はれて、侘しい悲しい涙が思はずしらず頬を傳って流れる」。吳濁流，《胡志明（第三篇）》，頁 11-12。

¹⁶⁰ 「在某宴會席上，同文書院的某教授說：在中國，要淪落為乞丐，非相當淒慘的人不能做，因而斷定中國還有很多很多的餘裕。但是，從南京大眾的生活看來，並不豐裕。這固然與社會的缺陷有關，但貧困是主因。…南京的夫子廟乞丐最多。開始的時候，誰也不會吝惜一點點零錢，可是日子久了，被他們追趕，心裏也不會覺得什麼了。施捨是婦人之仁，不從社會政策上求根本的解決是不行的」。吳濁流，《南京雜感》中譯本，頁 92-93。

¹⁶¹ 原文：「上海のことや台湾のことや日本のことや……時も場所も人物もごっちゃであった。そのうち、ようやく睡気がさしてきた」。吳濁流，《アジヤの孤児》，頁 87。

而阿媽們甚至放任將糞便置於角落不管。有時那個廣場甚至有露出大大的臀部，無慈悲心地光天化日下痢屎的癡漢。為什麼大家不使用公共廁所呢？然而那廁所卻沒有門。「啊，這是禮節之國、儒教之國的現狀嗎？」…這麼想著的時候，悲哀且感傷的眼淚就這樣流了下來。林語堂的書中指出，歐美人以衛生標準來評斷文明與否是錯誤的，然而現在這樣的衛生狀態，我想絕對稱不上是文明的國家。¹⁶²

除了清洗馬桶外，廣場中還有在光天化日下直接露出臀部排泄的癡漢，以及將糞便置之角落不理的阿媽，就算有明明有公共廁所（而且廁所沒有門），多數人也沒有使用的習慣。這一切都讓胡志明感到不可思議。雖然並不完全認同「以衛生標準來評斷文明與否」這件事，但是南京太過髒亂的衛生習慣完全稱不上是童年由長輩口中、漢式教育中所習得的「禮節之國、儒教之國」吧！這段話帶有強烈的批判意味，但是整段也完全被刪除了，《アジヤの孤児》後的版本在這部份幾乎將焦點集中在胡志明的「戀愛」情節。此段話評論的衛生與文明問題，以及描述中顯現的對吳濁流的衝擊（與童年習得的禮節之國的中國印象完全相悖）等面向，戰後中譯本則完全忽略。

這樣批判的寫法還有吳濁流描述大陸生活模式時，所引申的對「女性解放議題」的看法。例如《南京雜感》第四部份「在章公館的閑遊」（「章公館に於ける閑遊」）中，吳濁流敘述自己在友人章君的帶領下嘗試中國人的生活模式，指出麻將（賭博）、吃飯（聚餐）、看戲這三大娛樂是在中國各階層相通並且最被喜好的事¹⁶³。吳濁流首先不帶批判的敘述當時大陸盛行的三大娛樂，接著在敘述中引述他人的看法，再提出自己的想法：

有身份地位的人，每晚都有所謂會客的宴會。更不用說是青年男女，不做飯而到外面的餐館聚餐並不是稀少的事，只見過一面的女性若是給了請帖的話我便會去參加聚餐。若是朋友請你吃飯，你也得回請對方，這是一種禮儀。有一次我帶渡邊先生與第一次見面的女性一起喝茶。長住於大陸的渡邊先生諷刺的說，這就是為何會缺糧的緣故。我想不一定是那樣。新時

¹⁶² 原文：「曾公館の前にはかなり大きな広場があった。彼は毎朝そこを通るとき、必ず阿媽達がそこで馬桶（便桶）を洗ふのを見た。汚ない黄金汁が流し散らされて、臭気がうんざりして来る。甚しい阿媽になると、便をそのまま片隅にあげさせてある。ときにはあの広場にでつかいけつを丸出しに、無慈悲にも天日の下で便を垂らす痴漢も居る。どうして公共便所へ行かないのだろうか？しかしその便所にも戸がついてゐない。あゝ、これが禮節の国、儒教の国の現狀が…と思へば、悲しい感傷の涙が思はずこぼれるのであった。林語堂の著書に、歐米人が衛生を標準に、文明を判断する誤謬を指摘してゐるが、しかし現在の衛生状態では、決して文明国とは思へないのであった」。吳濁流，《胡志明（第三篇）》，頁21。底線為筆者所加。

¹⁶³ 原文：「麻雀（打牌）會食（吃飯）芝居（看戲）此の三大娛樂は中國社會各層を通じて最も喜ばれるものである」。吳濁流，《南京雜感（四）章公館に於ける閑遊》，《臺灣藝術》第四卷第一號（昭和18年／1943年1月1日發行），頁34。

代的女性因為想要和男性平等，對西洋思想囫圇吞棗，崇尚走出家庭，闊步於街道。我與報社附近開小商店的老人聊天過，這些老人懷抱著的是舊的道德觀念，他們以為現代女性的缺陷全是因為解放纏足的緣故。換句話說，因為解纏足的關係，女人忘記煮飯、討厭照顧孩子、想與男人爭地位、會吸菸也會去舞廳跳舞。事實上，現在中國女性的解放思想，很多人無法認同。¹⁶⁴

此段話帶有兩層含意。一是文中渡邊先生提出的「缺糧論」，二是吳濁流對女性解放觀念的想法。如同前文對乞丐的描述一樣，成群的乞丐顯示著社會的貧困問題，但是另一方面有身份地位的人卻每晚都有所謂的宴會，不煮飯到餐館聚餐是件稀鬆平常的事。這些聚餐的人與為求溫飽在街道乞討的乞丐形成強烈對比。「缺糧」一說法所帶出的是中國社會所存在的「階級問題」，有身份地位的人持續享樂、貧困者亦持續貧困。而針對此現象吳濁流集中討論了「女性解放」的部份。吳濁流指出女性因為想要與男性平等所以走出家庭，可是卻導致了不正確的觀念，這由吳濁流所舉的例子中可以說明。

吳濁流敘述自己曾隨友人見過上海一位擁有北京大學高學歷的李太太，李太太以為要跟男性平等，就和男性做一樣的事情，所以不需重視貞操。吳濁流因而反駁，既然提倡男女平等，強調男女能做一樣的事情，那麼為何不廢除女傭（或改以男傭）或是提倡女人與男人一樣拉人力車呢？吳濁流在此處強調的是，不能不明瞭「觀念」的真正含意，就把「觀念」套在所有的事情上，不是拿著「女性解放」的旗幟就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後面提到「老一輩的人卻認為現代女性的缺陷全是因為解放纏足的緣故」。老人認為因為解放纏足，女人的腳不再被束縛，便走出家庭，忘記在家庭中應有的本分。這也是錯誤的解放觀念。老人因為抱持舊有的道德觀，認為解纏足是「去除了傳統」的緣故，因而對女性走出家庭等行為無法認同。由李太太與老人的例子可以得知，社會中對女性解放觀念的錯誤以及對性別的區隔仍舊存在（對性別的想法在本質上沒有改變），因而「解放觀念」無法獲得多數人的認同。

對於文本中描繪大陸時所呈現的負面評價，前行研究中常將此處設定為吳濁

¹⁶⁴ 原文：「えらい人毎晩，会客と云って宴會がある。若い男女は勿論、ご飯をたかずに料理屋で会食することは珍しありません一面識位の女性でも請帖（案内状）を出せば会食に出て呉れる。お友達の間柄では呼ばれたらおごって返すのが禮儀である。或るとき私が渡邊さんと初対面の女性をつれてお茶飲みに行ったことがある。大陸に長い渡邊さんはそれを評して缺食の所以と皮肉ってゐる。あながちさうでもないやうだ。新時代の女性は何でも男と平等にならうと思って西洋思想を鵜呑みに家庭から街道闊歩することを喜んでゐる。私は社の近隣に商賣してゐる老人連と雑談することがある此等老人連は舊道德觀で、現代女性の缺陷は全く纏足を解放した為であると云ってゐる。つまり自然足なるが故に家庭料理を忘れ、子守を嫌がり、男子と地位を争ひ、煙草をすつてダンスホールで踊ることが出来る。事實、現在中國女性の解放思想は讚或出来ないものが多い」。出處同上註，頁 34。

流對中國大陸的失望，來印證台灣知識份子對心中「祖國」的失望，並延伸用以批判戰後接收台灣的國民政府¹⁶⁵，這類解讀也常與二二八事件等背景一同討論。張惠珍指出，擁有大陸經驗的台籍知識份子，在戰前強烈感受到與大陸格格不入的衝擊後，丟棄先前懷抱的「祖國」的美夢萌生了不如歸去之感，返回台灣後又因經歷戰後國府接受與二二八事件等衝擊，轉而捨棄心中的中國意識¹⁶⁶。這類討論中國意識的前行研究，隨即帶出的台灣意識與認同矛盾等議題，甚至是結合後殖民論述的解讀（將戰後初期的國民政府視為「再殖民者」）¹⁶⁷，都是將文本放在「戰後的觀點」下爬梳。

然而筆者認為，（這是寫於日本殖民末期的文本，需以日本殖民末期的背景解讀，必須抽離戰後初期的社會背景）吳濁流的這些描述中所呈現的衝擊與失落，最大的原因在於大陸的生活方式與他在台灣受日式教育而形成的價值觀產生強烈地衝突。吳濁流在前往大陸前，對大陸的印象只透過長輩口頭傳授與書房教育，「想像」的成份居多。台灣與南京當時雖然同樣處於日本政府的統治之下，但是生活方式截然不同，四十一歲時吳濁流才抵達大陸，「想像」與「現實」間的落差形成了矛盾。正因吳濁流以在台灣生活了四十年的價值觀（日式教育帶來的整潔、守秩序等觀念）來觀看大陸，使得這些描述中呈現了吳濁流身為殖民地知識份子的優越感（帶著與日本同居高位的視角），因此敘述時才會含有貶意。

以上是筆者透過負面描寫內容所進行的分析。這些帶有批判意味的內容因為遭到刪除，在戰後中譯本中已不復見。然而這樣遭刪除的情形並非只出現在對大陸的負面敘述而已，《胡志明》中非負面的描寫與胡志明與其他人物的對話情節也有遭到刪略的情形，以下將展開討論。

第三節、對中國社會的反思與敏感議題

《胡志明》大陸生活的內容中妻子淑春是描述最多的（女性）角色。在胡志明抵達南京開始擔任教師後，關於與淑春「戀愛」與「婚後」的情節有著許多篇

¹⁶⁵ 如：「在還沒有親眼看見的中國，確實是他心中嚮往的『祖國』；特別是在日本統治之下感到無限挫折之餘，『祖國』就變成他的信仰，成為精神上最堅強的支柱。然而很不幸的，吳濁流的探訪中國，使他整個信仰全然摧毀。…『無花果』是以二二八事件為起點和終點，敘述台灣人對祖國從憧憬到幻滅的過程。…台灣人時時希望『祖國』來拯救，結果希望往往落空；歸根究底，這種『祖國』根本就是空虛的，台灣人的那種慕戀完全是在患單相思。吳濁流這種愷切的批判與徹底的覺醒，可以說是經由現實的折磨提煉出來的」。宋冬陽，〈朝向許願中的黎明——試論吳濁流作品中的「中國經驗」〉，《文學界》第10期（1984年5月），頁137-143-144。

¹⁶⁶ 張惠珍，〈紀實與虛構：吳濁流、鍾理和的中國之旅與原鄉認同〉，《台北大學中文學報》第3期（2007年9月），頁59。

¹⁶⁷ 認同矛盾與台灣意識等討論，如：陳室如，〈日治時期台人大陸遊記之認同困境：以連橫《大陸遊記》與吳濁流《南京雜感》為例〉，《人文研究學報》第41卷第1期（台南：國立臺南大學，2007年），頁42-47；張惠珍，〈紀實與虛構：吳濁流、鍾理和的中國之旅與原鄉認同〉，《台北大學中文學報》第3期（2007年9月），頁51-63。

幅的描寫，其中在敘述胡志明與淑春交往過程的內容上，存在著改寫的情形。小說敘述，抵達南京後，有次胡志明帶學生前往明孝陵踏青時（此處刪去了胡志明與學生們吟詩的情節。其中講到參觀明太祖與馬娘娘故居的內容¹⁶⁸，帶有肯定中國傳統文化的意味），遇到一位西洋老師也帶著學生走訪明孝陵，其中一人即是淑春，而淑春正是由上海前往南京的火車胡志明巧遇的女性。不久後胡志明受曾君所託到日語學校授課，竟在學校再次遇見淑春。而後兩人多次相約出遊，漸生好感。這段戀愛情節中穿插了一段胡志明在約會（渡秦淮河）時因見到湖水有感而發的內容：

他試著思考關於中國的未來。亭前的池子中有兩位小孩，正在混濁的水中游著。使他回想起自己童年時的事情：在河畔邊清澈的水池中游著，真的是件非常愉快的事；相比之下，這個地方的小孩們真的非常可憐，他們恐怕不知道清澈的水是什麼吧。說到水，事實上沒有海的大陸，除了長江這樣的濁流以及湖沼中停滯的濁黑的水流之外沒有其他清澈的水了。而這裡的小孩們好像認為水都是混濁的，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我想他們也不會在那樣污穢的地方游泳。¹⁶⁹

此段話看似討論湖水的句子，其實是在以「混濁的湖水」批判中國社會的現狀。「除了長江這樣的濁流以及湖沼中停滯的濁黑的水流之外沒有其他清澈的水了」，胡志明從上海到南京一路上看見乞丐、小偷、阿媽等人的生活模式感到無比衝擊後，回想自己童年時曾在「清澈的水池」（指在台灣的生活）中游著，這樣愉快的事，這邊的小孩們或許無法體會，因為他們從來就不知道清澈的水是什麼，他們好像一直認為水都是混濁的。因為習慣了這樣的生活模式也沒有改善現況的心態，並且之後也會繼續這樣生活下去吧！以此段話顯現他們的無知與悲

¹⁶⁸ 「一行人悠然地一邊賞花，一邊對五百年前的故跡湧起懷舊之情，對明太祖的豐功偉業表示敬意。而後登上裡面的馬娘娘（太祖的皇后）的梳妝處，懷念著昔日的豪華，對於這樣廣大的故跡（大家）感到驚奇不已」。原文：「一行は悠々と花を賞美し乍ら、故跡を偲んで思ひを五百年前に馳せ、明の太祖の偉業に敬意を表した。奥深い馬娘々（太祖の皇后）の梳装処に上って、昔日の豪華を偲び、その豔跡の廣大なのに驚くのであった」。吳濁流，《胡志明（第三篇）》，頁 24。

¹⁶⁹ 原文：「彼は中国の将来について色々想像してみた。亭の前の池に子どもが二人、どす黒い水の中で泳いでいる。彼は子ども頃のことを思ひ出した。せむらぎのほとりの清い淵で泳ぐ、実に愉快なものであった。それに比べてこの地方の子ども達は実にかわいさうなもので、恐らく清水なんか知らないであらう。水といへば、事実海のない大陸では、黄いろく流れる長江の濁流と、湖沼に滞ったどす黒い水の他清水はない。此の辺の子どもは水はみな濁ってゐるものと思つてゐるらしい。さうでなかったら、あんな汚ない所で泳げるものではないと思つた」。吳濁流，《胡志明（第三篇）》，頁 30。底線為筆者所加。這段話在第二版的《アジヤの孤兒》與中譯本《亞細亞的孤兒》中皆已刪除，但是相似的內容曾經出現在《南京雜感》：「我對中國的將來，做了種種的想像。亭前的池子中有兩個小孩，在像秦淮河一樣黑色的水中，盡情地游著。說到水，在沒有海的大陸，除了長江的濁水和湖沼的微濁的水之外，沒有清水。我到南京後，未曾見到過清水。因此，這地方的孩子們，大概以為水都是濁的。我親眼看過船夫掬起玄武湖的微濁的水送入口中」。吳濁流，《南京雜感》中譯本，頁 70。

哀，這是胡志明對上海與南京的生活方式發出的感嘆。

在胡志明與淑春的約會情節中，兩人遊歷的古蹟與觀光勝地及一些胡志明對身邊風景發出的感嘆等內容，在改寫後的《アジアの孤児》版本都只以簡單的一兩句話帶過。《アジアの孤児》版本呈現的焦點著重於胡志明對淑春不敢表達的愛意，且增加了一些（《胡志明》原文中沒有的）文句，強化胡志明對戀愛的不安感受，如：「太明對於兩人停滯不前般的關係，想要弄個明白。他想早日確定淑春的真正心意，然後結婚，想要兩人的愛情有個完美的結果」¹⁷⁰、「他要為了兩人的愛情，求得一個答案」¹⁷¹等。改寫後的版本偏重加強胡志明與淑春的戀愛過程。由這些改寫前的內容，延伸出的是吳濁流對中國社會現況的反思。換句話說改寫後的內容忽略了（寫作原文時正面臨的中日戰爭時期）對現實社會的反思，這樣的情形使得這段內容呈現以戀愛為主軸，隱藏於背後對社會現況的想法便不易被察覺。

而後，胡志明求婚被拒的情節也出現這類的反思內容。一次遊玩，胡志明鼓起勇氣求婚，淑春聽後發表了一連串「新時代女性」的婚姻觀：「至少要與三十個男子當好朋友，再從中挑選出三個來戀愛，然後再選擇最好的一個結婚」¹⁷²，深知被拒絕的胡志明，這麼想著：

中國有著五千年的歷史。從歷史所累積的不自然，正與漫長的歷史成比例逐漸增大。即使希望改正這個不自然，但也並非一朝一夕可以達成。對五千年來將女性視做如玩具，如阿媽（按：女傭）般地對待的中國人要求反省，是有些困難。如果不下定決心的話，是不可能被改正的。所以才說「由這樣歷史產生的女性，應該生來便是為了反抗這個不自然的吧？」這樣善意的解釋。…他更進一步思考著臺灣人，臺灣人在僅僅的三四十年間，因為在華南肆虐，與當地的中國人已醞釀出不佳的感情（按：意指有一群品行不佳的臺灣籍民，仗著日本帝國的勢力在華南大肆作惡，引起當地的中國人不滿）。就算僅僅為了融和感情便要花上一番力氣，更別遑論為了要消除五千年來的不自然，或許她們的生活方式是必要的，一想到此，便轉變為寬大的心情／包容力。¹⁷³

¹⁷⁰ 原文：「太明はなんとなく、自分たちの関係が足踏みしているような、もどかしさにおそわれた。彼自身としては、一日も早く淑春の真意をたしかめ、結婚することによって、自分たちの愛情を完成させたいと思うのだった」。吳濁流，《アジアの孤児》，頁 99。

¹⁷¹ 原文：「彼は、二人の愛情のはっきりした証が求めたかったのである」。同上註，頁 100。

¹⁷² 原文：「私には私の理想があるのよ。女は少くとも三十人の男の好朋友を持って、その中から三人を選んで恋をし、それから一人を選んで結婚するんだわ」。吳濁流，《胡志明（第三篇）》，頁 32。

¹⁷³ 原文：「中国は五千年の歴史をもつてゐる。歴史から来る不自然は、その歴史の長さ按比例して増大するもので、例へその不自然を是正しようと思つても、一朝一夕では出来ない。五千年來女性を玩具の如く、阿媽の如く扱つて來た中国人に反省を求めるとは、ちょっとでは

這段被刪除的文句，呈現吳濁流對中國五千年來封建制度及出生地台灣的反思。上述引文中所言「中國有著五千年的歷史。從歷史所累積的不自然，正與漫長的歷史成比例逐漸增大。即使希望改正這個不自然，但也並非一朝一夕可以達成」，指出對女性的刻版觀念是由中國五千年來的傳統觀念造成的，傳統中女性被視作玩具般的情形吳濁流並不認同，這卻是「五千年」(即「中國五千年傳統」)流傳下來的故有生活模式，要求改正並非易事。這些敘述明顯帶有批判封建制度的意味。而後話鋒一轉，將女性觀念套用在中國人與台灣人的不和諧關係上。

即使強烈地想改變中國女性居於低位的現狀，但就像台灣人與華南地區中國人的關係一樣，實在無法馬上改善。因早期部份的台灣人在華南放肆的惡行，使得當地的中國人對台灣人產生了極壞的印象。再加上後來長期的分隔統治，台灣與中國已產生了明顯的疏離。兩相影響之下，雙方的感情因此無法融合。「或許她們的生活方式是必要的，一想到此，便轉變為寬大的心情／包容力」，筆者認為此句話的指涉對象除了尋求新生活(抱持新時代女性觀)的女性之外，同時延伸至大陸生活中吳濁流接觸的中國人，似乎在說服自己對格格不入的大陸生活以及無法融合的中國人，轉換為寬大的包容力／心境來面對，這是對內心的矛盾最好的解決之道。上述兩段遭刪除的內容都是穿插在胡志明與淑春的戀愛情節中，由此得知，原文中的內容並非只單純地描述兩人戀愛，在這之中想表達的是胡志明對社會現況的反思。然而刪除的動作使得這些想法已不復見。

除了透過遊歷情節闡述想法外，吳濁流也藉由角色的塑造反映時代中出現的人物類型，並透過人物談話提出見解，以知識份子的談話為主。這類描述因涉及許多敏感性詞彙與議題，是刪除篇幅最多的部份。筆者於第一節中已敘述汪精衛、中國共產黨與國民政府三者的關係，也因此得知對國民政府來說「南京汪精衛政府」與「中國共產黨」都是敏感且不想觸及的議題。第一節中已針對《南京雜誌》戰後中譯本的刪略現象歸納出遭刪除內容具有涉及敏感內容(南京汪政府)的一致性，而《胡志明》也因同樣原因導致了刪除的現象。刪除情形主要集中在第二版《アジヤの孤兒》及依其翻譯而來的戰後中譯本《亞細亞の孤兒》中所刪除的涉及「中國共產黨」的內容，以及穿插於小說人物的談話中對國民黨的批判。

這類刪除內容多出現在胡志明與知識份子的談話中，胡志明的友人曾君是小說中相當重要的談話對象。曾君代表的是出生於台灣、長期生活於大陸的知識份

できない。思ひ切ったことをしなければ是正されない。したがって斯う云ふ歴史から産れた女性は、その不自然に反抗しようとして生れてきた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と善意に解釋した。…彼は更に臺灣人について考へてみた。臺灣人が僅か三四十年の間、華南で暴れて中国人に対して面白からぬ感情を醸してしまった。その感情を融和させるだけでもひと苦勞をしてゐるのに、まして五千年來の不自然を無くすには、彼女等のやうな生き方が必要かも知れないと思つて、寛大な氣持に變つてしまった」。同上註，頁 33。底線為筆者所加。

子典型。胡志明抵達南京後寄宿、學習國語、遊歷南京街景與教師工作等，都仰賴曾君的幫助及介紹，曾君同時也是胡志明前往大陸的引薦人，是小說中相當重要的角色。曾君在小說第二篇結尾處（胡志明在台灣）的情節中就已出現，並且有簡單的介紹。曾君是胡志明在國民學校擔任教職時的同事，後赴日留學，帝國大學畢業後就前往大陸，現今因為父親過世而返台，順道拜訪胡家：

曾君堂堂風采，是中國某大學的教授。曾君讓他（胡志明）對於自己的狹窄見識感到慚愧。曾君敘述著中國情況以及閉塞窒息於狹隘的臺灣的愚蠢之舉，因而主張大陸進出論，勸告胡志明前往大陸。……在那之後過了兩個月，胡志明收到曾君的來信。是推薦他前往國立師範女子高中的數學老師的通知書。¹⁷⁴

曾君分享的見聞，對當時身在台灣的胡志明來說是相當新穎的觀念。而後曾君協助胡志明取得至大陸工作的教師證書，是胡志明大陸行的關鍵人物。大陸生活的內容中，在曾君離開南京之前有一段與胡志明深談的情節，此段也出現刪除的情形。首先是對曾君離開南京一事的交代。故事敘述有天曾君派人傳話，希望立即見到胡志明。胡志明抵達曾府後，見到的是已經收拾好行李的曾君獨自一人對他說明自己要離去的事實，「胡志明預想曾君應是為了前往西北地區而離開南京」¹⁷⁵。《胡志明》以及第二版《アジアの孤兒》中皆清楚寫出曾君將前往「西北」一事，但中譯本則以「曾要去的地方已不問而知」¹⁷⁶一句話帶過。劉孝春指出所謂的西北地區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根據地「解放區」¹⁷⁷，曾君前往「西北」一事清楚顯示著其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關係，也可推測曾君此行應與戰事有關。

這段曾君離開南京前的談話以討論社會情勢與戰爭的內容為主，其中也闡述對社會現況應採取的路線的看法，這些內容在後來的版本中皆有刪除的情形，刪除最多的原文內容是對國民黨左翼與國共合作的相關書寫。往前觀看，在曾君出走前其實已有相關內容的敘述。首先是「左翼」一詞的出現，《胡志明》中寫道「進入八月，據說國民黨左翼的活動已經展開」¹⁷⁸。第二版《アジアの孤兒》則

¹⁷⁴ 原文：「曾は風采堂々、中国某大学の教授になってゐる。曾に対して彼は自分の見窄らしさを愧づるやうな思ひだった。曾は中国事情と狭い臺灣に窒息する愚を説いて大陸進出論を主張してしきりに胡志明の渡華を勧める。……それから二ヶ月たって曾から便りがあった。国立模範女子高中の数学教師に推薦する知らせであった」。吳濁流，《胡志明（第二篇）》（台北市：國華書局，1946年10月10日），頁71-72。此段未被中譯本刪除。

¹⁷⁵ 原文：「胡志明の豫想通り曾は西北地区へ馳せるために南京を脱走するのであった。」同上註，頁230；原文：「彼は、かねて胸中にその計画をあたためていた西北への脱出を、今夜決行するつもりだったのだ」。吳濁流，《アジアの孤兒》，頁118。

¹⁷⁶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168。

¹⁷⁷ 劉孝春，〈試論《亞細亞的孤兒》〉，洪宜勇主編，夏潮聯合會、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主辦，《台灣殖民地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64。

¹⁷⁸ 原文：「八月に入って国民党左翼が動き始めたとの噂さが立った」。吳濁流，《胡志明（第三篇）》，頁59。

避開直呼「國民黨左翼」一詞，將其改為「政黨」：「進入八月，政黨的活動變得更加活躍了起來」¹⁷⁹，中譯本也依此版本同樣譯為「政黨」。而後，在曾君與胡志明的談話內容中，清楚地對「國民黨左翼」一詞下了定義：

國民黨大致可分為三派，即所謂的右翼、中翼、左翼，不知道這個趨勢的話是無法從事政治的。右翼的代表人物為抱持保守的、封建的思想的大地主。他們雖然是參加了國民革命，但卻是為了保衛大地主的支配權，害怕地主制度的崩潰，參加革命又畏懼革命，經常反對國共合作的他們是急進派。中翼以代表中央的中心勢力的財閥為主。因為他們原來是英國美國的買辦中介人，致力於民族資本的紮根、致力於脫離外國資本主義的羈絆，企圖成為資本主義的核心。因此，透過與武力的結合試圖建設中國資本主義。國民黨的左翼為代表中小工商業者以及知識份子，以及學生的思想的一派，帶有中產階級式的性格。他們對帝國主義的壓迫深感痛心、思想上存在反抗的意識但並不擁有這樣的實力。武力方面財力方面都顯得無力的左翼只要機會來臨，便拼命地想要突破中翼，希望成為中國資本主義的主人公。但是，這個夢想總是因為與現實衝突而被粉碎，不停地反覆著煩悶、焦躁與動搖。這個時候國民黨左翼似乎展開行動，但卻是靠不住的。那只不過是一時的現象，依據形勢而又展開的行動。社會革命再沒有像中產階級式的性格這般麻煩的東西了。我們依真理而起，除此之外就什麼也不是。¹⁸⁰

這段文句清楚地寫出國民黨三派各自的特徵，再以「國民黨左翼」作為主要討論對象，對國民黨左翼的走向顯然帶有勸告的意味。文中指出，國民黨左翼「只有存在反抗的意識的思想的中產性格，但沒有實力」的狀況，曾君並在文中批判中產性格，說道「社會革命再沒有像中產階級式的性格這般麻煩的東西了」。武力與財力方面都顯得無力的左翼，為了改善現況而奮起改革，即使如此，但是只

¹⁷⁹ 原文：「八月に入ると、政党の動きが急に、活潑になり出した」。吳濁流，《アジヤの孤児》，頁 117。

¹⁸⁰ 原文：「国民党は大體三派に分れてゐる所謂、右翼、中翼、左翼、でこれらの趨勢を知らなくては政治が出来ない。右翼は保守的、封建的思想でその代表が大地主である。彼等は、一應国民革命には参加するが大地主の支配を保衛し、その崩潰を恐れ、革命に参加しつつ革命を危懼して常に國共合作に反対する急進派である。中翼は中央を代表する中心勢力で財閥が代表してゐる。彼等は英米の買辦ブローカから成長して民族資本に根を下し、外國資本主義の羈絆から離脱して資本主義の核心にならうと努めてゐる。それが武力と結合して中国資本主義を建設するのである。国民党左翼は中小商工業者及び知識階級、学生の思想を代表する一派で中産的性格を帯びてゐる。彼等は帝國主義の壓迫を痛感し、思想的には常に反抗的であるがその代り實力を持たない。武力にも財力にも無力な左翼は機会があれば中翼を突破って中国資本主義の主人公にならうともがいてゐる。が、その夢は何時も現實にぶつかって粉碎され、煩悶、焦躁、動搖を繰返してゐる。此頃、国民党左翼がまた動き出したやうで此等の動きは当にならぬ。たゞ一時の現象で形勢に依つてはまた動くのである。社会革命はこの中産的性格ほどうるさいものはない。我等は真理によつて起つ、それ以外に何ものもない」。吳濁流，《胡志明（第三篇）》，頁 60-61。底線為筆者所加。

要碰觸到現實面，不足的状态就會出現。這段直接批判的內容完全被戰後中譯本刪除了，原因明顯與對國民黨的批評有關。

除此之外，對於中國共產黨的相關內容也出現了刪除的情形。故事敘述胡志明受曾君所託接替日語學校的教職，當時社會有著學習日語的風潮，學習日語者有官吏、實業家以及大學生等，其中有一位張姓外交部參事與胡志明私交甚篤，兩人常交換對於政治與社會的心得，張參事也因職務之便告訴胡志明一些外交部的新聞，並在之中對中國情勢發出喟嘆¹⁸¹，而後描述兩人同遊時張參事對文化提出的批判：

中國的文化完全是貴族享有的文化，是為了少數人而存在的文化，缺乏大眾性。第一、文字的難度。光是記住它至少也要花上十年吧，因此文化的普及也沒有辦法做到。一般大眾有生計問題，為生活奔波的同時根本沒有閒暇時間學習這麼難解的文字。因此僅限於使用漢字的話，最終大眾只能成為文盲。總之漢字已經不合時宜了，若不能使之簡化的話，是很難與其他的文明國家競爭的。……第二件愚昧的事情是由上述文字而產生的文學，既難以理解又高尚。一般大眾無法理解體會。因此懂得文字的話便能成為偉大的人，造成讀書人長期支配天下的狀況，一般大眾甚至連寫信都做不到。執著於漢字，中國便無法建設新的文化。沒有新的文化，中國便永久無法獲得解放。¹⁸²

¹⁸¹ 「最近有這麼一件事。在北京的記者團把目光集中在親日的外交政策上，並發出攻擊性的質問。聽說外交部有一位姓黃的官員，實在大膽，據說他曾經這樣回答：『中國終究會邁向滅亡的命運。既然遲早都會滅亡的話，在滅亡之前，何不互相幫助共得利益呢？』這個辛辣的諷刺讓大家面面相覷啞口無言……。黃姓官員難道不是因為意識到悲慘的歷史的轉換而如此自嘲嗎？而這難道不是對中國悲慘的現狀感到憤怒嗎？（他）藉由這樣的爆發來喚醒中國人的反省之心，這正是中國的悲哀啊」。（原文：最近こんなことがあったよ。在甯記者團が八方から矢を親日外交に集注して、攻撃的な質問を發したんですが、外交部の黄といふ人が出て、實に大膽で、そしてまたふるつたことを答へたよ。『どうせ中国は亡びる運命を辿ってゐる。どうせ亡びるなら亡びる前にお互儲けてやろうではないか！』と答へたさうだ。この辛辣な皮肉は居並ぶ面々を啞然たらしめてね……。黄は悲しい歴史の轉換を意識して、自嘲的に云ふ現はしたのであるが、悲しいわが中国の現狀に対する憤怒ではないか！それを爆發させて皆の反省を求めた所に中国の悲しさがある）。這段話透過張參事敘述黃姓官員自嘲一事，來指涉大陸知識份子對中國現況（中日戰爭下的情勢）的悲觀。文中以「中國終究會邁向滅亡的命運」指出戰事下中國的現況，並指中國的悲哀在於並未因趨於不利的情勢而感到憂心（也未有反省之心），因此選擇藉以自嘲來表達憤怒。此段未被中譯本刪除。吳濁流，《胡志明（第三篇）》，頁43。

¹⁸² 原文：「中国の文化は全く貴族が享受し得る文化である。少数人のために存在する文化で、大衆性がない。第一、その文字の難しいことである。それを覚えるだけでも十年はかゝらう。それでは文化の普及しようがない。一般大衆には生活がある。生活に逐はれてそんな難解な文字を習得する閑がない。それで漢字を使ふ限り、結局大衆は文盲になるほかはない。兎に角漢字はもう時勢に合はない。もっと簡便なものでなければ、他の文明国に伍して競争し得ない。……第二に馬鹿らしいものは、その文字によって所産された文学である。難解で高尚で、俗人に解らないやうに出来てゐる。それで文字を知れば偉い人になれたのである。お蔭で讀書人が長く天下を支配した。一般大衆はそのために手紙さへ書けないのであった。漢字

這段闡述文字與文化想法的內容在日本發行的《アジアの孤兒》中並未遭到刪除，但戰後於台灣發行的中譯本卻完全刪除，這樣的狀況究竟為何？

文中張參事站在一般大眾的角度，提出對文字與文學的辯證。他指出文字的與文字撰寫的文學兩者的艱難，造成文盲的存在，並在之中提出這是導致讀書人長期支配天下的原因。不識字或無法理解文學的一般大眾，連寫信都做不到，自然無法參與新的文化。強調必須簡化文字，使其容易被一般大眾所理解，否則影響了文化的建設甚至影響著中國的解放道路。以此文的中心思想來看，劉孝春指出，張參事的這段發言與當時中國左翼文學陣營瞿秋白、魯迅等人提倡的「文藝大眾化」問題相符¹⁸³。筆者認為所謂的「中國左翼文學陣營」指的應該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是 1930 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的文藝組織，成員有魯迅、馮雪峰、郭沫若、郁達夫等，宗旨為「站在無產階級解放鬥爭的戰線上」，而後進行了馬克思主義的譯介（其中瞿秋白曾翻譯俄文版的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推行文藝大眾化等活動，最後因內部分裂等問題於 1936 年自行解散¹⁸⁴。史料顯示，當時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瞿秋白也參加了此文藝組織，並同時推行文藝大眾化¹⁸⁵。其中，瞿秋白與魯迅¹⁸⁶所主張的以大眾熟悉的形式寫作的「文藝大眾化」觀點，與小說中張參事對文字文學的觀點一致。也就是說倡導為大眾理解的文字（繼而影響文學與文化）的想法與「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中心思想符合，由此劉孝春的說法得以印證。

に執着してゐては、中国に新しい文化の建設は行はれない。新しい文化のない限り、中国は永久に解放されない。吳濁流，《胡志明（第三篇）》，頁 47-48。用詞稍有不同的是，《アジアの孤兒》中將「中国は永久に解放されない」改為「中国は永久に独立できない」。吳濁流，《アジアの孤兒》，頁 112。

¹⁸³ 劉孝春，〈試論《亞細亞的孤兒》〉，洪宜勇主編，夏潮聯合會、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主辦，《台灣殖民地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364。

¹⁸⁴ 〈第三章 三十年代文學思潮〉，收於朱棟霖、丁帆、朱曉進主編，張堂錡審訂，《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 上冊》（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2000 年 9 月初版），頁 43-50。關於中國左翼作家聯盟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詳見張小紅，《左聯與中國共產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0 月），頁 62-78。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轉載翻譯與文藝大眾化內容的刊物，詳見陳紅旗，《中國左翼文學的發生 1923-1933》（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0 年 7 月），頁 114-131。

¹⁸⁵ 張小紅，《左聯與中國共產黨》，頁 169-170。蔣明玳，〈瞿秋白與“左聯”〉，收於湯淑敏、蔣兆年、葉喃主編，《瞿秋白研究新探》（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 12 月），頁 370-379。周永祥，《瞿秋白年譜新編》（上海：學林出版社，1992 年 8 月），頁 287-290。「瞿秋白提倡“現代中國普通話”，認為“革命的大眾文藝，尤其應當從運用最淺近的無產階級的普通話開始”，瞿秋白提倡的這種普通話是有相當包容性的，目的是用民眾真正聽得懂的語言創造大眾文學」。李靜，〈瞿秋白與文藝大眾化〉，收於陳鐵健等編，《瞿秋白研究文集》（北京：中共黨史料出版社，1987 年 12 月），頁 217。

¹⁸⁶ 「文藝本應該並非只有少數的優秀者才能夠鑑賞，而是只有少數的先天的低能者所不能鑑賞的東西。…但讀者也應該有相當的程度。首先是識字，其次是有普通的大體的知識，而思想和情感，也須達到相當的水平線，否則，和文藝即不能發生關係」。〈文藝的大眾化〉，發表於 1930 年 3 月 1 日的《大眾文藝》，收於魯迅，《魯迅全集第七卷·集外集拾遺》（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 年），頁 772。

而文中對於文字文學延伸至新文化建設及中國解放道路的想法，與「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中提倡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觀念完全相符。三〇年代中國文壇以「革命文學」為中心思想，意指透過文學的手段達到革命的目的（此時期的文學家也等於革命家），革命文學的倡導者著重處理文學與人民間的關係，並以無產階級的「工農兵大眾」為主要關注對象，強調站在他們的立場上，寫作關懷無產階級的文學（亦稱為「無產階級文學」）¹⁸⁷，此點也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中心思想。另一方面，張參事所言「中國的文化完全是貴族享有的文化，是為了少數人而存在的文化，缺乏大眾性」（帶出階級問題）以及「讀書人長期支配天下」的說法亦符合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反封建」、「反資產階級」觀念，張參事的觀點顯然是受到三〇年代的中國文壇思潮與「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影響。涉及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文藝組織的內容，牽扯到的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之間的關係，對戰後的台灣來說，實屬敏感議題，且文中對於漢字的批評也帶有負面的含意。然而對日本而言，無論是批評中國漢字或中國共產黨的文藝組織並不具敏感性，此點應是此段內容只在中譯本出現刪除情形的原因。

另一方面，透過這段內容可觀看吳濁流在寫作時抱持的「對階級問題的關懷」面向。這點由《南京雜感》的文章中可看出。例如描寫勞動階層阿媽的內容：

南京有叫阿媽的特定階級。阿媽是要做下女的工作的，但和下女又不同。阿媽與下女之顯著的不同，不在工作，而是在階級。……我們雇阿媽時，很驚異於她的大食。事實上，四、五個人吃的飯，她一個人就把它吃光。我在南京時，叫妻任阿媽去吃，不到半個月，她就無法大吃了。我這才知道原因。她們平時是要吃剩飯的，有的時候儘量吃，沒有則挨餓，到知道時時都能吃飽飯，阿媽也就恢復為常人了。¹⁸⁸

在這段描寫中，吳濁流點出了幾個中國社會存在的問題。吳濁流指出阿媽與下女雖然工作性質相同，但阿媽居於更低的位階，儼然是中國社會最底層的縮影。「沒有剩飯時則需要挨餓」，因此有食物時便盡量吃。吃剩飯的狀況是因為阿媽的階級低，沒有與雇主同時進食的權利，只能接受「剩餘的」東西而已。此處吳濁流強調阿媽的生活模式是由社會的貧困問題與階級問題所造成。如果天天都能吃飽飯，她們也無須如此的暴食，更無須偷竊。這段內容與第二節筆者提出的「乞丐」與「會客的宴會（聚餐）」情節的分析一同看來，皆顯示吳濁流對階級問題的關心。

而後張參事提出對當時學習日語的風潮的想法，應與當時社會的不安定有

¹⁸⁷ 〈第三章 三十年代文學思潮〉，收於朱棟霖、丁帆、朱曉進主編，張堂錡審訂，《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 上冊》，頁 42-45。

¹⁸⁸ 吳濁流，《南京雜感》中譯本，頁 73-76。底線為筆者所加。

關。「中國因為滿洲失陷這件事感到越來越多的壓力。也就是有了最後的關頭必定會來臨的預感。這個現象造成現在學習日語的趨勢。絕不能將這趨勢當作是單一的現象來看，有心人士正為了此事而憂慮」¹⁸⁹。將學習的日語熱潮解釋為因為中國人對戰事缺乏信心，認為國家將要瀕臨滅亡，因此積極地學習日語，以便日後所需。從語言、文字的使用狀況連結文化與社會現況，這是典型的知識份子的論述方式。劉孝春提出，張參事是吳濁流刻意塑造出來的「南京知識份子」的典型，並帶有正面評價的意味¹⁹⁰。張參事的言論對胡志明來說並不似上海與南京街景那般帶來的負面感受，而是帶著激發胡志明思考的肯定意義。

最後是胡志明離開大陸前的情節，也出現了刪除的情形。與曾君、張參事一樣，胡志明同樣代表著戰爭時期中的知識份子典型，文本中描繪的胡志明的生命經驗也被視為是吳濁流本人生命經驗的投射¹⁹¹。胡志明與曾君雖然都出生於台灣，但兩人所代表的類型並不相同。曾君因為長期居住於大陸，已徹底融入大陸的生活模式，對於戰爭與社會等情勢瞭然於胸。而胡志明的價值觀則是在抵達大陸前就已形成，除了不易融入大陸的生活模式外，也因為戰爭期間才抵達大陸，對於戰爭與社會等情勢理解有限。同時，因為來自日本殖民下的台灣（身份）的敏感性而成為被關注的對象。第三篇後半部內容寫道，胡志明因「台灣人」的身份遭到南京警察的約談，而後警察將胡志明帶往一地囚禁，數日後胡志明在學生素珠與幽香的協助下順利脫逃，準備離開大陸。在逃亡的過程中，搭乘汽車逃往港口的胡志明，在登上離開南京的小船時，聽見船長諷刺「為了得到幫助，在情況變得不利時便承認自己是日本籍民」¹⁹²之後，慚愧的想著：

他感到無法忍受的慚愧，就像完全被潑了冰水一樣，寒冷的感受一直延伸到背脊。什麼壞事也沒有做的自己卻變得想要逃避隱藏的卑怯的心情，連他自己本身都無法理解。就算在堂堂正正的法庭為自己辯解，說到現實帶

¹⁸⁹ 原文：「中国は滿洲を失陥してからますます或る壓力を感じざるやうになった。つまり必ず最後の關頭に立たなければならぬ日を豫感してゐる。その動きが日本語熱となつて現はれてゐる。単に一時の現象として看過してはならない。心あるものは齊しく憂ふ」。吳濁流，《胡志明（第三篇）》，頁 49。此段未被中譯本刪除。

¹⁹⁰ 「可見張參事的立場是代表進步一方的，也是吳濁流刻意塑造出來，用以作為南京知識分子正面肯定的典型來描寫的」。劉孝春，〈試論《亞細亞的孤兒》〉，洪宜勇主編，夏潮聯合會、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主辦，《台灣殖民地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海峽學術出版社，2004年2月），頁 369。

¹⁹¹ 胡志明出生於台灣，童年時受祖父傳達的儒家傳統觀念影響，對中國懷抱憧憬與想像。求學時胡志明接受殖民地日式教育，進入公學校及師範學校就讀，並於畢業後在家鄉擔任教職。而後面臨教員間的暗鬥（日本教師地位較高等事件）及經歷失戀（與日本女子戀愛失敗）等挫折，決定前往日本留學（筆者註：吳濁流本人並未前往日本留學）。胡志明在日本受新思潮的衝擊，卻因為未參與留學生運動而遭到孤立。返台後胡志明見到殖民體制下的社會問題（如製糖會社的榨取政策）以及面臨自身家庭問題（祖父過世後的分家問題），為了排解心中的矛盾感受，胡志明決定在曾君的幫助下，前往大陸（以上為《胡志明》第一篇與第二篇的大略內容）。

¹⁹² 原文：「仕様のない奴だ。平常はなに喰はぬ顔をしてゐるくせに、不利になると日本籍民でござる。助けて呉れ一とは少々蟲がよすぎるぞ」。吳濁流，《胡志明（第三篇）》，頁 71。

來的恐怖感受，他認為能堂堂正正地在法庭為自己威風凜凜地辯護，主張自己的清白，並且親身保衛「臺灣人」的正當性才是個男子漢。他無法忍受良心的苛責，就像站在預審法官的前方那樣，低著頭只是感到相當後悔。¹⁹³

船長諷刺胡志明主張自己是「日本籍民」身份一事，對應到的是胡志明無法坦承自己是「台灣人」的悲哀。此段話清楚寫出身份認同的困境，但在第二版《アジアの孤児》中也被刪除。胡志明初抵大陸時，曾君曾告誡不可透露「台灣人」的身份，令他回想自己在日本留學時，因為在東京中國留日同學會中坦率承認自己是台灣人，而遭到旁人的誤解¹⁹⁴。相似的內容，也出現在《南京雜感》中：

那天是零下四度或五度，身著臺灣衣飾的我，與大陸紳士在一起，覺得矮人一截，有如雞立鶴群之感，就連自己都無法不介意這貧弱的樣子。臺灣的冬衣窄而短，簡直無法與具備堂堂上海風氣派的大陸西服相比。身著短短的大衣與窄小的西服步行於上海租界的時候，連朋友都為之焦躁不安。¹⁹⁵

這段話為吳濁流一開始抵達南京時對大陸知識份子的相形見拙的感受，這與他後來描述南京街景時抱持的殖民地知識份子優越感完全不同。初抵大陸時隱藏身份一事，不僅僅因為台灣人身份的敏感性，也包含無法融入大陸的羞赧感。在轉換生活空間時，對身份的邊界產生模糊。與曾君不同的是，胡志明無法完全融入大陸生活的狀況，短暫的大陸生活（非曾君長期居住的狀況）與台灣生活的差異，也是無法徹底融入的原因之一。對照離開大陸時必須承認台灣人的日本籍民身份一事，帶出了台灣人多重「身份」的曖昧，這是台籍知識份子在大陸生活中面臨的最大課題。

胡志明逃獄後，並非直接由南京前往台灣，而是再度停留上海。小說中有一

¹⁹³ 原文：「彼は慙愧に堪え兼ね、まるで氷水にかけられた思ひで冷さが背筋までひやりとするのであった。何も悪い事をしない自分が逃れ隠れ度い卑怯になった気持が彼自身にも解らなくなった。現実的恐怖と云へば體裁がよくて辯解もつくであらうが正々堂々法庭で云ひ、自分の潔白を主張し、臺灣人の正しさのために身を以て守るのが男であると彼は思った。彼は心の苛責に堪え兼ねて豫審判事の前に立たされた思ひで、頭を垂れたまゝ、たゞ後悔するのであった」。同上註。

¹⁹⁴ 原文：「彼は留学時代、曾って東京中国留日同学会へ行つたときに、率直に臺灣人と名乗つたために却って誤解を招いたことがある」。吳濁流，《胡志明（第三篇）》，頁3。

¹⁹⁵ 原文：「其の日は零下四度か、五度かで臺灣仕込みの身なりでは大陸の紳士に伍して肩身が狭く全く群鶴隻鶏の感であつて自分乍らその貧弱さを気にしてならなかつた。臺灣の冬服は狭くて短い。大陸の洋服は上海風の堂々たるに比べて見られたざまではなかつた。短いオーバーと狭苦しい洋服を着て上海の租界を歩くときはお友達までがいらいらしてゐた。」吳濁流，《南京雜感（一）南京の相貌》，《臺灣藝術》第三卷第十一號（昭和17年／1942年11月1日發行），頁29。此段未被中譯本刪除。

段他在上海餐館內回應情勢的情節，也在後來的版本中遭到刪除：

他（按：胡志明）約有一個月的時間沒有看報了，因此無法得知情勢。他拿起旁邊的報紙看著，感受到國際的緊迫情勢。國共合作應該可以順利進行吧。他認為曾君確實是有見識的。曾君說過解救中國的危機之路只有一條，那就是國共合作。曾君認為，現今社會的不安與動搖，來自於對政府的不信任而產生的絕望感，成為失去自信的悲哀的歷史現況。想到如同曾君所主張的社會現象正逐漸具體化，胡志明感到愕然。上海的不安難道也正如曾君臆測的那樣，暗底裡伸進了國際勢力的魔掌嗎？這樣的話，所謂的一觸即發，胡志明感到歷史的悲劇似乎馬上就要爆發了一樣。¹⁹⁶

這段內容中，顯示了當時上海動盪的狀況，呈現戰爭逼近的狀態。敘述中再次引用曾君對戰事的想法，「曾君說過解救中國的危機之路只有一條，那就是國共合作」，對照之前曾君批判國民黨左翼沒有實力的談話，兩者結合後曾君「國共合作」的主張非常清晰可見。由前述背景的爬梳可以明瞭，1926年中山艦事變發生後，中國國民黨對於中國共產黨已經產生懷疑，並無法信賴因「容共」政策而加入黨內的中國共產黨員。而後的「寧漢分裂」與「清黨」等事件都再顯示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間關係的惡化。由此得知，對於戰前及戰後的國民政府來說「國共合作」之主張都不是其所認同的政策，此段內容遭到戰後中譯本刪除的原因便得以理解。

而胡志明離開大陸前，小說再次將場景安排在上海（胡志明抵達大陸時的第一站），此點應與「上海」地區的特殊性有關。正如第二章所述，上海地區早在二〇年代時已為台灣留學生的重要活動中心，加上「新聞中心」與「租界」（中西方文化交混）的特性¹⁹⁷。這些特性彰顯了「上海」在吳濁流的大陸經驗中，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小說中胡志明在返台前曾以「在上海歷史之流正以加速地壓倒性的力量迴轉著」¹⁹⁸、「上海是極度地興奮與極度地緊張。民眾組織的各種團體每天如雨後春筍般出現」¹⁹⁹來描述上海。將上海安排為胡志明大陸生活的最終

¹⁹⁶ 原文：「彼は約一箇月間新聞を見なかったから情勢が判らない。傍にある新聞紙を取上げて見た。国際情勢がいよいよ逼迫して来た印象を受けるのだった。どうやら国共合作が順調に行ったらしい。曾は確かに見識があると彼は思った。曾は中国の危機を救ふには道はたゞ一つだと云ふ。それは国共合作である。現在の社会的不安と動揺は政府に対する不信から来た絶望感であって自信を失った悲しい歴史の現れであると云ってゐる。曾の主張通り社会現象が漸次具體化しつつあるやうに思はれて彼は愕然とした、上海の不安も曾が臆測するやうにその裏には国際の魔の手が伸ばされてゐはしないだらうか？さうなれば所謂、一触即発で歴史的悲劇が直ちに爆發されるやうな感じだった」。吳濁流，《胡志明（第三篇）》，頁73。底線為筆者所加。

¹⁹⁷ 請參考本論文第二章第一節〈大東亞共榮圈下台籍作家的大陸行〉。

¹⁹⁸ 原文：「上海では歴史の流れが加速的に壓倒的な力を以て迴轉してゐる」。吳濁流，《胡志明（第三篇）》，頁74。

¹⁹⁹ 原文：「上海は極度に興奮して極度に緊張した。民衆は日毎に組織されて各種團體が雨後の

場景，有著（與初抵大陸的內容）前後呼應的特點。上海動盪不安的社會狀況強化了戰爭的氛圍，也顯示為了尋求精神寄託的台籍知識份子，即使（離開台灣）抵達大陸，仍舊無法排解心中的矛盾，反而加深困惑，最終以「逃亡」的形式結束大陸生活。

對於《胡志明》中涉及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等議題的討論，由於中譯本《亞細亞的孤兒》已刪除上述羅列的內容，因此在前行研究方面未能提出相關分析。導致前行研究必須以《無花果》等戰後文本做為分析對象，並藉由戰後文本中對於國民政府的描寫來解讀吳濁流對中國國民黨的看法（將戰前大陸經驗的負面描述及戰後初期的衝擊皆視為吳濁流對國民政府幻滅的印證）²⁰⁰，以補足戰前文本的缺乏的現象。然而《胡志明》中的大陸生活及其帶出的大陸觀感，除了第二節中所討論的負面描述外，同時也顯示著長期以來矛盾的國共關係。這些部份隨著刪除而不復見，是前行研究的一大缺漏。

第四節、小結

本章透過 1942 至 1943 年發表於《臺灣藝術》上的〈南京雜感〉系列文章以及寫於 1943 至 1945 年的《胡志明》兩部作品，以其所描寫的「大陸生活」分析作品中所呈現的大陸群像。因兩部作品的寫作時間最貼近吳濁流的大陸經驗，文本中所描繪的大陸生活，可視為吳濁流 1941 至 1942 年大陸經驗的真實反映。在整理兩部作品的發行的版本時，可以發現戰後發行的中譯本內容皆有刪減原文的現象。因此，本章中筆者以回歸原文的方式²⁰¹，分析吳濁流寫作當時的大陸觀感。

第一節中，首先概述《南京雜感》的發表狀況。再透過與原文的對照後，整理戰後中譯本的刪略內容，並從中分析刪略的真正原因。觀察後發現，《南京雜感》中遭刪除的內容均有涉及四〇年代南京汪精衛政府的共通點，並對這些內容賦予正面評價，此議題的敏感性應是造成這些內容遭到中譯本刪除的最大原因。而刪去南京汪政府的相關敘述後，《南京雜感》的中譯本便以南京街景、人物與生活等記錄為主要內容，造成前行研究普遍將《南京雜感》視為「遊記」及「旅行文學」範疇來分析的現象。這是僅閱讀中譯本（未回歸原文）所形成的分析漏洞。

箭の如く生れて来るのであった」。同上註，頁 75。

²⁰⁰ 如：「『無花果』中最主要的部份，是敘述國民政府來接收台灣的情形。他對當時行政的紊亂情形，對軍隊的紀律蕩然，一再地感到驚異、惶恐」，並指出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的發生使台灣對中國再度幻滅。宋冬陽，〈朝向許願中的黎明——試論吳濁流作品中的「中國經驗」〉《文學界》第 10 期（1984 年 5 月），頁 144。

²⁰¹ 〈南京雜感〉方面，因《臺灣藝術》雜誌有散佚的情形，若有涉及散佚期數的內容，才使用中譯本內容分析。其他部分皆以原文作為分析對象。

而《胡志明》的刪略篇幅更為明顯，對照後顯示，戰後通行的中譯本《亞細亞的孤兒》完全是依照 1956 年於日本發行的第二版《アジアの孤兒》內容翻譯而來，相同的情節也具備同樣的改寫情形，已不是 1943 至 1945 年間最初寫作的版本。第二節開始，筆者以《胡志明》原文中「遭刪除的內容」為主要分析對象，分析其所呈現的想法及共通點，以期明瞭遭刪除的原因與這些內容中所呈現的大陸觀感。首先透過文本所描繪的上海與南京的街景、生活模式與生活觀念以及接觸底層人物的情節等，討論這些內容以「負面」呈現的含意，可歸納出兩個特點。第一個特點為文本中呈現的兩種教育（傳統漢學、殖民地日式教育）對吳濁流帶來的雙重影響。形成中國觀念受長輩傳達的傳統漢學影響（在童年時期就已形成），而價值觀受日式教育的影響的情形。造成吳濁流抱持著「殖民地知識份子的優越感」（帶著與日本同居高位的視角）來觀看大陸，導致這些描述多以「負面」的形式呈現於文本中。第二個特點是透過街景及生活模式等負面描寫，帶出自己的想法與批判。例如以南京乞丐、隨意排泄行為及三大娛樂（麻將、聚餐、看戲）等描述，闡述對於貧困問題（貧富不均）、階級問題、衛生問題以及女性解放議題的想法。以上都是吳濁流透過負面描述，表達對中國社會的批評及憂心。

第三節中筆者透過穿插於戀愛情節中的內容以及胡志明與友人的談話情節，可歸納出另外兩個特點。第三個特點為藉由描述延伸出對中國社會與台灣的反思。例如描述胡志明看見在「混濁的湖水」中游泳的小孩時，以此抒發對中國現況的憂心。第四個特點是小說人物的談話中涉及了中國國民黨與國共關係等議題，這類內容也是刪除篇幅最多的部份，例如對國民黨左翼及其中產性格的批判，及刪除胡志明正面肯定「國共合作」想法的內容。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刪除內容中出現了兩處只存在中譯本的刪除現象。第三節中筆者已提及，中譯本《亞細亞的孤兒》中的刪除內容與《アジアの孤兒》幾乎呈現一致的情形，由此可推測中譯本內容是依照第二版《アジアの孤兒》翻譯而來。不過在對照刪除內容後，筆者發現兩處例外。第一處為曾君在行前與胡志明的談話中，對於欲前往之處的描述。原文《胡志明》與《アジアの孤兒》中皆寫明曾君將前往俗稱「解放區」的「西北」，但是中譯本《亞細亞的孤兒》中卻未寫出「西北」。第二處是張參事在談話中所發表的對文字、文學與文化的意見。張參事指出中國的文字艱難不易理解，文字若無法普及所影響的不僅是文學與文化，甚至是中國的解放道路。此想法與三〇年代「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所提倡的「文藝大眾化」與三〇年代中國文壇提倡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等內容相符。以上只存在中譯本中的刪除情形都是與「中國共產黨」有關的內容。由日本發行的《アジアの孤兒》沒有刪除這兩個部份這點來看，可推測刪除行為應與中譯本發行的時間與背景有關。換句話說，「中國共產黨」對中譯本發行時執政的中國國民黨政府來說是極欲避免的敏感部份，因而中譯本刻意刪除相關內容。

統合以上刪除情形，顯示著這些遭刪除的內容的最大共通點在於涉及當時政治權力（立場）的情形。《南京雜感》方面，觀察後發現，未被收錄於《南京雜感》中譯本的文章與文句皆有寫作「南京汪精衛政府」相關內容的共通點，且這些內容都賦予南京汪精衛政府「正面評價」。而《胡志明》中遭到刪除的內容則是涉及寫作「中國共產黨」相關內容與對「中國國民黨」的批判。對照筆者於第一節中所梳理的「汪精衛」、「中國共產黨」與「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三者的關係，可得知以上指出的南京汪精衛政府、中國共產黨、解放區及國共合作等詞彙，都被戰後執政的國民政府視為敏感議題，因此成為中譯本刪除與改寫的最大原因。

刪除現象也呈現著吳濁流的文本受到政治權力干涉的情形。吳濁流於四〇年代寫作時，正逢日本殖民時期與中日戰爭，他在實際的大陸經驗後，在文章中抒發了對中國社會的想法以及對中國國民黨的批判。然而這些內容到了戰後，卻因議題敏感未收錄於戰後的中譯本。此現象顯示著文本與政權之間的對應關係。另一方面，文本差異的情形也影響了前行研究的重心。由第二節與第三節的分析可以看出，遭刪除的內容清楚地呈現了吳濁流的大陸觀感，然而以中譯本為研究對象的前行研究無法閱讀到這些已刪除內容，導致研究者必須藉由戰後文本來解讀吳濁流對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的看法。

以上內容顯示，還原作品原文後，文本中吳濁流的許多想法便一一浮現，出現了與前行研究中不同的解讀面向，這也是筆者於此章中最想釐清的部份。這些還原後的大陸觀感甚至可連結至戰後，與吳濁流戰後作品中表達的想法亦有相互呼應的可能，關於此部份筆者將在下章進行分析。

第四章 大陸經驗之戰後相關作品探討：

《波茨坦科長》（1948）、《無花果》與《台灣連翹》（1968-1973）

1945 年隨著日本宣布戰敗，台灣由日本殖民時期結束至國民政府來台接收的過程，歷史上將這樣的政權轉換賦予「光復後」或「戰後」的稱呼，台灣文壇也普遍以 1945 年作為界線，將作品依寫作時間劃分為「戰前」與「戰後」兩個區塊來討論，吳濁流於戰後初期（1945-1949）完成的作品自然也被劃入「戰後」的脈絡中。然而完成於戰後初期的作品，雖然寫作時面臨著的是不同於日本殖民時期的國民政府政權，但作品中所闡述的思想與觀感不可能憑空而來，必定與作家的生活經驗相關。若單就政權的轉換將作品依寫作時間劃分研究區塊，易造成忽略作家生活經驗與思想連結的情形。筆者觀看吳濁流戰後初期的作品，舉凡使用本省人、外省人等詞彙或描述戰後初期社會狀況的情節等，皆因受到 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影響，使得這些作品集中以「二二八」與「戰後初期社會」為主要討論焦點，形成將「戰前」與「戰後初期」分開討論的情形，例如發表於 1948 年的小說《波茨坦科長》。然而吳濁流在戰前就已經歷了實際的大陸生活，戰前至戰後的「大陸觀感」是延續且不可分割的，因此，戰後初期的作品也應納入吳濁流大陸經驗的討論中。

而同樣被放置在「二二八」脈絡下研究的作品，還有吳濁流於六、七〇年代寫作、出版的回憶錄《無花果》與《台灣連翹》。七〇年代開始，吳濁流的作品出現了系列性出版的現象。無論是戰後寫作的作品或是殖民時期（例如寫於 1942 年至 1943 年的《南京雜感》）與戰後初期寫作的作品（例如寫於 1947 年的〈黎明前的台灣〉）等，皆被編輯成冊，以中文／中譯本刊行。這波出版潮諸如：遠行出版社於 1977 年出版的一系列的《吳濁流作品集》、1988 年遠景出版社與 1995 年草根出版社各別再版相同內容的作品等。其中，吳濁流的兩部回憶錄《無花果》與《台灣連翹》同樣出現在這波出版潮中。1968 年發表的《無花果》與 1973 年發表的《台灣連翹》中同樣記載著吳濁流 1941 年至 1942 年的大陸經驗，比起第三章分析的《南京雜感》與《胡志明》，回憶錄作品與殖民時期寫作的作品在寫作的時間上相隔了二十年以上的時間。這段時間中，吳濁流面臨了政權轉換後的社會、寫作語言的轉換（以日文寫作轉變為嘗試用中文寫作）以及二十多年時間的影響，二十多年後吳濁流以「回憶」的形式再次撰寫同一段大陸經驗時，書寫內容與視角是否可能因環境的改變（政權等社會因素）而受到影響？相隔的時間是否可能讓「回憶」造成錯置或誤差？為何吳濁流選擇在戰後再次書寫大陸經

驗？這些皆是閱讀回憶錄時必須考量的問題。回憶錄的內容具有再現（再次出版）相同內容（大陸經驗）的共通點，因此也應納入吳濁流大陸經驗的討論中。

本章筆者欲補足前行研究（將戰後初期作品及回憶錄集中放置在「二二八事件」脈絡下探討）缺乏的部份，重新探討大陸經驗內容再次出現於戰後作品中的含義，共分為三節。第一節將延續第三章內容，分析吳濁流於《南京雜感》與《胡志明》中出現的大陸觀感如何延續於戰後初期的作品中，討論文本為 1948 年出版的小說《波茨坦科長》。被歸類為戰後初期的作品《波茨坦科長》除了紀錄寫作當時的社會狀況外，也顯現著吳濁流對大陸的觀感，印證了吳濁流於大陸經驗中對大陸所產生的想法。因此筆者試圖結合第三章內容，觀看吳濁流戰前至戰後的思想連結。第二節同樣延續第三章內容，將透過回憶錄《無花果》與《台灣連翹》中「大陸經驗」的相關內容，加入第三章分析之《南京雜感》及《胡志明》的相關內容對照，分析戰後與戰前相同內容中所呈現的敘述差異。而後將透過整理其共通點，探討戰後回憶錄再現大陸經驗的含意。第三節將總結以上內容。

第一節、《波茨坦科長》中的大陸觀感

吳濁流以戰後初期（1945-1949）的台灣社會為背景的作品，因為寫作時間正逢 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與寫作內容涉及國民政府的特點，因此時常被放置在「戰後初期」的脈絡下討論。然而這類作品雖然寫作背景不涉及戰前的台灣，但卻具備著延續戰前大陸觀感的內容，例如中篇小說《波茨坦科長》。《波茨坦科長》（原題：《ポツダム科長》）寫於 1947 年 10 月，是一篇以日文寫作的中篇小說，1948 年 5 月由台北學友書局發行日文單行本²⁰²，中譯版則收錄在《吳濁流選集》（1966 年廣鴻文出版社發行）、《吳濁流作品集(3)波茨坦科長》（張良澤編，1977 年遠景出版社發行）與《吳濁流集》（彭瑞金編，1991 年前衛出版社發行）等書中。而對照原文《ポツダム科長》後得知，中譯版《波茨坦科長》並未存在刪除原文內容或誤譯的情形²⁰³。閱讀後發現，《波茨坦科長》中涉及大陸的描述與《南京雜感》、《胡志明》的內容相似性極高，其所呈現的大陸觀感可說是延續戰前作品而來。以下將針對小說內容進行比對分析。

²⁰² 以上出版資料出於：洪米貞整理，〈吳濁流生平寫作年表〉，收於彭瑞金編，《吳濁流集》（台北市：前衛出版社 1991 年 7 月初版），頁 291；〈吳濁流年譜〉，收於吳濁流，《吳濁流作品集(6)台灣文藝與我》（台北市：遠行出版社，1977 年 9 月初版），頁 213；呂新昌，《鐵血詩人吳濁流：吳濁流的奮鬥人生》（台北市：臺灣文藝出版、聯臺文物發行，1984 年初版），頁 202、209；吳濁流，《夜明け前の台湾——植民地からの告発》（東京都：社會思想社，1972 年 6 月 15 日），頁 288、320；吳濁流，《泥濘に生きる——苦悩する台湾の民》（東京都：社會思想社，1972 年 11 月 30 日），頁 270。

²⁰³ 因此本章將以中譯版作為分析對象。中譯版：〈波茨坦科長〉，收於彭瑞金編，《吳濁流集》（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1 年 7 月初版），頁 133-203；原文可參考：吳濁流，〈ポツダム科長〉，收於河原功主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集成 30：吳濁流作品集》（東京都：綠蔭書房，2007 年 6 月），頁 417-483。此版本附有 1948 年 5 月 31 日由台北市學友書局發行時的版權頁及封面，應為原文複製版。

小說《波茨坦科長》以 1945 年 7 月 26 日發表的「波茨坦宣言」作為小說分界，敘述戰後初期「台灣人」（女主角玉蘭）與「外省人」（男主角范漢智）的戀愛故事。故事以 1945 年日本宣布戰敗作為開端，男主角范漢智原本在大陸從事特工工作（為日本政府提供地下情報），日本宣告戰敗後，范漢智為避免受到政治牽連選擇加入「接收台灣」的工作，順利來到台灣。來台後改名「范新生」，擔任某局的會計科長²⁰⁴，並因為「科長」的頭銜順利地接收了日產房子。女主角玉蘭代表著經歷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人，對即將接收台灣的「祖國」抱有期待與想像。玉蘭與范漢智的相遇，就像台灣人對中國人抱有的憧憬般，充滿了愛慕，然而經歷實際生活後，雙方價值觀明顯出現了格格不入的狀態。兩人的狀態與《胡志明》中胡志明與淑春的狀態如出一轍。筆者認為《波茨坦科長》中對玉蘭與范漢智的角色塑造以及胡志明與淑春的角色塑造，相似度相當高，也就是呈現了「范漢智對照淑春、玉蘭對照胡志明」的人物形象，婚後生活的描寫也呈現著雷同的特徵。

《胡志明》中胡志明剛到大陸時對大陸女性的憧憬，與《波茨坦科長》中玉蘭一開始對大陸來台的男性的憧憬是相同的，兩人都在初次見到大陸人時，讚賞他們親切的說話方式，而對於台灣女性／男性則下了「粗野」的負面評判：

青年紳士非常親切。沒有臺灣青年那樣粗野的地方。對於清晰流利的國語，和教養好而有禮貌的風度，玉蘭不知不覺心中有點兒亂了。二人這一談不覺就已過了半個鐘頭，而玉蘭也開始感到大陸的人的魅力。²⁰⁵

尤其是對女性的親切口吻，粗線條的臺灣青年哪裡比得上，所以使她有可親可靠的感覺。²⁰⁶

玉蘭覺得大陸男性非常有魅力，不知不覺就被吸引，並認為范漢智的說話方式與風度是粗野的台灣男性比不上的。而《胡志明》中也出現相似的描寫，胡志明對於帶有「新時代女學生」樣貌的上海女性充滿憧憬，並且認為她們具備顯現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徵：

他在租界搭上巴士。巴士的上層沒有什麼乘客，只有三位女學生。每一個女學生手上都拿著有著漂亮封面的外國雜誌或書。……優美的上海鞋、襪、包包，從上衣到褲子色調的統一，連配色都精心考量。由於受所謂的

²⁰⁴ 原文以「〇〇局の會計科長」表示，並未寫出名稱，因此譯為「某局」。吳濁流，《ポツダム科長》（台北市：學友書局，1948年5月31日），頁10。

²⁰⁵ 〈波茨坦科長〉，收於彭瑞金編，《吳濁流集》（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1年7月初版），頁142。底線為筆者所加。

²⁰⁶ 同上註，頁145。底線為筆者所加。

儒教中庸之道的影響，她們並不趨向極端而囫圇吞棗地吸收歐美的文化，而仍能看到她們保留著自身的傳統下所顯現的中國女性的理性。……中國文學的詩味可由女性表現出來，更能隱約顯露儒家薰陶的過去的歷史，無論何者感覺都能使古典的幽雅活用於近代文明。²⁰⁷

此段描述顯現了胡志明對於具有儒家傳統氣息的大陸女性的憧憬，並給予大陸女性正面的評價。與玉蘭相同的是，胡志明在接觸大陸女性後心中也出現了與台灣女性的比較，同樣以粗野來形容台灣女性，呈現對大陸的憧憬：

他（按：胡志明）雖然很努力地想聽聽她們的談話，但是她們誰也沒有說話。只有偶爾聽見一些語調極緩的詞彙，胡志明雖然很細心地去聽，卻依然聽不出所說的是什麼。這情形與粗野的台灣女性相比，上海女性帶有完全相反的優雅味道。²⁰⁸

同樣的描述也出現在《南京雜感》中，對於在南京接觸到的女學生也是一樣的描述：「臺灣的女人，聲音高而饒舌，三個人聚在一起，就吵得不得了。但是，南京的女學生溫柔而不愛多辯」²⁰⁹，相較於台灣女性吵鬧的說話方式，溫柔的大陸女性則完全不同。綜合以上描述，可見胡志明在上海與南京所見到的女學生都符合他心中的傳統女性的形象，透過對大陸女性的描寫印證了胡志明對中國傳統是十分憧憬的。

玉蘭將外省男性與台灣男性比較，如同胡志明將大陸（上海、南京）女性與台灣女性的比較，兩人對於所接觸的大陸男性／女性感到非常有魅力，深深為其所吸引，對於大陸男性／女性輕柔的說話方式，台灣男性／女性則顯得粗野。呈現了接觸因殖民政策分隔已久的大陸人的台灣人心中的憧憬與期待。《波茨坦科長》中直接點出這樣的感情同時也是受到歷史、政權轉換等因素影響，正如同台灣人對「祖國」的感情一樣，由於根基於久別的憧憬，強化了台灣人對大陸人的愛情：

²⁰⁷ 原文：「彼は租界でバスに乗った。バスの二階は客が空いて女学生が三人腰かけてゐた。どれも表紙の美しい外国雑誌や本を手にしてゐた。……優美な上海靴、靴下、ハンドバック、上衣から下衣まで自分の趣味に統一されて色合まで吟味されてゐた。所謂、儒教で云ふ中庸のよさで、極端に走らず歐米の文化を鵜呑みに取入れるのではなくて、自分の傳統を生かしてゐる所に中國女性の理性がありありと見られるのであった。……中国文学の詩味が女性に表象されて、更に儒教で教養された過去の歴史をどことなくほのめかしてゐる。どれも古典的な幽雅を近代文明に生かしてゐるやうに感ずるのであった」。吳濁流，《胡志明(第三篇)》（台北市：國華書局，1946年11月20日），頁5。

²⁰⁸ 原文：「彼はじつと彼女達の会話を聞かうと努めたが、誰もお饒舌しようとするものがなかった。時たま話し声が聞えるがそれも極く緩い調子で言葉こそ分らないが、慎しまやかに聞えるのであった。凡そがさつな台湾女性とは違って洗煉された味であった」。同上註。底線為筆者所加。

²⁰⁹ 吳濁流，《南京雜感》中譯本，頁79。底線為筆者所加。

玉蘭很高興地歡迎他（按：范漢智），因對祖國憧憬的情緒無意識中搖撼著她，由心中發生好感，這就是她心中深處發生的無聲息的思慕的情緒凝結的一個形態，是一種使她不能了解的……而且茫然的一種情愫。²¹⁰

相同的寫法在戰前寫作的《胡志明》中就已出現，胡志明對大陸女性的感情一樣來自對中國的憧憬，也就是說，《波茨坦科長》的描寫與戰前作品《胡志明》的描寫雷同這點，說明《波茨坦科長》中的想法是吳濁流戰前大陸經驗時就擁有的體悟。

相似的情節也出現在玉蘭與范漢智的婚後生活中。《胡志明》中胡志明與淑春兩人從戀愛的甜蜜到婚姻生活的摩擦，呈現強烈的對比。婚後生活不如戀愛般美好，實際相處後價值觀及生活方式的差異使兩人產生摩擦。《波茨坦科長》中玉蘭（代表台灣人）與范漢智（代表大陸人）的狀況也與胡志明（代表台灣人）與淑春（代表大陸人）的狀況一致。《波茨坦科長》主要以玉蘭的角度敘述兩人從戀愛、結婚到婚後生活的相處過程，玉蘭與范漢智除了生活模式的差異外，興趣與人生觀也都相異。范漢智到台灣後，趁戰後初期社會混亂之際，拼命接收日產，有機會時就買取大量且重複的東西，想以變賣大賺一筆。見到這樣情形的玉蘭認為丈夫是個完全以利益為考量的商人，而不是初見面時的紳士，感到非常討厭：

丈夫為什麼白要人家的東西呢？這樣想著她對丈夫的無恥覺得很討厭。²¹¹

范漢智一看見賤賣的就盡量買，同樣的東西買了兩三件的也有。她（按：玉蘭）想不論怎麼樣喜歡的東西也不必買這樣多。可是范漢智則有范漢智的意見，他知道貨幣貶值是必然的，需快把現金換為物資，完全露出商人利慾昏心的劣根性，所以她覺得非常厭惡。天天在這樣的地方漁獵賤賣品的丈夫不論怎麼看也不像是紳士。只知追求物慾，真是卑鄙。²¹²

范漢智的商人嘴臉讓玉蘭想起以前出遊的經歷，體會到兩人相異的人生觀：

忽然憶起以前一個皎潔月光照耀大地，在家中呆不下去的晚上。她（按：玉蘭）主動邀范漢智同遊川端（按：「川端」為延續戰前的日式地名，又稱「川端町」，為現今台北市中正區附近，瀕臨新店溪），堤下新店溪靜靜地留著，在青色的月光下，前面的群山在夜晚的寂靜中朦朧可見。她被清涼

²¹⁰ 〈波茨坦科長〉，收於彭瑞金編，《吳濁流集》，頁 144。

²¹¹ 同上註，頁 175。

²¹² 同上註，頁 177。

的晚風吹著烘熱的面頰，想繼續這樣散步下去，但是范則對此一點興趣也沒有，口口聲聲說這樣太寂寞，一刻也不願多呆下去，她沒有辦法，只好一同回家。范反而對鬧區的西門市場，或榮町非常喜歡，每天百跑不厭。…丈夫的興趣是和商業有關聯的，和她追求理想的人生觀完全是兩樣的。²¹³

范則睡著的時候也想錢，醒來也想錢，有一種超過需要的愛錢的癖性。在她看起來甚至於想到他是為著錢而生下來的。陶醉於婚約或新婚的時期還不怎麼覺得這樣。等到陶醉緊張的心情鬆弛下來就覺得市儈俗氣，完全沒有紳士的風度，甚至於覺得是卑鄙齷齪。…她寧願坐在家裏安靜地插插花，或聽聽高尚的唱片，或者和丈夫一起在幽靜的地方散散步，可是范先生對這總提不起興趣，雖然唱片響出高尚的音樂，但范不解美妙，散步也同樣不堪幽靜的寂寞，他還是他，喜歡鑼鼓喧天聲音嘈雜的地方。²¹⁴

以上內容皆顯現兩人生活方式、興趣與人生觀的相異。范漢智以商業為生活重心，玉蘭則在追求心中的理想人生。玉蘭渴望與丈夫享受恬靜的生活，但范漢智為了賺錢於是每天穿梭在喧鬧的市集裡採買，無暇顧及妻子。玉蘭與范漢智如此的生活狀態，與《胡志明》中胡志明與淑春的情形如出一轍。胡志明與淑春於戀愛時也是盡顯甜蜜，然而進入實際的婚姻生活後，胡志明無法適應淑春所追求的「新女性」的生活方式（婚後淑春仍舊天天到舞廳跳舞，且不避諱已婚身份，享受眾多男士的圍繞），由婚後生活的描述中，可見淑春家庭觀念的薄弱。當胡志明要求淑春婚後能以家庭為重，當家庭主婦以料理家務為主，而淑春則主張到外謀職，不願被困在家中。淑春說道：

「你的頭腦怎麼像老頭兒一樣的封建呢？想把我當作繫在家庭的玩具那樣、像阿媽那樣嗎。但是我並不願意因為結婚而捨棄自由。結婚並不是什麼契約，男人將妻子當作長期契約的娼婦那樣的想，我實在是不能理解。」對於妻的如此直接露骨的表達，他（按：胡志明）感到寂寞的同時，不滿的感覺也湧上心頭。²¹⁵

淑春抱持的自由的新女性觀與胡志明保守的傳統觀念相悖。胡志明希望淑春以家庭為重，在家相夫教子。但淑春想自由自在地過生活，並按照婚前的生活方式繼續工作、打牌與跳舞。在生活方式與家庭觀念完全相異的情形下，兩人不斷產生

²¹³ 同上註，頁 177-178。底線為筆者所加。

²¹⁴ 同上註，頁 187。底線為筆者所加。

²¹⁵ 原文：「『あなたは封建的なお爺さんですわ。私を家庭に繋いで玩具のやうに、阿媽のやうに扱ひたいのでせう。でも私結婚のために自由を捨て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わ。結婚は契約と違ふんですもの。男は妻を長期契約の娼婦と思つてゐるのでせうが、私には分からないわ。』妻の露骨な云ひ表はしに対して、彼は云ひ知れぬ淋しさと、不満を感ずるのであつた」。吳濁流，《胡志明（第三篇）》，頁 36。

摩擦。如此差異逐漸加深胡志明對淑春的失望之情，如同淑春對范漢智的失望之情一樣。

小說描述玉蘭與胡志明在婚後對丈夫與妻子感到失望的內容後，皆有憶起婚前的愛慕對象的情節，此情節的設定同樣如出一轍。除了兩人愛慕對象都是日本人這點外，小說中皆指出兩人與愛慕的日本男性／女性皆因為「民族」差異的阻礙而未能開花結果，戀情無疾而終。玉蘭在婚後對范漢智大失所望，並憶起曾經愛慕的日本醫師：

她在做護士的時候，曾經有日本醫師向她求婚。他很愛她，她也不是對他沒有意，…但是不曉得怎麼她的愛情被自己潛意識的某一種東西阻礙著沒有發展。現在想起來那個男人較現在的丈夫絕對不會差，也許還優秀得多。然而……。到這兒，為什麼自己會思慕現在的丈夫，她真是百思不解。她忽然想起光復當時的心情，祖國！唉。那是較自己父母還更親的話。她想出了是那個感情凝結起來成為對丈夫的憧憬的。²¹⁶

而胡志明對淑春的生活方式感到不滿的同時，也憶起日本留學時代時租賃房屋的房東的女兒鶴子：

她（按：淑春）並不是受丈夫意志而轉變的單純女子。想著這裡他（按：胡志明）不禁嘆了口氣。…志明覺得是自己的愚昧。相信她愛慕她的時候與她做了約定，他對於必須一生遵守這樣的約定的自己感到非常悲哀。…他忽然憶起日本留學時代的事情，鶴子賢淑的姿態忽然浮現在眼前。²¹⁷

胡志明在前往大陸前，曾有過一段與日本女性的戀情。胡志明在台灣擔任國民學校教職時結識了日本女同事久子，對她產生了愛慕之情，胡志明告白後仍因無法跨越的「民族」問題而遭到拒絕：

「久子小姐……。妳對我的事情，是怎麼想的呢？」

「怎麼想的？沒有什麼特別的……但是你的想法我可以瞭解！但是……你是本島人啊……。」久子低著頭閃爍地回答。²¹⁸

²¹⁶ 〈波茨坦科長〉，收於彭瑞金編，《吳濁流集》，頁 186。底線為筆者所加。

²¹⁷ 原文：「彼女は夫の意志で動せる単純な女ではない。斯う思ふと彼は思はず溜息を吐いた。…殊に自分は馬鹿だった。彼女を信じ彼女を恋慕してゐる間に何でも約束してしまった。その約束を一生守らなければならぬ彼は自分乍ら哀れに思ふのだった。…さう思ふと彼は日本留学時代のことが思ひ出されて鶴子の淑やかな姿が懐しく目の前に浮ぶのだった」。吳濁流，《胡志明（第三篇）》，頁 58-59。此段中譯本有所改寫，回憶鶴子的內容只存在原文中。

²¹⁸ 原文：「『久子さん……。あなた、僕のこと。どう思ひます？』『どうって？別にどうも……でもあなたの心持は私何だか分かる気がしますの！でも……貴男は本島の方でせう？……。』と語尾を掠めて差しうつむいてしまった」。吳濁流，《胡志明（第一篇）》（台北市：國

久子所說的「你是本島人」及敘述玉蘭的「她的愛情被自己潛意識的某一種東西阻礙著沒有發展」兩段描述，顯示胡志明與久子如同玉蘭與日本醫生一樣，均因受到「民族」差異的阻礙，無法發展戀情，並在之後選擇了視為同民族的范漢智與淑春做為結婚對象。胡志明與玉蘭回憶日本人的內容中，皆呈現「懷念昔日的日本人，後悔選擇大陸人結婚」的想法，帶有「中日比較」的意味。身為受過殖民地日式教育的台灣人玉蘭與胡志明，實際生活中發現了雙方的興趣、人生觀甚至是生活方式都截然不同，讓胡志明對淑春、玉蘭對范漢智大失所望（正如同台灣人實際接觸大陸／大陸人時的幻滅感受一樣）。可見同樣的描述於戰前作品中就已出現，戰前到戰後對大陸的觀感也是一脈相承。

另一方面，小說中的范漢智與淑春還有一個共通點，即他們的興趣皆包含打牌、吃飯與看戲三項娛樂。同樣的內容最早曾在《南京雜感》中以「三大娛樂」的稱呼出現，可見此內容是依吳濁流實際大陸經驗所見而來。刊登在 1943 年 1 月《臺灣藝術》上的〈南京雜感〉第四部份「在章公館的閑遊」中，有著吳濁流在友人章君的帶領下前往大陸的餐館、戲院等場所的記載，其中說道：

麻將（打牌）、會餐（吃飯）、芝居（看戲）這三大娛樂是在中國各階層相通並且最被喜好的事。……他們把打牌、吃飯、看戲三者並稱，在日常生活上占著特別重要的地位。有身份地位的人，每晚都有所謂會客的宴會。更不用說是青年男女，不做飯而到外面的餐館聚餐並不是稀少的事。²¹⁹

《胡志明》與《波茨坦科長》中淑春與范漢智的興趣都包含這「三大娛樂」：

她（按：淑春）的生活一天天地轉變了，即使是星期日，已不再對郊外的自然景物發生興趣，她的興趣竟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有時胡志明和她談談西廂記的佳句或紅樓夢的詩詞，她也不再像以前那樣感到興趣，她的興趣已轉移到跳舞、打牌和看戲上去了。²²⁰

華書局，1946 年 9 月 3 日），頁 73。

²¹⁹ 原文：「麻雀（打牌）會食（吃飯）芝居（看戲）此の三大娛樂は中國社會各層を通じて最も喜ばれるものである。……彼等は打牌、吃飯、看戲の三者を並び稱し日常生活上、特に主要な地位を占めてゐる。えらい人每晚、会客と云つて宴會がある。若い男女は勿論、ご飯をたかずに料理屋で会食することは珍しありません」。吳濁流，〈南京雜感（四）章公館に於ける閑遊〉，《臺灣藝術》第四卷第一號（昭和 18 年／1943 年 1 月 1 日發行），頁 34。底線為筆者所加。

²²⁰ 原文：「彼女の生活が日々に変つて行つた。日曜であつても、自然の風景に憧れて外へ清遊する高尚な趣味と全く異つた方向へ馳せてしまつた。ときたま西廂記の麗句や、紅樓夢の詩を話題にとり出しても、彼女にはもう以前のやうな興味を感じないやうになつた。彼女の趣味は、ダンスや麻雀や芝居に変つてしまつた」。吳濁流，《胡志明（第三篇）》，頁 36。底線為筆者所加。

尤其范的趣味不外是打牌、吃館子、看戲等一類，都是滿足低俗的感覺的。

221

一段街上路人揶揄欲與外省人結婚的台灣女性的對話，也提及了三大娛樂：

「如果要錢最好做姨太太，睡著打鼾，喫飽了打鼾，打牌，吃飯，看戲，
很好，很好。」²²²

透過上述內容的整理，筆者認為《波茨坦科長》中對范漢智的描寫幾乎複製了《胡志明》中對淑春的描寫，而吳濁流對大陸的觀感也呈現在小說中對范漢智的觀感上。這情形同時反映著玉蘭對范漢智的愛慕之情，是根基於台灣人對「祖國」的感情的投射。上述文本的比較顯示著這樣的感受在吳濁流的戰前作品中就已出現，且大陸觀感是由戰前延續至戰後的。戰後作品與戰前作品內容的一致性，也說明了吳濁流的大陸觀感是依戰前實際的大陸經驗而來，並非戰後初期才形成。

以上筆者所述「范漢智對照淑春、玉蘭對照胡志明」的模式中，進一步可思考的是兩部小說中「性別」置換的含意。在男女主角的相處情節中，戰前作品《胡志明》採用胡志明的角度來敘述淑春，而戰後作品《波茨坦科長》則是以玉蘭的角度來描寫范漢智，皆呈現以台灣人的視角敘述大陸人的模式，未出現以大陸人的角度觀看台灣人的描寫。此情形可說明兩部小說皆是以台灣人的角度出發寫作。然而角色方面，戰前戰後的作品卻是以不同性別來代表台灣人，這樣的安排究竟為何？透過小說中男性與女性角色的安排，呈現的是角色塑造與政權的關係，即小說中的男性角色通常代表著居於上位的領導的一方（執政者；支配者），而女性角色則是屬於被領導的一方（被統治者；被支配者）。也就是說，戰前作品《胡志明》中的男性角色胡志明代表著統治者（台灣正逢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代表著與統治者日本一樣的地位），女性角色淑春則代表同屬日本政府執政下的大陸。然而 1945 年政權轉換後，戰後作品《波茨坦科長》的男性角色便置換成代表大陸的范漢智，女性則是置換為代表被統治者的台灣人玉蘭。由此可看出角色性別的安排與權力關係相符，此點也加強筆者所述之兩部小說可相互連結的想法。

即便如此，在小說中代表著領導一方的男性角色，在小說中反而呈現受到女性支配或是遭逮捕的悲哀結局。胡志明的愛情、婚姻與生活時時受到妻子淑春的影響，雖然身為男性但胡志明完全無法干涉妻子的行為，反而還成為被支配的一方。而後胡志明甚至被認為是間諜而遭到逮捕，最終狼狽不堪的逃回台灣。而范

²²¹ 〈波茨坦科長〉，收於彭瑞金編，《吳濁流集》，頁 187。底線為筆者所加。

²²² 同上註，頁 183。底線為筆者所加。

漢智則因為在大陸時汙蔑他人的不法行為，最終難逃被捕的命運。雖然在小說中胡志明與范漢智代表著擁有權力的男性角色，但都經歷遭到逮捕的狼狽下場。如此的描寫著實帶有諷刺意味。

而在角色的塑造方面同樣帶有諷刺意味。首先是主角的姓名。《波茨坦科長》一開始雖曾提到范漢智到台灣後改名為「范新生」（「重獲新生」之意）一事，不過整篇小說從頭到尾仍舊以「范漢智」之名敘述，未再提及「新生」一名。「范漢智」之名應該有所含意。前行研究中亦強調了「漢智」兩字的意義，宋冬陽指出：「范漢智者，『販漢智』也；把漢人的全部聰明才智，都販賣給種種齷齪的勾當」²²³。褚昱志以「這位具有漢奸智慧的漢智兄」²²⁴，諷刺范漢智帶有「漢奸」的智慧。而「范漢智」的日語發音（はん・かん・ち）也與「漢奸」的台語發音（han-kan）是諧音的關係。此外，小說開頭范漢智在大陸的情節以及小說結尾范漢智遭逮捕後的內容，皆有影射其「漢奸」身份的內容。《波茨坦科長》敘述范漢智來台灣從事接收工作之前，在大陸從事的是提供日本政府地下情報的特工，透過「對於在偽政府（按：汪精衛政府）當過差使的范漢智，『重慶』這兩字聽起來總有點刺耳似的」²²⁵的描述可得知范漢智的特工工作與汪精衛政府相關（此工作因協助戰爭時期日方扶持成立的汪精衛政府，因此戰後來台的國民政府將從事這類情報工作者稱作「漢奸」）。范漢智在遭到逮捕前，小說如此敘述：「接收工作告一段落後，不知道由什麼地方傳說有很多漢奸潛入了臺灣」²²⁶。小說結尾敘述范漢智被捕後寫道：

秘書笑嘻嘻的走了前來：「恭喜，恭喜。」對隊長逮捕范漢智歸案道喜，笑嘻嘻的樣子不論怎麼看跟范漢智完全一樣。忽而看見辦公室裏的全部職員不要說，甚至連工友也同樣笑嘻嘻。不論那（按：哪）一個人的臉都跟過去所檢舉的漢奸或污吏的臉相像，真使人厭惡。搜查隊長竟發生「四萬萬五千萬，怎麼會有這麼多漢奸和貪官污吏呢？」的錯覺。²²⁷

姓名以及在大陸從事的情報工作等內容，皆影射范漢智是具備「『漢』奸『智』慧」的「漢奸」。小說最後逮捕范漢智的隊長亦是由大陸來台的官員，如同隊長所言「跟范漢智完全一樣」，諷刺的是同樣由大陸來台的官員們，所作所為也與貪心的范漢智不相上下。也就是說，小說結尾所言的「四萬萬五千萬」的漢奸與

²²³ 宋冬陽，〈朝向許願中的黎明——試論吳濁流作品中的「中國經驗」〉《文學界》第10期（1984年5月），頁142。

²²⁴ 褚昱志，《吳濁流及其小說之研究》（台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5月），頁80。

²²⁵ 〈波茨坦科長〉，收於彭瑞金編，《吳濁流集》，頁150-151。底線為筆者所加。關於「重慶」國民政府與汪精衛政府等內容，筆者已於第三章爬梳。相關內容請參考本論文第三章第一節〈《南京雜感》的發表情形與刪略特點〉。

²²⁶ 〈波茨坦科長〉，收於彭瑞金編，《吳濁流集》，頁201。底線為筆者所加。

²²⁷ 同上註，頁203。

貪官污吏指的正是戰後初期來台的國民政府官員，顯示范漢智的行為並非特例，許多官員亦是如此。此段話是對接收台灣的國民政府的強力批判。

回顧《波茨坦科長》的前行研究，確實也都將范漢智的角色塑造解讀為反映戰後初期來台的國民政府官員。例如褚昱志在其碩士論文《吳濁流及其小說之研究》中，針對吳濁流作品中的社會環境、人物類型與寫作手法等面向都有詳細地分析。其中敘述到《波茨坦科長》時，褚昱志將范漢智這一角色放置在「國府治下的人物類型」一類中。褚昱志指出：

范漢智是中日戰爭下一個被極具扭曲的人性之典型。…並未珍惜在臺灣所獲得新生機會的范漢智，在高喊出「金錢之前是沒有道德的」名言之後，利用光復初新舊政權交替之際，一切建制皆未能上軌道的機會，繼續從事他的污穢勾當，而舉凡非法地接收日產房子、運用漁船走私砂糖、利用國內通貨膨脹之際大搞貪污並教唆本省商人錢大鼻盜採山林，凡是他所能想到的為惡之道，他都不吝於一試。…范漢智可以說是光復初大陸來臺接收官員為惡的典型。²²⁸

盧欣怡在其碩士論文《吳濁流小說中的臺灣社會》中，將《波茨坦科長》放置在呈現戰後初期的台灣社會的作品群中：

吳濁流於一九四七年完成《波茨坦科長》，正式臺灣人民從祖國夢中逐漸甦醒的年代。…《波茨坦科長》主要描述主角范漢智在日本佔領下的中國任督察特工協助日本人工作，日本投降後怕被舉為漢奸進而捲款潛逃至臺灣，搖身一變成為接收大員，趁著光復初期的混亂大發光復財，強奪日產中飽私囊。²²⁹

以上前行研究皆對范漢智強奪日產等違法行為提出撻伐。范漢智一連串的所作所為，正符合戰後初期抱持金錢至上觀念的外省人類型。其實早在吳濁流戰前作品《南京雜感》中，就已出現大陸「金錢萬能」及「機會主義」的相關描寫：

中國的某詩人感嘆說：「生而為人是不幸的開始，更不幸的是身為中國人。但是，有錢便是世界上最能自由且縱情的國度，這就是中國的現實」。²³⁰

²²⁸ 褚昱志，《吳濁流及其小說之研究》（台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5月），頁140-141。

²²⁹ 〈第四章 作品中光復後的臺灣社會〉，盧欣怡，《吳濁流小說中的臺灣社會》（台北市：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北市：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7月），頁80-81。

²³⁰ 原文：「中國の某詩人が『人間と生れることが抑々不幸の始まりで更に不幸なのは中國人と生れることである。しかし金さへあれば世界中で一番自由と我儘の出来る国、これが中國の現實である。』と嘆いてゐる」。吳濁流，〈南京雜感（四）章公館に於ける閑遊〉，《臺灣藝術》

中國人往往要一杯茶，鄭重其事地啜飲著，以那一杯茶，在茶館裏渡過半日。看來頗為閒逸，其實並非來玩，是想求得什麼。這一批人，並不是看中了一個目的物而在做著內面的工作，只是漫然地想抓住某種機會而已。全憑命運，等待機會的來臨的悠閒，恐怕非中國人不能做到的。²³¹

所謂機會性，是有了機會，便可輕而易舉地一躍而成百萬富翁或大臣。…現在依然如此。在上海隨處可見的青白面孔的智識份子，一抓到了機會，便一躍而為百萬富翁，也做得成大臣。²³²

而對照《波茨坦科長》來看，小說一開始敘述范漢智在大陸（為日方）擔任特工工作，由於日本宣佈戰敗，怕被冠上「漢奸」罪名的范漢智打算捲款潛逃。當時的一段談話顯現著范漢智十分看重金錢及機會的觀念：

「處長，還在那裏長短歎幹嘛？沒什麼好想的。最要緊的是錢，把公款和盈利拿來大家瓜分，然後腳板擦油算了。」

「處長這樣軟心腸，不能當機立斷，那就只有死路一條，中央已經來了，失去這個機會…」²³³

而後范漢智與玉蘭相遇，在敘述逐漸萌芽的戀情時，小說中如此寫道：

尤其在大陸，金錢真是萬能，甚至戀愛亦不過是金錢的代償物而已。²³⁴

由以上內容可知，范漢智是金錢至上的「機會主義者」。對范漢智來說，到台灣從事接收工作就是一個「機會」。范漢智接收日產、利用通貨膨脹之際變賣商品、走私與教唆本省商人盜採山林等違法行為的內容，亦是延續了戰前大陸經驗中「金錢萬能」的「機會主義者」的描寫而來，也是建立在吳濁流實際大陸經驗的感受之上。《波茨坦科長》與《南京雜感》的內容均表達了大陸社會中重視「金錢」及「機會」的想法，從內容來看可見兩文本之連結，也說明《波茨坦科長》中對范漢智的描寫並非吳濁流於戰後初期才出現的發想，而是早在戰前大陸經驗時就有的體悟。

在描述戰後初期存在的操弄金錢獲利等亂象後，部份前行研究會帶出「二二八事件」一同討論。邱麗敏在其碩士論文《二二八文學研究——戰前出生之台籍

第四卷第一號（昭和 18 年／1943 年 1 月 1 日發行），頁 34。底線為筆者所加。

²³¹ 吳濁流，《南京雜感》中譯本，頁 71。底線為筆者所加。

²³² 同上註，頁 115。底線為筆者所加。

²³³ 〈波茨坦科長〉，收於彭瑞金編，《吳濁流集》，頁 135。底線為筆者所加。

²³⁴ 同上註，頁 153。底線為筆者所加。

作家對「二二八」的書寫初探》中以吳濁流、蘇新、吳新榮與李喬等戰前出生的作家維分析對象，針對他們涉及二二八事件的作品進行分析。其中在敘述《波茨坦科長》時，邱麗敏如此說道：

吳濁流本來有極強烈的「祖國意識」，但臺灣光復後，眼看國民政府是如此腐敗，尤其二二八之後，使吳濁流徹底失望，於是接連寫下批判中國政府的短篇鉅著，《波茨坦科長》則是其中之一，可算中篇小說。本文對於臺灣光復初期的種種現象，描述甚詳。²³⁵

瀧川勉在〈殖民地統治下の台湾民衆の諸相〉一文中亦有相似的解析：

〈波茨坦科長〉寫作時正臨 1947 年 2 月「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此事件為當時受國民黨政權的腐敗、貪污政治等情形造成的台灣民衆的失望與憤怒下而引發的暴動。台灣民衆對祖國的期待越大，所產生的失望也就越大，此作品中透過玉蘭的感情巧妙地描繪了出來。²³⁶

將玉蘭與范漢智的相遇引申為反映戰後初期社會台灣人與外省人的相遇，也就是台灣人對來台接收的國民黨政府的感情。這些前行研究清一色將焦點放置在文本中所述的「戰後初期來台的國民政府的腐敗」內容，均未涉及吳濁流戰前的大陸經驗，也就是未觸及戰前作品到戰後作品的「延續性」。因前行研究通常將「戰前」與「戰後初期」切割成兩個區塊來觀看，因此忽略了吳濁流戰前的實際大陸生活中的大陸觀感，形成戰後初期作品的研究漏洞。

上述內容清楚顯示了戰後初期作品與戰前作品的連結之處。因為擁有實際的大陸經驗，吳濁流對大陸的看法在戰前就已形成，對大陸的觀感也不是戰後初期接觸來台的國民政府後才出現，因此，戰後作品中出現的大陸相關內容，亦不應只限於前行研究中對戰後初期的討論而已，此點由吳濁流將戰前的大陸觀感延續至戰後作品的情形就可說明，這也是筆者將戰前大陸經驗與戰後初期作品一同分析的主要原因。

²³⁵ 邱麗敏，〈二二八文學研究——戰前出生之台籍作家對「二二八」的書寫初探〉（新竹：國立新竹師範學院進修暨推廣部教師在職進修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語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03 年 6 月），頁 78。

²³⁶ 原文：「この『ポツダム科長』の書かれた一九四七年の二月には、台湾で二・二八事件が発生している。この事件は、当時の国民党政権腐敗、汚職政治にたいする台湾民衆の失望と怒りの発した暴動であるが、こうした台湾民衆の祖国への期待の大ききさ、それだけにまた失望の度がど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ったかが、この作品のなかで玉蘭の感情を通して巧みに描き出されている」。瀧川勉，〈植民地統治下の台湾民衆の諸相〉，收於吳濁流，《泥濘に生きる——苦悩する台湾の民〉（東京都：社會思想社，1972 年 11 月 30 日），頁 272。

第二節、回憶錄之再現與含意：《無花果》與《台灣連翹》

吳濁流的兩部回憶錄《無花果》與《台灣連翹》，均涉及吳濁流童年時期至戰後初期的生命經驗，是理解吳濁流生平與思想的重要參考資料。兩部作品寫作時間相近，但使用的語言不同。《無花果》於 1967 年完成，以中文寫作，1968 年發表於吳濁流主辦的《臺灣文藝》雜誌第 19 期至第 21 期上，1970 年 10 月由林白出版社出版為單行本²³⁷。《台灣連翹》則是於 1971 年 9 月起筆，以日文寫作，1973 年吳濁流將其（第一章至第八章）自譯為中文發表於《臺灣文藝》第 39 期至第 45 期上。1974 年 12 月《台灣連翹》完稿，但第九章之後的內容（涉及戰後初期二二八事件等敏感內容）並未發表²³⁸，十二年後經由鍾肇政翻譯，發表在 1986 年創刊的《台灣新文化》上²³⁹。兩部作品同樣於 1988 年與 1995 年分別由前衛與草根出版社出版成書。

而 1977 年遠行出版社發行的一系列《吳濁流作品集》²⁴⁰中並未收錄《無花

²³⁷ 《無花果》有日文版，此日文版曾於七〇年代於日本出版，與 1947 年發表的〈夜明け前の台湾〉日文版共同收於吳濁流，《夜明け前の台湾——植民地からの告発》（東京都：社會思想社，1972 年 6 月 15 日）一書中。此書記載：「回顧二十年前時，寫了〈黎明前的台灣〉」，原文：「かえりみて二十年前に、『夜明け前の台湾』を書いた。」；「《無花果》以中文分別連載於 1968 年 4 月、7 月、10 月的《臺灣文藝》雜誌第 19、20、21 期上，之後於 1970 年 10 月由台北的林白出版社出版單行本。本書以 1969 年 4 月至 8 月號的《中國》雜誌「編輯部譯」譯載的內容作為基礎，並就部分內容適時調整譯文」，原文：「『無花果』は、雑誌『台湾文芸』の一九、二〇、二一号（一九六八年四月、七月、十月刊）に中国語で連載され、のち一九七〇年十月に台北の林白出版社から単行本として出版された、本書では、雑誌『中国』一九六九年四月～八月号に「編集部訳」として訳載されたものをもととし、これに部份的に手を加えた。」。吳濁流，《夜明け前の台湾——植民地からの告発》（東京都：社會思想社，1972 年 6 月 15 日），頁 225、320。以上內容顯示《無花果》寫於〈黎明前的台灣〉（1947 年出版）的二十年後，以及 1968 年發表於《臺灣文藝》的中文版才是吳濁流最初的寫作版本，日文版為後人所譯，因此本章分析時均使用《無花果》之中文版。吳濁流，《無花果》（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88 年 8 月）。

²³⁸ 「『台灣連翹』一至八章發表於『台灣文藝』，但殘餘部份現在不發表，待後十年或二十年，留與後人發表」。吳濁流，〈後記〉，寫於 1975 年 1 月 29 日，收於吳濁流，《台灣連翹》（台北市：草根出版社，1995 年 7 月），頁 260。另一版本：吳濁流，《台灣連翹》（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88 年 9 月 15 日初版一刷）。兩版本內容一致。本章中筆者使用草根出版社之版本。

²³⁹ 以上出版資料出於：洪米貞整理，〈吳濁流生平寫作年表〉，收於彭瑞金編，《吳濁流集》，頁 294-295；〈吳濁流年譜〉，收於吳濁流，《吳濁流作品集(6)台灣文藝與我》，頁 217-218；吳濁流，《台灣連翹》（台北市：草根出版社，1995 年 7 月），頁 259-262；《臺灣文藝》第 5 卷第 19 至 21 期、第 10 卷第 39 期至第 11 卷第 45 期（台北市：臺灣文藝雜誌社，1968 年 4 月-10 月、1973 年 4 月-1974 年 10 月）。

²⁴⁰ 《吳濁流作品集》依作品寫作時間與文類共分為六卷，分別為：卷一《亞細亞的孤兒》（吳濁流最具代表性的長篇小說）、卷二《功狗》（以日據時期的台灣社會為背景的作品）、卷三《波茨坦科長》（以光復以後的台灣社會為背景的作品）、卷四《南京雜感》（集結吳濁流遊歷的作品）、卷五《黎明前的臺灣》（以涉及台灣、中國、日本等亞洲地區的文化論為主）與卷六《臺灣文藝與我》（收錄貫穿一生的文學論及人生觀）。張良澤，〈『吳濁流作品集』總序〉，吳濁流，《吳濁流作品集(1)亞細亞的孤兒》（台北市：遠行出版社，1977 年 9 月初版），頁 29-32。

果》與《台灣連翹》，由主編張良澤的敘述可推測未出版之事應與正逢「戒嚴時期」有關：

又，我於一九六一年因鍾肇政兄之介，得入先生（按：吳濁流）之門，直至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先生逝世為止，前後十五年間，受先生栽培至多。…故遂於其周年忌時，倉皇編出『吳濁流作品集』共六卷（一九七七年臺北遠行出版社發行），致祭於墳前。但為顧及作品免於禁刊，故未敢收『無花果』於卷中。²⁴¹

上段話顯示 1977 年張良澤出版《吳濁流作品集》時，為避免作品因內容遭到查禁，因此未收錄《無花果》於作品中。此段話清楚顯示戒嚴時期（1949 年 5 月 20 日起實施戒嚴至 1987 年 7 月 15 日宣布解嚴²⁴²）台灣的出版狀況。據《中華民國大事記》記載，查禁刊物的法令為 1949 年 5 月 27 日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訂定的「台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²⁴³，戒嚴時期受此法令影響而禁止出版的書籍不在少數²⁴⁴，《無花果》與《台灣連翹》也包含在其中。1970 年 10 月林白出版社發行《無花果》後，隔年隨即遭到查禁，理由是違反〈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第三條第六款「淆亂視聽，足以影響民心士氣或危害社會治安者」，而《台灣連翹》於 1986 年發表在《台灣新文化》上後（由鍾肇政翻譯），《台灣新文化》雜誌也隨之遭到查禁，理由同樣為〈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第三條第六款「淆亂視聽，足以影響民心士氣或危害社會治安者」，與第七條「挑撥政府與人民情感」²⁴⁵。直至 1987 年解嚴後這些含有敏感內

此作品集可說完整收錄了吳濁流戰前至戰後的代表作品，獨缺《無花果》與《台灣連翹》。

²⁴¹ 張良澤，〈『無花果』解析——從『無花果』看吳濁流的台灣人意識〉，收於吳濁流，《無花果》（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88 年 8 月），頁 31。底線為筆者所加。

²⁴² 據 1949 年 5 月 20 日《臺灣新生報》一版記載，「自五月二十日零時起，宣告全省戒嚴」。又，據《總統府公報》第 4793 號記載，「總統令宣告臺灣地區自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零時起解嚴」。薛月順，曾品滄，許瑞浩主編，《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一）從戒嚴到解嚴》（台北：國史館，2000 年 12 月 25 日），頁 44-46、497。

²⁴³ 高蔭祖編，《中華民國大事記》（台北市：世界書局，1957 年 10 月 10 日），頁 596。此法令於 1970 年 4 月 23 日修訂為行政院頒布之「臺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舊法隨之廢除。薛月順，曾品滄，許瑞浩主編，《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一）從戒嚴到解嚴》，頁 225-231。第一節所述之《波茨坦科長》於 1977 年出版時也因違反此法令第三條第六款「淆亂視聽，足以影響民心士氣或危害社會治安者」而遭到查禁。相關討論可參考：褚昱志，《吳濁流及其小說之研究》（台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年 5 月），頁 186-188。

²⁴⁴ 例如三〇年代大陸左傾作家的作品、郭良蕙的《心鎖》、陳映真的《將軍族》與吳濁流的《無花果》等書禁止在台灣出版的情形。這些禁止發行的書籍除了包含中國共產黨或中國國民黨的敏感內容外，亦有包含情慾、亂倫等內容。查禁理由包含「為共匪宣傳之圖畫文字」、「妨害風化」、「淆亂視聽」等。相關內容可參考：林慶彰，〈當代文學禁書研究〉，收於封德屏主編，《50 年來台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三）台灣文學出版》（台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文訊雜誌社編印，1996 年 6 月），頁 193-216。

²⁴⁵ 林慶彰，〈當代文學禁書研究〉，收於封德屏主編，《50 年來台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三）台灣文學出版》，頁 208；許俊雅，〈小說·歷史·自傳？—談《無花果》、《台灣連翹》與禁書現象〉，收於許俊雅，《臺灣文學論：從現代到當代》（台北市：南天書局，1997 年 10 月），頁 293-297。

容的作品才陸續出版（例如解嚴後《無花果》與《台灣連翹》即順利出版），此情形說明了政策對書籍出版的影響力，而「解嚴」亦具有影響研究趨向的可能。

回顧《無花果》與《台灣連翹》的前行研究，清楚呈現了一致的研究重心，即戒嚴時期無法碰觸的「二二八事件」等相關討論。林衡哲於〈從吳濁流的文學作品看二二八事件〉一文中說道：

我想吳濁流寫出『無花果』最重要的意義，便是希望下一輩的台灣知識份子，能從『二二八事件』中獲取歷史的教訓，避免重蹈他那一代知識份子的所犯的重大錯誤——那就是對父祖之國的虛無飄渺的幻想，把對父祖之國的統治者當做來台灣的解放者與救世主，一旦父祖之國的統治者，以大軍壓境的姿態君臨台灣時，台灣人才發現他們所熱烈期待與歡迎的不是上帝的十字軍，而是比凱撒更殘暴的征服者。²⁴⁶

盧欣怡在碩士論文《吳濁流小說中的臺灣社會》中也說道：

到了一九四七年初，臺灣人民熱切迎接祖國的心情，已轉為瀕臨絕望的邊緣，而各種情況卻似乎持續惡化中，終由查緝私菸而引爆了二二八事件。吳濁流在其著作《無花果》及《台灣連翹》中都對此影響臺灣重大且深遠的事件，有詳實的描述。²⁴⁷

光復後，他（按：吳濁流）對公平正義的追求，仍不亞於日本異族殖民統治時期，從《台灣連翹》、《無花果》等作品，毫不留情的批評貪腐、投機，揭露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在在都彰顯其作品伸張公平正義的跡象。²⁴⁸

而褚昱志在其碩士論文《吳濁流及其小說之研究》中對於《台灣連翹》與《無花果》的差異，如此說道：

²⁴⁶ 林衡哲，〈從吳濁流的文學作品看二二八事件〉，收於陳芳明主編，《二二八事件學術論文集：台灣人國殤事件的歷史回顧》（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89年7月15日），頁163。邱麗敏曾發表過幾乎完全相同的內文：「吳濁流寫《無花果》最重要的意義，便是希望下一輩的知識份子能從「二二八事件」終（筆者按：中）獲取歷史的教訓，避免重蹈他那一代知識份子所犯的重大錯誤——對父祖之國的虛無縹緲的幻想…把父祖之國的統治者當作臺灣的解放者與救世主，一旦父祖之國的統治者，以大軍壓境的姿態君臨臺灣時，臺灣人才發現他們所熱烈期待與迎接的不是上帝的十字軍，而是比凱撒更殘暴的征服者」。邱麗敏，《二二八文學研究——戰前出生之台籍作家對「二二八」的書寫初探》（新竹：國立新竹師範學院進修暨推廣部教師在職進修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語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03年6月），頁72-73。依發表時間來看，邱麗敏的描述應是參考林衡哲的內容而來。

²⁴⁷ 盧欣怡，《吳濁流小說中的臺灣社會》（台北市：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北市：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7月），頁89。

²⁴⁸ 同上註，頁102。

採取與《無花果》同樣體裁的《臺灣連翹》，其內容除了前九章是補充《無花果》中有關臺灣人受日本統治下的血淚情況外，然從第十章起的記述臺灣光復至第十四章交代完他創辦《臺灣文藝》的經過為止，之中有關於二二八事件及其後續發展狀況的記錄與檢討，已從《無花果》中寬容的建言，一變而成嚴厲的控訴，《無花果》和《臺灣連翹》之寫作時間相隔僅僅四年，何以筆觸會產生如此大之差異，這點筆者認為似可由《臺灣連翹》後半部中所深具批判的措詞中，據以分析而得知。²⁴⁹

而後褚昱志依《台灣連翹》第十章之後的內容，指出二二八事件的背後成因，並對國民政府發出控訴。內容包括「國民黨在台各派系的鬥爭內幕」、「列舉實例，指控二二八事件中濫殺無辜的真相」、「揭露濫殺台灣精英的背後動機」以及「指控陳誠實施的惡劣政策」等²⁵⁰。可見褚昱志也將焦點放置在二二八事件的討論中。

而洪英雪在〈論二二八小說的對話性〉一文將吳濁流、鍾肇政、李喬與廖清秀等人的作品一同放置在二二八事件的背景中討論。其中提出吳濁流的《無花果》與《台灣連翹》皆為二二八事件的重要史料：

吳濁流《無花果》被認為是第一篇記述二二八事件的長篇小說，本書濃厚的自傳性質與留存真相的寫作目的使其真實性極受肯定，多種二二八專書都曾引述書中的見聞。²⁵¹

二二八事件無疑是台灣歷史的一個重要符碼，不同時代、不同階級、族群賦予它不同的意義。吳濁流《無花果》《台灣連翹》即使將時空遠拉至日治，目的也在為二二八事件鋪陳。²⁵²

依內容來看，《無花果》與《台灣連翹》確實描寫了官方史料之外的二二八事件，為後人提供了二二八事件相關的研究資料。然而兩書敘述二二八事件的內容有著明顯的篇幅差異。《無花果》僅有一章內容涉及二二八事件，《台灣連翹》共有四章涉及二二八事件，兩書敘述二二八事件的內容皆佔整書不到三分之一的篇幅²⁵³。因此，洪英雪指出的兩書為二二八事件而寫的說法，忽略了兩書所描述的戰前內容，戰前戰後的連結亦是必須考量的部份。

²⁴⁹ 褚昱志，《吳濁流及其小說之研究》（台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5月），頁196-197。

²⁵⁰ 同上註，頁197-204。

²⁵¹ 洪英雪，〈論二二八小說的對話性〉，收於《第二屆苗栗縣文學·耀日明月·研討會論文集》（苗栗：苗栗縣文化局，2004年12月），頁171。

²⁵² 同上註，頁175。底線為筆者所加。

²⁵³ 《無花果》以第十章至第十二章鋪陳戰後初期的台灣社會，真正涉及二二八事件的只有第十三章。而《台灣連翹》則僅以第十章鋪陳戰後初期的台灣社會，第十一章至第十四章集中探討二二八事件。由對二二八事件的描述來看，《台灣連翹》應為延續《無花果》而寫。

造成上述研究集中討論二二八事件的原因，應是由《無花果》與《台灣連翹》中的敘述而來：

回顧我走過的人生路程雖然平凡，但也逢上了幾個歷史上的大事件。第一次大戰，臺灣中部大地震，第二次大戰，臺灣光復，二二八事件等便是。前四事已有很多文獻與記錄，我想用不著我再費心了。然而，其中，對於二二八事件，卻不能不有所反省。……在二二八事件已過去二十年的今天，忘卻的固然不少，也有無論如何不能忘懷的，仍留在我的記憶中。我想追憶著這些不能忘懷的心影，把我所見所聞的二二八事件的真相率直地描寫出來。²⁵⁴

我在『無花果』裏只寫到二二八事件，以後的事沒有勇氣繼續詳細寫下。即使有這勇氣，也不會有發表的勇氣，因為把二二八事件的時候出賣了本省人的半山的行為誠實地描述下來，那麼我不但必受他們懷恨，而且還大有遭他們暗算之虞。話雖如此，但是如果不把二二八事件的事寫下來，則我的著作『無花果』與『瘡疤集』之間缺少有力的作品，時間上有了空白，不免自覺有所不滿。平心而言，二二八事件後的民國三十六年起至民國三十九年初這段時間，是社會最亂的期間，最多光怪陸離的事件。此事若不寫，便是功虧一簣了。為此，我寫下了『無花果』的姐妹篇『臺灣連翹』，以為『無花果』之續，填滿上述的空白。²⁵⁵

正如文中強調的揭露二二八事件真相的寫作動機，再加上解嚴後出版與言論的解禁，研究者開始將焦點放置在戒嚴時期無法碰觸的「二二八事件」，形成研究趨勢。

正如上述所言，礙於當時政治環境影響，吳濁流為延續《無花果》中未觸及的部份因而寫作《台灣連翹》，可知比起《無花果》，《台灣連翹》必定記錄更多戒嚴時期無法碰觸的內容。吳濁流在《台灣連翹》中即清楚說明兩部回憶錄的相異之處：

後來，我擔任大陸新報的記者，在大陸度過一年三個月的歲月。其間嚐過了種種遭遇，但這些故事已在拙作「亞細亞的孤兒」和「無花果」中詳細記述過，所以不在此處重覆，只記述些另一面的事。²⁵⁶

²⁵⁴ 吳濁流，《無花果》，頁 33-34。底線為筆者所加。

²⁵⁵ 吳濁流，《台灣連翹》，頁 241。底線為筆者所加。

²⁵⁶ 同上註，頁 104-105。

也就是說《台灣連翹》與《無花果》雖然同為記載吳濁流親身經歷的自傳，但是含有不一樣的內容，而這「另一面的事」在前行研究中僅被解讀為「增加與二二八事件相關的內容」。以上研究都指出《無花果》與《台灣連翹》的重要性在於揭露了二二八事件的真相，但是卻沒有討論到兩書除了二二八事件的內容之外的其他部份，也就是未提及記錄戰前的內容。然而閱讀後發現，《無花果》與《台灣連翹》敘述大陸生活的內容中也存在著與戰前作品不同的描寫，而這些內容並未被列入前行研究的分析中。筆者認為戰前的大陸經驗亦是構成吳濁流戰後作品的思想的重要成因，因此必須比照戰後描寫與戰前描寫之間的差異，釐清差異內容之中的含意。

第二章中筆者曾談及吳濁流擔任汪精衛政府相關之社會線記者一事，由此推斷吳濁流的大陸經驗中必定接觸不少汪政府的相關人士。而第三章中筆者曾敘述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關係，以及日方扶持汪精衛成立南京汪政府等事件。戰前吳濁流離開南京後返回台灣，處於仍隸屬日本政府統治之下的台灣，將所發表的《南京雜感》中與汪精衛政府的相關描述均賦予「正面評價」。然而中國國民黨與汪精衛政府之間的對立情形²⁵⁷，使得這些內容在戰後刊登時呈現了與戰前完全相反的「負面評價」，這樣弔詭的情形成因為何？另一方面，與戰前作品的相同描述中，戰後作品的用字遣詞也顯得不同，這樣的現象顯現在《台灣連翹》與戰前作品的差異中。為何相同的內容卻在不同時期發表的文本中呈現著完全相反的評價？《台灣連翹》增加的內容有何含意？以下將陸續展開討論。

首先是回憶錄相同內容中的增加情形。同樣描寫大陸經驗的內容中，《台灣連翹》出現了《無花果》中沒有的人物，而這些人物的身份幾乎都與南京汪精衛政府、重慶國民政府或軍警單位相關，這些描述顯示著台籍知識份子赴大陸就職的現象，以及背後包含的政治立場問題。例如敘述戰前的第七章中黃自強與蘇曉雲的經歷：

由於每週必須去兩三趟警察廳採訪報導資料，所以每一個課長都很熟悉。第四課是特高課，而課長是臺灣人，名叫蘇曉雲。但我們彼此都裝着不知情而沒有說出自己是在臺灣人。據說這個人以思想問題而在臺北高等學校就讀時，遭到中途退學處分。²⁵⁸

不久，我聽到師範時代的同班同學黃自強（奇敏）從重慶跑出來的消息。我向章君打聽的結果，據說他為了隱藏臺灣人的身分，避開所有的臺灣人。黃自強從師範畢業後，五年的義務服務期滿後，就悄悄地渡過大陸，

²⁵⁷ 關於汪精衛與中國國民黨間的對立情形及汪精衛與蔣中正相悖的政治路線等內容，請參考本論文第三章第一節〈《南京雜感》的發表情形與刪略特點〉。

²⁵⁸ 吳濁流，《台灣連翹》，頁 115。

然後在中國學校讀了幾年書，參加外國留學考試、及格，進入日本的陸軍大學。畢業後回到中國，現在已經官拜陸軍少將，和日本軍閥戰鬥。據說黃君和汪偽政權的顧問影佐上校（按：影佐禎昭），是陸軍大學時代的同學。由於這個緣故，上了影佐上校的釣餌，才從重慶逃出來。²⁵⁹

由描述蘇曉雲的內容與描述黃自強的內容，可整理出台籍人士戰前大陸經驗的三個共通點，一是在大陸生活時「隱藏台灣人身份」一事，二是都在台灣受殖民地教育後前往大陸，三是工作性質（擔任警察或軍人）或行走路線皆與戰事（或政治）相關。以上共通點皆與吳濁流本人經歷相似（擔任社會線記者亦與戰事相關），可說是於日本殖民末期前往大陸的台籍知識份子的一致性。然而這之中存在的立場與身份問題，呈現著台籍知識份子前往大陸生活後的矛盾性。

後來黃君（按：黃自強）當了江蘇省主席，日本無條件投降後，被指為漢奸，於是東藏西躲，狼狽不堪地逃回臺灣來，然後隱藏過去的身分，混入「接收臺灣」的集團，從事接收烏日製糖工廠。…直到現在，我依然不懂黃君脫離重慶，投奔汪偽政權的真正心意。像黃君一樣，臺灣人的去就，實在是複雜的，有從重慶跑出來的人，也有身處汪偽政權而又參加抗日陣線者。²⁶⁰

由此得知戰爭時期的黃自強原本為重慶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與日方戰鬥）之軍人，後來改變立場，轉而投靠南京汪精衛政府。戰時的「重慶國民政府」與「南京汪政府」是完全對立的立場，黃自強何以有如此大的轉變？吳濁流指出原因是「上了影佐上校的釣餌，才從重慶逃出來」。在此必須釐清此段話中提及的影佐上校的身份，以明瞭此段描述所呈現的立場轉變現象。此段話中的影佐上校，指的正是日本指派協助汪精衛政府成立事宜的日本軍官影佐禎昭。影佐禎昭（1893-1948），日本陸軍中將，中日戰爭時期由日本政府派遣至中國，前後擔任了參謀本部謀略課長、陸軍省軍務課長等職，曾與今井武夫、高宗武、梅思平一起在上海虹口簽訂《日華協議記錄》（中日和平關係條例），協助汪精衛政府的成立²⁶¹。1939年3月21日國民黨特務闖入汪精衛在越南河內的住家進行襲擊，造成秘書曾仲鳴身亡，史稱「河內刺汪」²⁶²。「河內刺汪」事件發生後，1939年3月為保護汪精衛的安全日方指派影佐禎昭至越南河內，協助汪精衛前往上海²⁶³。

²⁵⁹ 同上註，頁 105-106。

²⁶⁰ 同上註，頁 107。

²⁶¹ 今井武夫，《日中和平工作 回想と証言 1937-1947》（東京都：みすず書房，2009年3月25日），頁 65-74；黃美真，張云編，《汪精衛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頁 304-312。

²⁶² 徐吉村，《地下戰場：戰時重慶國民政府與汪政權的暗鬥》（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1月），頁 19-33；蔡德金，王升編著，《汪精衛生平紀事》，頁 257。

²⁶³ 今井武夫，《日中和平工作 回想と証言 1937-1947》，頁 66、83；黃美真，張云編，《汪精衛集團投敵》，頁 462、475。

影佐亦參與「興亞院」(日本為集中統一對中國佔領區的統治、扶持汪政權成立、處理佔領區的經濟問題等事宜所設立的機構²⁶⁴)的事務。以上內容清楚顯示影佐禎昭為汪精衛政府立場的人士，因而明瞭吳濁流所述之「上了影佐上校的釣餌」的意思(即戰時黃自強受影佐禎昭的影響而轉變立場，脫離了重慶國民政府)。

關於戰前兩方立場的內容，亦延續至戰後初期對國民政府官員的內容中。吳濁流於《台灣連翹》敘述戰後初期的第十章中指出：

由於對抗戰勝利有功，從重慶回來的臺灣人頓成英雄受到重用，於是黃朝琴、謝東閔、劉啟光分別被任命為臺北市長、高雄縣長、新竹縣長。另外，長官公署各處副處長中若干位，以及物資局副局長，也啟用了重慶歸客的本省人。²⁶⁵

如果黃奇敏(自強)不是從重慶轉向到汪政權，這一刻的臺北市長說不定不是黃朝琴，而是黃自強。²⁶⁶

透過以上描述可釐清二點：一是黃自強在戰爭時期的立場轉變(由重慶國民政府立場轉向南京汪精衛政府立場)；二是戰後初期的國民政府官員正是戰時的「重慶國民政府」²⁶⁷的相關人員。因此可以明瞭吳濁流為何說若是黃自強並未轉向投靠汪政府，或許會因為重慶國民政府的立場而受到重用。此情形說明了戰後初期來台擔任官員的台籍人士，幾乎是由戰前在大陸時，處於重慶國民政府(蔣中正為首的中國國民黨)立場的人士。不過吳濁流指出的黃自強在終戰時「隱藏過去的身分，混入『接收臺灣』的集團」一事，也說明戰時任職南京汪政府的台籍人士中亦有加入「接收台灣」工作，而於戰後初期返台的現象。

在黃自強的描述中，進一步可思考的是戰前南京汪政府與戰後來台的國民政府(戰前重慶國民政府)之間的關係。觀看《台灣連翹》描述戰後初期的第十章至第十四章內容(即前行研究所指的二二八事件相關內容)，吳濁流對這些戰後

²⁶⁴ 1938年12月成立的「興亞院」共包含四個連絡部與一個出張所，分別為「華北連絡部」(位於北京)、「蒙疆連絡部」(位於張家口)、「華中連絡部」(位於上海)、「廈門連絡部」(位於廈門)與「青島出張所」(位於青島)。影佐禎昭參與的應為1939年3月10日於上海成立的「華中連絡部」，此時間正逢汪精衛由河內前往上海，文獻亦記錄汪精衛政府的成立與其政策的調整是「華中連絡部」的重要事務。本庄比佐子，內山雅生，久保亨編，《興亞院と戦時中国調査》(東京都：岩波書店，2002年11月28日)，頁6-10、38；「興亞院」任職官員之資料：秦郁彥編，《日本官僚制総合事典1868-2000》(東京都：東京大學出版會，2001年11月1日)，頁28。

²⁶⁵ 吳濁流，《台灣連翹》，頁157。底線為筆者所加。

²⁶⁶ 同上註。

²⁶⁷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國民政府(蔣中正領導)因日軍逼近南京，故於11月20日將根據地由南京遷往重慶，史稱「重慶國民政府」，或簡稱「重慶」、「重慶方面」。李雲漢，《中國近代史》(台北市：三民書局，2005年3月增訂二版)，頁425。

擔任政府官員的「重慶歸客」(戰前處於重慶國民政府立場，並於戰後返台的台籍人士)，提出許多批評：

他們(按：台灣人)是挨了曾經以無上的榮耀心情迎接的來客(按：來台接收台灣的國民政府)一記猛擊，而且這一擊還是不亞於日本官憲的殘酷。不僅如此，曾經被視為民族英雄，崇敬有加的返自重慶的半山們，竟也和外省人沆瀣一氣，出賣了本省人。²⁶⁸

半山們(按：於戰後初期由重慶國民政府返台擔任政府官員的台籍人士)冒出來了，取得了代表本省人的地位，加上二二八事件出賣本省人有功，遂躍上政治舞台上的主峰地位。這些半山們和外省人勾結，形成了新的貪污官僚社會。半山曾是與政府之間的橋樑，如今本省人再也不敢信賴他們了。²⁶⁹

半山們從大陸回來，為了私利私欲而出賣本省人，以求得高官厚祿。²⁷⁰

綜合上述南京汪政府與重慶國民政府兩方人員的描述來看，即呈現了《台灣連翹》戰前至戰後初期內容之延續：

| 時間 身份 | 戰前(1945年之前) | 戰後初期(1945年之後) |
|----------|-------------|---------------------------|
| 台籍人士 | 重慶國民政府人員 | 國民政府官員 |
| 台籍人士 | 南京汪精衛政府人員 | 1、加入接收台灣工作返台者 2、被視作漢奸者 |

而對照第三章所梳理的汪精衛政府與蔣中正為首的國民政府的內容來看，更能清楚瞭解兩方由戰前延續至戰後的對立情形，亦能明瞭戰前大陸生活中台籍人士所面臨的立場問題之原由。如同黃自強的例子，台籍人士前往大陸後，選擇的立場通常以就讀學校或任職單位來決定，且立場也可能在後來受戰事或他人影響而出現轉變，顯然這些描寫不可能出現在戰前的文本中。依戰爭時期的狀況來看，這類選擇汪政府立場而被冠以「漢奸」罪名並遭到殺害的台灣人不在少數²⁷¹，

²⁶⁸ 吳濁流，《台灣連翹》，頁 208。

²⁶⁹ 同上註，頁 223。

²⁷⁰ 同上註，頁 242。

²⁷¹ 例如劉吶鷗於 1940 年在上海遭到槍殺身亡，據傳與他當時擔任汪精衛政府機關報《國民新聞》的社長與偏向日方立場等因素有關。「新聞電稿的後文是這樣的：『……據悉，被擊者名劉吶鷗，年約四十，福建人，曾任電影導演，嗣投入日方與黃逆天始等合組中華影片公司，代日統制華中區電影事業，更不顧廉恥，甘心賣心，加入日本國籍。彼現任所謂國民新聞社長及所謂中國新聞學會滬分會理事等職。』」；「依據同書上記載，同年十月廿九日，在重慶國泰戲院舉行重慶政府國民黨文化工作委員會時，同席的史東山導演站在台上說明關於電影

且此情形並不只出現在台籍人士身上，《台灣連翹》中同時也記載了一些在戰爭時期（或戰後初期）被視為的「漢奸」或因政治關係而遭到殺害的大陸官員，如李士群、蘇成德等，這些內容同樣只在戰後回憶錄中出現：

至於李士群，只在集會的演講中看過，並不曾直接見過面，他以特高官階的身分握有全國的警察大權，非常活躍。但是，他卻以重慶的反間諜罪名而被日方毒殺；首都警察廳長蘇成德，是個曾經留學蘇俄的身體魁梧的山東大漢。…進入大東亞戰爭後，我以為這種人可能會逃往重慶，但戰爭結束後，他也以漢奸罪名而被處極刑。²⁷²

早在汪精衛政府成立之前，李士群已進入日人扶持的汪精衛政府特務委員會，協助汪精衛政府的成立。1940年汪精衛政府成立時，李士群擔任特工總部主任及警政部副部長之職位，逐漸成為汪政權中掌握大權的重要人物，而後於1943年9月因權力問題遭到汪政府與日方合謀毒殺²⁷³。上述可知李士群曾於汪精衛政權中擔任重要角色，遭毒殺一事更涉及汪政府與日方，關於戰爭時期政治立場的選擇問題，在戰前被視為敏感議題，可以理解為何並未寫入戰前的文本中。此外，這些內容皆涉及了戰前的重慶國民政府（正為戰後接收台灣的中國國民黨），且因為戒嚴法導致這些內容直至解嚴後才能順利發表，因此僅出現在解嚴後出版的《台灣連翹》中。這樣的現象明顯與出版時的社會背景有關。

其次，是相同內容中所出現的相異評價。對照《台灣連翹》與戰前書寫的《南京雜感》原文，清楚呈現著對南京汪精衛政府及相關人士評價的差異。相同人物的描寫中，《南京雜感》均以「正面評價」敘述，但寫於戰後的《台灣連翹》卻出現了「負面評價」的內容。針對汪精衛政府的相關人士，《台灣連翹》有以下描述：

也許汪精衛是一個傑出的人吧，但他的周圍，可以說完全沒有人才。雖然有林伯生（按：林柏生）這個人，但也不能算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汪夫人的妹婿褚民誼是個「好好先生」，老是主張唸佛而有「大孩子」的綽號，而事實上正如綽號，像是一個大孩子。…當他擔任外交部長時，我曾經跟他見過一面。他的發音，土音濃重而令人厭惡。汪夫人陳璧君對國事雖然熱心，但她的近親陳家一派，除了長於貪污外，什麼才能都沒有。²⁷⁴

工作的情況，最後他用後續的話題作為結論：『我們電影製作者中連續出現了出賣祖國的叛逆者。劉訥鷗是用我們的手射殺的，他是叛逆者的代表，此事對於叛逆者是嚴厲而殘酷的教訓。』。康來新、許秦蓁合編，《劉訥鷗全集：增補集》（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10年7月），頁313-314、323。

²⁷² 吳濁流，《台灣連翹》，頁113-115。

²⁷³ 徐吉村，《地下戰場：戰時重慶國民政府與汪政權的暗鬥》（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1月），頁15-18、90-115。

²⁷⁴ 吳濁流，《台灣連翹》，頁110-111。底線為筆者所加。

我奉大陸新報之命，代表贈送日本某畫家畫的周佛海的肖像畫，曾經到過周公館。他是日本京都大學經濟系的畢業生，態度相當驕傲，連招呼也不打。如果我是日本人，他的招待必定慇懃吧。²⁷⁵

我雖然沒有直接與丁默邨談過話，但在許多次的開會中見過他。他的外貌顯得衰弱，風采不揚而像個丑角似的。像這種人會是個「部長階級」，不由得令人連（筆者按：聯）想到汪偽政權本身，也不過是個丑角罷了。²⁷⁶

維新政府的主席梁鶴志（按：梁鴻志），…雖然他的外表不由得使人感到是個大官，但不能給人新的、進取的感受，也就是沒有具備一種能收拾目前局勢的力量，只是令人感到他是一個過去的人物。²⁷⁷

…陳群這個人，對於這個人的善於吹牛皮，真使我驚訝萬分。…有一天，我和中澤一塊兒去訪問他。談話中，他始終沉醉在自我宣傳裏，最初雖然令我覺得很有趣，但一直聽下去以後，不由得令人發生懷疑，最後再也無法聽下去而只好急忙告辭回家了。²⁷⁸

《台灣連翹》對這些人物的評價與《南京雜感》中所述一褚民誼是位虔誠的佛教徒、個性敦厚；周佛海是位面貌姣好的男子；陳群是位喜好飲酒的豪邁詩人；梁鴻志是位漢詩人、為人親切且擁有長者風範²⁷⁹—等正面評價並不相符，也就是戰後作品出現了戰前沒有的負面評價內容。以上這些相同人物中存在的完全相反的評價，與其說是改寫，筆者更認為應是不同的寫作時間點中所存在的不同視角所造成。從戰前內容一致的正面評價到戰後內容一致的負面評價，清楚地顯現戰前與戰後對於同樣內容的角度有著非常明顯的區隔。由此可得知吳濁流於兩個不同時間中的寫作角度並不相同。同樣的狀況由其他內容的比較中也可看出。

除了人物的評價不同之外，對日本的評價也是相反的情形。《台灣連翹》中如此寫道：

在大多數的日本人眼中，並沒有他人的存在。連中國人存在的意識都沒有，只有傲慢的侵略意識在氾濫着，他們為了想把中國大陸塗成如同日本一樣的顏色，絞盡了不少腦汁，花了不少心血。當然在這些日本人當中，

²⁷⁵ 同上註，頁 111。底線為筆者所加。

²⁷⁶ 同上註，頁 113。底線為筆者所加。

²⁷⁷ 同上註，頁 113。底線為筆者所加。

²⁷⁸ 同上註，頁 115-116。底線為筆者所加。

²⁷⁹ 相關內容請參考本論文第三章第一節〈《南京雜感》的發表情形與刪略特點〉。

也有品格高尚的反日本軍閥，但只是些沒有權勢的知識份子而已。²⁸⁰

想到我們本來同是中國人卻不能用中國話交談而必須使用日語，這應歸咎於日本殖民政策。…現在的臺灣人，和失去父母的孤兒一樣，在重慶這一邊也好，汪偽政權這一邊也好，都同樣被視為「異己份子」，不僅不信任臺灣人，甚至視為間諜。這可以說是日本離間政策的結果。²⁸¹

上述對於日本的殖民行為以「侵略」來形容，並將台灣人身份與立場模糊一事歸咎於日本的殖民政策，帶有批判日本的意味，此視角與第三章敘述戰前作品時所呈現的殖民地知識份子的優越感相當不同，可見《台灣連翹》與戰前作品確實存在不同的描寫視角。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無花果》中，對照相同的南京生活內容，戰後所寫的《無花果》在描寫協力戰爭的內容中增加了「幼稚」一詞：

到了南京，觸目所見都是菜園、桑園、墓地以及湫隘的巷路，尤其「和平反共建國」、「建設東亞新制序」、「擁護汪主席」等牆上標語特別刺目。這種幼稚的標語有什麼用處，我實在不懂，但覺一種異常感而已。²⁸²

《南京雜感》原文的同樣內容：

抵達南京後首先印入眼簾的是乘著汽車順著這條路線前進的光景。菜園、桑園、墓地以及髒亂的道路。尤其是路邊牆上書寫著的「和平反共建國」、「建設東亞新制序」、「擁護汪主席」等一平方公尺大的標語，特別引人注意。²⁸³

《無花果》中以「幼稚」一詞表達不認同標語的想法，《南京雜感》則僅以「特別引人注意」一句話帶過，顯現戰前作品《南京雜感》與戰後作品《無花果》的不同之處。

除了上述戰前、戰後的描述差異外，將《台灣連翹》與《無花果》一起觀看後，亦出現了用字遣詞上的差異。首先在敘述人物時，《台灣連翹》大多直接寫出全名與職稱，《無花果》則單以姓氏稱呼人物。例如敘述任職汪精衛政府的彭先生時，《台灣連翹》直接寫出全名彭盛木，而《無花果》則以彭參事或彭氏稱

²⁸⁰ 吳濁流，《台灣連翹》，頁 103。

²⁸¹ 同上註，頁 106。

²⁸² 吳濁流，《無花果》（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88 年 8 月），頁 124。

²⁸³ 原文：「着甯早々目に映るものは実に此の間を自働車で縫って行く光景で野萊畑、桑畑、墓場及びごみごみした路次ばかりでそれに一平米位の文字で『和平反共建國』『建設東亞新制序』『擁護汪主席』等の壁書が特に目立って見えるのであった」。吳濁流，〈南京雜感〉，《臺灣藝術》第三卷第十一號（昭和 17 年／1942 年 11 月 1 日發行），頁 29。

呼²⁸⁴。而在用字遣詞方面，《台灣連翹》在提及汪精衛政府時皆以「汪偽政權」稱呼²⁸⁵，符合了戰後國民政府對戰時汪精衛政府的稱呼（國民政府不承認汪政權，故加以「偽」字稱呼），《無花果》中則沒有加上「偽」字，只以「汪政權」稱呼，顯示《台灣連翹》以國民政府角度而寫的特點。然而實際上《台灣連翹》在內容上卻大肆地批評了戰後初期的國民政府官員，對照用字遣詞上符合國民政府的立場這點來看，形成了弔詭的現象。綜合上述分析，進一步可思考的是，作品寫作與發表時受政府與政策的影響之處，以及這些內容所呈現的含意。

單就記載大陸經驗的內容來看（《無花果》第八章及《台灣連翹》第七章），與戰前作品內容相比，《南京雜感》、《胡志明》與《無花果》三者內容的重疊性極高，《台灣連翹》則略為不同。從增加的人物評價與戰前人物的政治立場等內容來看，《台灣連翹》的大陸經驗內容偏重於南京汪精衛政府的相關描寫，並對汪政府採取負面評價。而就記載戰後初期的第十章至第十四章來看，吳濁流在敘述黃朝琴等俗稱「半山」的國民政府官員的內容中，呈現著強烈的批判：

五月一日（按：1946年），成立第一屆臺灣省參議會，會上眾望一致推舉林獻堂為議長，卻因政治壓力，不得不把議長讓給國民黨的黃朝琴，副議長則由青年黨的李萬居出任。從這個結果來看，議長的選舉成了國民黨導演的把戲。黃氏做為御用議長，是百分之百有效的，但若說反映民意，則一無是處。他一意向政府阿諛諂媚，執行其「御用」任務。每有議員攻訐貪官污吏，他便說：「你們還不習慣這個，以後習慣了，便不算回事了。」不但不能代表民意，還助長不法。官員們於是有恃無恐，更加腐敗。黃氏所以如此，是有目的的。他要發國難財，樹立政治班底以鞏固自己的地位。他身上只有一件西裝，兩手空空從大陸回來，如今卻成為千萬富翁，他的財產在半山中屈指可數。²⁸⁶

游彌堅是總督府國語學校出身，從大陸回來當初，把恩師劉克明和張福興祭在神壇上尊崇有加，並接下了正在照顧劉克明先生的國師（國語學校師範部）同窗會會長的職務，自任會長，號令國師出身的同窗同學。他還當上了教育會的理事長，指揮全島的教員。二二八事件時，他不擇手段地去

²⁸⁴ 「彭參議是苗栗三義人，以前是『同文書院』的教授，後來汪偽政權成立，就進入財政部，擔任周佛海的秘書」、「有一天，彭盛木參議的太太悄悄地來找我，他一看到我便告訴我說她的丈夫竟被指為重慶的間諜而被捕了」。吳濁流，《台灣連翹》，頁 104、107；「彭氏是同文書院的教授，汪政權成立時即被攬為財政部參議」、「有一天財政部的彭參事太太來訪，偷偷地告訴我丈夫涉嫌重慶間諜，在上海被捕，並商量對策」。吳濁流，《無花果》，頁 126、137。底線皆為筆者所加。

²⁸⁵ 如：「我一到南京，就投訴在同學章君的家裏。章君自稱廣東客家，在汪偽政權的宣傳部服務」；「直到現在，我依然不懂黃君脫離重慶，投奔汪偽政權的真正心意」；「汪偽政權的特務頭目是李士群，李是周佛海的部下」等描述。吳濁流，《台灣連翹》，頁 104、107、108。底線皆為筆者所加。

²⁸⁶ 吳濁流，《台灣連翹》，頁 167。底線為筆者所加。

維護自己的地位。事件後，他為了謀取國難財而發揮其奇才。市長任內，將日產變造，讓屬下「榎健」放領，大大地撈了一票，尤其陳誠就任台灣省主席後，是他的巔峰時期，屬於他的一夥，沒有一個不是發了大財。²⁸⁷

其他批判對象還包含連震東、劉啟光、林頂立等²⁸⁸，吳濁流批判的這些對象皆是戰前重慶國民政府立場的台籍人士，他們皆在戰後初期返台擔任國民政府的官員。透過這些內容可以說明，吳濁流相當無法諒解這些官員的所作所為，呈現了負面批判。文本內容清楚顯示著吳濁流對國民政府的想法，只有描述的用字遣詞符合著國民政府的立場（同國民政府稱呼戰前的汪政府為「偽政權」），實際內容上則是呈現著對國民政府官員的批判，這些描述才是吳濁流欲表達的真實想法。

以上對照也可說明，在戒嚴時期（1949-1987）發表的《台灣連翹》第七章採「汪偽政權」的稱呼，應是受戒嚴等政治力量影響下的寫法，而在解嚴（1987）後才出版第十章至第十四章，是無法發表於戒嚴時期並表達吳濁流真實想法的內容，如此也可推測吳濁流選擇以日文寫作《台灣連翹》的原因，正與批判戰後國民政府的內容有關（迴避政治力干涉）²⁸⁹。這樣的現象顯示著出版品確實受到社會政策影響的情形，尤其是寫於戒嚴期間（1949-1987）、內容涉及批判當權政府的作品，為迴避政治力量的干涉，無法立即發表（或發表後遭到政府的查禁，無法繼續刊行）的情形。

《無花果》與《台灣連翹》兩部在六〇、七〇年代完成的作品，除了代表呈現作家生命經驗的「回憶錄」外，這些再現的內容是否帶有其他的含意？此點是解讀戰後大陸經驗再現的核心問題。上述分析皆說明戰後回憶錄內容多出對戰時汪精衛政府的主觀評判（吳濁流在戰後才得以發表自己對汪政府人士的真正觀感），這是戰前作品不會出現的部份。然而這些內容均帶有與寫作當時的執政者同一立場的情形，符合當時的社會導向（同理可證，戰前文本對汪精衛政府均採正面評價，如1942年至1943年發表的《南京雜感》）。這些「評價」取決於寫作當時的政權立場，因此可以理解上述歸納的增加與改寫的內容，為何只出現在戰後回憶錄中。

然而，在這樣的寫作模式下隱含的是符合政權立場下作者欲表達的真實想法。《台灣連翹》中以符合國民政府立場的用詞撰寫大陸經驗與戰後初期的台灣，

²⁸⁷ 同上註，頁195。底線為筆者所加。

²⁸⁸ 相關描述請參考：吳濁流，《台灣連翹》，頁193-196。

²⁸⁹ 褚昱志也指出，迴避政治問題也是吳濁流為何選擇以日文寫作《台灣連翹》的原因：「在這裏，也終於讓我們瞭解，為何吳濁流在《無花果》中，凡涉及此事件（筆者按：二二八事件）之人物，皆只以姓氏帶過。而在寫《臺灣連翹》時，又要以日文起草，又要遺言留待十年二十年後出版，除避政治之諱外，怕受被點名到的半山們報復，當亦為重要之因」。褚昱志，《吳濁流及其小說之研究》（台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5月），頁203。

然而實際閱讀後發現，這些內容卻呈現著批判國民政府的内容，顯示著文本内容才是吳濁流的真實想法，文本中的用字遣詞只是為了符合政府的要求而寫。戰後出版的《南京雜感》中譯本也呈現了一樣的情形（於戰後戒嚴期間出版的《南京雜感》中譯本，必須刪除戰前撰寫的原文中對汪精衛政府的正面評價内容²⁹⁰）。以上分析顯示，吳濁流的作品在出版時，因為受到不同的政權立場影響，僅能刊登符合當時政權立場的内容。

另一方面，以文本情節來看，回憶錄與戰前作品的重疊性相當高。例如協助吳濁流前往大陸的友人章君（與《胡志明》中協助胡志明前往大陸的曾君相似）、教導吳濁流中文的女教師、勞動階層（阿媽、乞丐與人力車夫）與南京火車上巧遇的女性等，以上回憶錄中出現的人物與相關情節皆與《南京雜感》及《胡志明》的内容有所重疊，因此閱讀回憶錄時，讀者自然容易將小說《胡志明》理解為吳濁流親身大陸經驗的投射，以及將《胡志明》（即《亞細亞的孤兒》）、《無花果》與《台灣連翹》視為三部連續性作品的想法。正如陳芳明所言：

吳濁流的精神流亡，並沒有隨日本殖民統治的結束而告終；他的幻滅感，也沒有因為《亞細亞的孤兒》完稿而停止。他後來寫出的《無花果》與《台灣連翹》，無疑是在延續第一部長篇小說的原鄉失落。也就是說，定居於台灣土地的他，縱然沒有像日據時代那樣漂泊於日本與中國，然而他所承受的精神流亡與肉體流亡，在戰後仍然無止無盡地衍傳下去。²⁹¹

也就是說，《無花果》與《台灣連翹》兩部回憶錄加強了吳濁流戰前大陸經驗的完整性，也因内容的重疊性，使得帶有虛構性質的小說《胡志明》也被視為解讀吳濁流大陸經驗的文獻，此點是回憶錄出版後導致的現象。相較於戰前稀少的大陸經驗文本，戰後回憶錄的出現確實補足了研究資料的缺乏。綜合上述所言，「加強戰前記錄的完整性」與「藉由回憶錄表達戰前無法書寫的部份」²⁹²兩點是吳濁流戰後回憶錄的鮮明特徵，這也是回憶錄「再現」大陸經驗的重要含意。

第三節、小結

第三章中筆者已整理戰後中譯本所刪除的戰前原文内容，並分析這些内容所傳達的思想。本章延續第三章内容，分別以戰後初期的小說與六〇、七〇年代出版的回憶錄内容，分析戰後作品中增加與評價相異的情形及延續戰前作品的狀

²⁹⁰ 相關討論請參考第三章第一節〈《南京雜感》的發表情形與刪略特點〉。

²⁹¹ 陳芳明，〈吳濁流的自傳體書寫與大河小說的企圖〉，收於陳芳明，《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台北市：麥田出版社，2007年），頁252。

²⁹² 在此筆者指的是論文第95-97頁及99頁所述之戰前台籍人士在大陸轉換政治立場以及遭暗殺的大陸官員李士群的内容。因為增加了這些戰前無法書寫的部份，可證實戰後初期來台之「國民政府」官員正是戰前「重慶國民政府」立場之人士（第97-98頁）。

況，試圖釐清戰後大陸經驗再現的原因。首先是戰後初期的作品，以《波茨坦科長》為討論對象。戰後初期的作品因為以戰後初期的台灣作為故事背景，且寫作時間點正逢 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因此前行研究多將這時期的文本集中在對「戰後初期來台的國民政府」的討論，忽略了吳濁流在戰前已擁有實際的大陸經驗，形成將「戰前」與「戰後初期」分開討論的情形。不過在對照文本內容後可以發現，無論在人物塑造上或是文本情節上，《波茨坦科長》與戰前寫作的《南京雜感》及《胡志明》有著很大的雷同，《波茨坦科長》中所呈現的大陸觀感有著延續戰前作品的傾向。前行研究中時常將《波茨坦科長》中玉蘭對范漢智逐漸消逝的感情視作戰後初期台灣人對外省人的感受，藉以反映戰後初期台灣人對國民政府的失望與幻滅。透過文本的對照，顯示《波茨坦科長》中玉蘭與范漢智的描寫是直接複製了《胡志明》中胡志明與淑春的描寫，可見吳濁流的大陸觀感並非戰後初期才出現（應是受 1941 年至 1942 年大陸經驗影響而來），因此「戰前」與「戰後初期」的文本應該連結來看。

而兩部回憶錄《無花果》與《台灣連翹》，均採「回憶」形式再次撰寫大陸生活。雖然同樣描寫大陸生活，但部份內容與戰前作品的描述有所不同。《台灣連翹》完成後，吳濁流所強調的第九章之後的內容必須留待十或二十年後發表一事，前行研究均將此點解讀為因內容涉及二二八事件背後成因之敏感性所造成。與《波茨坦科長》的情形一樣，對於《無花果》與《台灣連翹》兩部回憶錄，前行研究也將焦點放置在「二二八事件」的相關討論中，而未見針對回憶錄中戰前內容的討論。然而《無花果》與《台灣連翹》在敘述日本殖民時期的內容中也存有與戰前作品不同的部份。正如上述整理的相異評價，相同的內容因為寫作時間不同而產生了差距，戰前文本的內容與戰後回憶錄內容幾乎呈現了相反的視角（由正面評價變成負面評價），最大的因素正是在於寫作時所處的不同社會（政權）狀況。而這樣情形隱含著符合政權立場的內容中吳濁流欲表達的真實想法。以符合國民政府立場的用詞所撰寫的情節中，卻呈現著批判國民政府的內容，顯示著文本內容才是吳濁流的真實想法，而用字遣詞只是為了符合政府的要求而寫。另一方面，戰前與戰後所考慮的因素也不同，戰前必須考量社會仍處於日本殖民時期的狀況，而戰後出現可以批判南京汪精衛政府的機會，但在戒嚴時期又同時有著無法批判國民政府的矛盾點，這與《胡志明》在戰後出版時必須刪除原文中涉及中國共產黨或汪精衛政府正面評價的內容一事是一樣的原因，這是社會與政權帶來的影響。寫作時的社會狀況是閱讀回憶錄時需注意的重要問題，也是解讀時造成歧異的最大原因。

另一方面，關於前行研究集中討論二二八事件的現象，亦可透過其他戰後初期作品的刊登情形理解其原因。吳濁流在 1948 年 9 月寫了〈臺灣文學的現況〉一文，此文講述台灣由日本殖民時期到戰後初期的文學狀況。吳濁流敘述日本殖民時期出現的皇民文學及台灣青年發行的雜誌遭查禁等現象，指出日文文學曾一

度萌芽，而後卻因為中日戰爭的爆發而逐漸衰微。戰後初期則是受社會環境影響，台籍作家必須為生活奔波而無法專心在文學上，而後因為日文書籍的禁止令，無法再發展日文文學，日文文學因而隨之衰微。因此在台籍作家精通中文之前，很難有好作品的產生。此篇評論亦被收入在戰後出版的評論集中，以中譯刊出²⁹³，然而於 1949 年發表在日本的《雄鷄通信》雜誌上時，出現了在台灣出版時沒有的內容：

這之後（筆者按：指戰後初期／1946 年國民政府頒布禁止日文書籍的政策之後）發生了二二八事件，這個影子（筆者按：指日文文學萌芽的影子）越來越稀薄。加上書籍的價格與一般物價相同地變得異常昂貴，這個時候不只日文連中文書籍也無法發刊。二二八事件的影響並不是只有日文書籍而已，人心惶惶不安的情形下，文學再度被捨棄、無暇被顧及的狀況持續著。²⁹⁴

上述引文為穿插於戰後初期文學狀況的內容。以發表時間來看，1949 年在日本發行的內容應是吳濁流最初的寫作版本。這段未被譯出的內容，是與二二八事件相關的描寫。以中譯本的出版時間來看，1977 年仍為台灣戒嚴時期，二二八事件尚為無法發表的內容，因此可以理解此段內容為何遭到中譯本刪除。在日本發表時可直接刊出「二二八事件」，在台灣則無法將此段譯出，此現象也說明一直到解嚴前台灣的出版內容都必須受政權影響的情形，這也是集中討論戰後作品後可釐清的部份。

²⁹³ 吳濁流，〈臺灣文學的現況〉，收於吳濁流，《吳濁流作品集(5)黎明前的台灣》（台北市：遠行出版社，1977 年 9 月初版），頁 135-139。

²⁹⁴ 原文：「さらにその後二・二八事件があり、その影はますます薄くなっていった。加ふるに書籍の価格は一般物價とともに著しく騰貴したので、このごろでは日文のみでなく中国文書籍もほとんど発刊されない状態である。二・二八事件の影響は独り日文書籍ばかりでなく、人心が恟々として落着かぬため文学は再びすてて顧みられない状態がつづいた」。吳濁流，〈臺灣文学の現況〉，《雄鷄通信》第五卷第一号（東京：雄鷄社，1949 年 1 月），頁 14。

第五章 結章

本論文以吳濁流 1941 年至 1942 年之大陸經驗為主軸，透過四〇年代之社會背景與吳濁流大陸經驗之相關作品，分析大陸經驗對吳濁流思想的影響。本論文依序透過 1941 年至 1942 年的《大陸新報》、戰前作品《南京雜感》與《胡志明》、戰後初期小說《波茨坦科長》，以及戰後回憶錄《無花果》與《台灣連翹》共六個文本，討論吳濁流的大陸生活，並釐清吳濁流戰前至戰後的思想連結，繼而補足前行研究的不足之處。研究成果可歸納為下列幾點：

一、吳濁流戰前作品所呈現的大陸經驗

本論文的第二章與第三章主要集中於梳理吳濁流 1941 年至 1942 年實際的大陸生活，透過《大陸新報》、《南京雜感》與《胡志明》中大陸經驗的相關篇章印證吳濁流於大陸生活中所產生的思維。首先透過部份台籍作家的大陸經驗的梳理，觀看四〇年代大東亞共榮圈之背景與吳濁流於南京的記者生活。

第二章中筆者列舉了不少台籍作家的大陸經驗，如二〇年代前往大陸的張深切（1923 年至 1927 年：上海到廣州；1938 年至 1946 年：北京）與劉訥鷗（1926 年至 1940 年：南京與上海）。三〇年代前往大陸的王詩琅（1937 年至 1946 年：上海到廣東）、鍾理和（1938 年至 1946 年：北京）、江文也（1938 年至 1983 年：北京）等人。其中共通的「上海經驗」是值得注意的現象。早在二〇年代即出現台籍作家的上海經驗，不少前往上海留學的台籍作家曾成立「上海臺灣青年會」，在此地匯聚交流，而在三〇年代亦有楊肇嘉等人相繼前往上海。正因為上海身為「租界」的特點而成為中西文化的匯流之處，使得電影等文化事業蓬勃發展（有著「文化」上的吸引力），並逐漸成為「新聞中心」。以上皆是「上海」成為文化人匯集之地的原因，這也使得部份台籍作家選擇上海作為大陸生活的第一站或最後一站。

簡言之，無論是上海、台灣，及上述作家前往的東北、北京與南京等地，皆在戰爭時期被歸於日方推行的「大東亞共榮圈」的範疇下。而台籍作家在前往大陸後，由於「被殖民者」的身份與通曉日語的優勢，通常為受雇於日本政府或從事與日語相關的工作。如王詩琅（1937 年受軍事派遣前往大陸，又於 1938 年擔任《廣東迅報》的編輯）與劉訥鷗（1940 年擔任汪精衛政府的機關報紙《國民新聞》的社長）的例子。而吳濁流 1941-1942 年任職的《大陸新報》（上海為其

發行地)亦與日方有著密切的關係。

吳濁流任職的《大陸新報》是受日方主導的報紙。本論文亦整理了《大陸新報》的相關文獻，顯示其官方位置。《大陸新報》(THE TAIRIKU SHIMPO)為中日戰爭期間日本政府於設於大陸的重要官方報紙。從昭和 14 年(1939 年)1 月 1 日創刊開始，至昭和 20 年(1945 年)9 月為止，共刊行 7 年時間。總社位於上海，發行人為上野祝二，社長為福家俊一，南京支局長為西島五一。除了總社上海外，《大陸新報》在武漢、南京、漢口等地甚至是東京皆設有支社。由《大陸新報》的官方位置與吳濁流 1942 年至 1943 年發表於《臺灣藝術》上記載汪精衛政府重要人士的文章，可推測吳濁流於《大陸新報》擔任社會線記者的事實，及撰寫南京汪精衛政府相關報導的可能性。由此觀點出發，筆者以表格列舉《大陸新報》上可能為吳濁流撰寫的篇章。在經過比對後，筆者於《大陸新報》的報導中發現了與吳濁流《南京雜感》內容一致性相當高的篇章，這些篇章發表時間正為吳濁流於南京擔任記者的 1941 年，且部份篇章以「南京支社」之名發表。例如報導「國民黨第四回全國中央委員會會議」、「國民政府委員一同至中山陵參拜國父陵墓」與「褚民誼轉任外交部長」等文章。透過這些紀錄汪精衛或汪精衛政府相關人員的文章，可得知吳濁流應為負責汪政府相關事務的社會線記者。本論文整理的《大陸新報》的刊登情形與篇章等內容，均是吳濁流的前行研究未涉及的部份。

觀看吳濁流的〈南京雜感〉原文(1942-1943)可發現，有六篇文章未被收錄於戰後出版的《南京雜感》中譯本中。這些文章皆紀錄了吳濁流對汪精衛與汪精衛政府中擔任要職的重要人士之接觸與觀感，分別是汪精衛、褚民誼、周佛海、陳群、梁鴻志、張永福。另外收錄於中譯本《南京雜感》的篇章中，也有刪除《南京雜感》原文中描寫汪精衛的內容的現象。這些遭刪除的內容共通點在於均涉及了汪精衛政府，並對他們採以正面評價。而刪去南京汪政府的相關敘述後的《南京雜感》中譯本，僅呈現南京街景、人物等生活記錄的描寫，此情形造成使用中譯本的前行研究在分析時將《南京雜感》視為「遊記」或「旅行文學」的範疇來討論。

而《胡志明》中記載大陸生活的第三篇〈悲戀之卷(大陸篇)〉亦存在戰後中譯本刪除原文內容的情形。對照後顯示，戰後通行的中譯本《亞細亞的孤兒》完全是依照 1956 年於日本發行的《アジヤの孤兒》內容翻譯而來，除了刪除部分內容外，相同的情節也具備同樣的改寫情形，中譯本內容已不是 1943 至 1945 年間吳濁流最初寫作的版本。因此筆者以《胡志明》原文作為主要分析對象，嘗試還原吳濁流最初的寫作內容並加以分析，梳理吳濁流於這些內容中所表達的大陸觀感。

首先透過文本描繪的上海與南京的街景、生活模式與生活觀念以及接觸底層人物的情節等，討論這些內容以「負面」呈現的含意。回歸原文後發現，文中已清楚寫明吳濁流的價值觀是受台灣的殖民地／日式教育所影響，實際的大陸生活卻與吳濁流自身的價值觀產生極大的衝突。「髒亂」、「馬馬虎虎」的南京，與日式教育傳達的「整潔」、「秩序」等觀念相悖，導致他以「殖民地知識份子的優越感」（帶著與日本同居高位的視角）來觀看大陸事務。另一方面，吳濁流受長輩傳達的中國觀念影響，而對中國傳統事物抱持著美好的想像與憧憬，此處顯示他的中國印象在童年時期就已形成。而在實際接觸大陸後，發現大陸既無法符合心中的（日式）價值觀，又與長輩給予的優美印象有所不同，心中所抱持的美好想像也隨之破滅，這正是吳濁流對南京事物採以負面描寫的理由。

而吳濁流亦透過對街景及生活模式等負面描寫，帶出自己對大陸的批判與憂心。例如以南京乞丐、隨意排泄行為及三大娛樂（麻將、聚餐、看戲）等描述，闡述對於貧困問題（貧富不均）、階級問題、衛生問題以及女性解放議題的想法。另一方面，穿插於胡志明與淑春的戀愛過程中的內容以及胡志明與友人的談話情節也遭刪除。吳濁流在胡志明與淑春兩人出遊的情節中加入胡志明抒發對中國想法的內容，例如以「混濁的湖水」形容中國社會的現狀，並以「清澈的水池」意指在台灣的生活。指出大陸因為習慣了這樣混濁的生活模式也沒有改善現況的心態，並且之後也會繼續這樣生活下去的想法。透過這些內容表達的是吳濁流自身對社會現狀的反思與擔憂。

而《胡志明》第三篇中刪除篇幅最多的部份，是涉及「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內容。例如胡志明友人曾君對國民黨左翼的批評，曾君提到以知識份子為代表的「國民黨左翼」份子，對帝國主義的壓迫深感痛心，雖然擁有反抗的意識但卻沒有實力。而另一位友人張參事提出的文字、文學的「普及化、大眾化」論點，正與中國共產黨成立之文藝組織「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中瞿秋白、魯迅等人所提倡的「文藝大眾化」觀念相符。由此得知，關於中國國民黨的內容其實早在戰前寫作的《胡志明》中就已出現，因為中譯本未收錄這些內容，導致前行研究必須以《無花果》等戰後文本來分析吳濁流對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的看法。

統合以上刪除情形，在《南京雜感》原文方面，未被收錄於《南京雜感》中譯本的文章與文句皆有「南京汪精衛政府」相關內容的共通點，且這些內容都賦予南京汪精衛政府「正面評價」。而《胡志明》中遭到刪除的內容則是對「中國國民黨」的批判與涉及「中國共產黨」的相關內容。透過筆者第三章第一節所述之戰後執政的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與汪精衛（及其政府）之間的内容，可理解這些內容遭刪除的原因。也就是說，對戰後執政的「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來說，「南京汪精衛政府」與「中國共產黨」都是敏感且不想觸及的議題，因而導

致相關內容未被收錄於戰後中譯本，因此研究者無法閱讀得知。

二、吳濁流戰後作品與大陸經驗的連結

本論文的第四章探討戰後文本與大陸經驗的連結性。部份於戰後才執筆的作品同樣收錄戰前大陸經驗的內容，將第三章中回歸原文後所呈現的大陸觀感連結至戰後觀看，即可發現戰前作品與戰後作品的連結。另一方面，雖為敘述同一段大陸經驗，然而這些於戰後「再現」的內容卻與戰前的描述有著評價上的差異，透過差異的內容亦可觀看政治因素對作家寫作所造成的影響。

首先是戰後初期作品《波茨坦科長》延續戰前作品思維的現象。吳濁流以「戀愛關係」來影射台灣對大陸的感情。對照後可以發現，《波茨坦科長》中玉蘭與范漢智的角色塑造完全複製了《胡志明》中胡志明與淑春的角色，呈現了「范漢智對照淑春、玉蘭對照胡志明」的描寫模式。例如《胡志明》中描述胡志明到大陸時對大陸女性的憧憬，與《波茨坦科長》中玉蘭對大陸來台的男性的憧憬如出一轍。相似的情節也出現在玉蘭與范漢智從戀愛到婚後的內容中。《胡志明》中胡志明與淑春兩人從戀愛的甜蜜到婚姻生活的摩擦，呈現強烈的對比。而《波茨坦科長》中玉蘭與范漢智的情形也是一樣，且兩人（玉蘭與胡志明）在對丈夫與妻子感到失望後，都有憶起婚前愛慕對象的情形。兩人的愛慕對象都設定為日本人，呈現著「懷念昔日的日本人，後悔選擇大陸人結婚」的想法，用以指涉台灣人對日本及大陸的感受。

吳濁流站在台灣人的角度（玉蘭、胡志明），敘述對大陸人（范漢智、淑春）由憧憬到幻滅的過程。其中以婚姻生活來影射台灣與大陸實際接觸後所顯現的衝突，來延續在戰前大陸經驗中對大陸的實際感受。身為受過殖民地日式教育的台灣人的玉蘭與胡志明，實際生活中發現了雙方的價值觀的差異，讓胡志明對淑春、玉蘭對范漢智大失所望。此處出現的「價值觀差異」正與戰前作品中吳濁流所敘述的不適應大陸生活的內容一致，也就是說吳濁流將戰前大陸帶給自己的衝突感置換為「男女關係」書寫，顯現在玉蘭對范漢智的失望之情中，可以說《波茨坦科長》的內容延續著吳濁流實際的大陸觀感，也說明了吳濁流的大陸觀感是依戰前實際的大陸經驗而來，並非戰後初期才形成。

吳濁流六、七〇年代的兩部回憶錄《無花果》與《台灣連翹》，也描寫了戰爭時期的大陸經驗，然而由於寫作時間距離大陸經驗相隔二十年以上，再加上寫作時的社會環境／政權已與戰前不同，雖然與戰前作品敘述的是同一段大陸經驗，但存在著內容上的差異。例如戰後回憶錄出現了戰前文本沒有的內容，即記載了戰爭時期台籍人士的立場轉換現象（由重慶國民政府立場轉至南京汪精衛政

府立場的現象)，以及因為政治關係（因親近日方被認定為漢奸）遭殺害的大陸官員等描寫。這類涉及中日戰爭與政治力量的敏感內容顯然不可能出現在戰前的文本中。再者，相同人物的描寫也因為寫作時間的不同而產生了差距，在敘述南京汪精衛政府時，戰前文本與戰後文本呈現了相反的視角（由正面評價變成負面評價），此點說明作品受政權等背景影響，發表了符合當時政權立場的內容（戰前日本政府執政時，吳濁流發表對汪精衛政府的正面評價內容；而到了戰後中國國民黨執政時，吳濁流發表對汪精衛政府的負面評價內容）。

另一方面，回憶錄中出現的人物與情節與戰前寫作的《胡志明》重疊性相當高，因此閱讀回憶錄時，讀者自然容易將帶有虛構性質的小說《胡志明》視為吳濁流親身經驗的投射，這是回憶錄出現後導致的現象。可說回憶錄的出現加強吳濁流戰前大陸經驗記錄的完整性²⁹⁵。統合以上內容，「加強戰前記錄的完整性」與「藉由回憶錄表達戰前無法書寫的部份」²⁹⁶兩點是吳濁流戰後回憶錄的鮮明特徵，這也是回憶錄「再現」大陸經驗的重要含意。

三、總結吳濁流的大陸經驗與作品

吳濁流作品的出版時間幾乎集中於戰後且內容涉及年代甚廣，1987年解嚴後，隨著「二二八事件」與台灣意識等研究趨勢的高漲，吳濁流的作品被放置在此脈絡下大量解讀，形成前行研究偏重探討孤兒文學、認同、民族等議題，也影響吳濁流戰前「大陸經驗」的研究焦點。例如《無花果》與《台灣連翹》因為記載了「二二八事件」的相關內容而被歸類為探討「二二八事件」的文獻，《波茨坦科長》則被歸類為探討戰後初期（二二八事件前）之台灣社會的重要文本，三書呈現了一致的研究重心。顯示著前行研究偏重型塑戰後初期社會及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對國民黨政府的批判，但是都未提及文本中的大陸經驗相關內容，形成將戰前與戰後分開觀看的情形。

透過戰前作品至戰後作品的討論，顯示了「大陸經驗」由戰前至戰後對吳濁流的影響。台灣因政權轉換帶來的轉變，統一將「1945年」作為歷史時期的分界點，而文學研究也普遍以「1945年」作為分水嶺，形成將「戰前」與「戰後」分開討論的情形。然而就本論文的作品比對來看，顯示著這樣的分界並不符合作品本身的真正含意。吳濁流不僅在戰前撰寫記錄大陸經驗（1941-1942）的作品，在戰後作品中也有著延續的內容，可見「戰前」與「戰後」的思維是一脈相承的。

²⁹⁵ 然而必須注意的是，就文本內容來看戰後回憶錄內容呈現與戰前作品「立場相反」的情形。如此說來，不同時間寫作的文本，即使情節相似，卻也可能因寫作當時面臨的不同的社會狀況而呈現不同的走向。因此無法完全以戰後作品來解讀戰前的大陸生活，還是必須回歸戰前作品觀看。

²⁹⁶ 參註 292。

雖然作品的出版必定受政權等時代背景的影響，但作家的思維不應以歷史時期作為界線完全分割。換句話說，透過戰前至戰後文本的分析觀看吳濁流的思想連結，這也是本論文的研究核心。

而透過原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雖然吳濁流在台灣生活時受到種種不公平的對待（例如擔任教職時發覺上層未對日台教師一視同仁對待），可推測他應該未對日本產生認同，然而吳濁流在書寫時卻彰顯出自己的日式價值觀。例如戰前文本呈現的「負面描寫」，《南京雜感》與《胡志明》中描述南京街景的內容，顯現吳濁流抱持著殖民地知識份子的優越感，也就是帶有與日本同居高位的視角來觀看大陸。雖然身為一位「被殖民者」，卻在抵達大陸後以「如同殖民者」的角度來觀看大陸事物，導致他在敘述大陸時多含有貶意。最初吳濁流因為受不了日本殖民下的台灣生活而選擇前往大陸，但在短暫的大陸生活中顯現的卻是他對日式生活的認同，其中他以「清澈的水」來形容台灣、以「混濁的水」來形容大陸的內容就是最好的證明（他思考的「清澈的水」是處於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²⁹⁷。內化了日式價值觀與對日式生活的認同，是他長久生活於日本殖民的台灣社會下無法避免的結果。

也許對吳濁流來說，這一年又三個月的大陸生活太過短暫，在還沒來得及觀看大陸全貌之前，他心中那童年時期就形成的中國優美印象就因眼前髒亂又不堪的南京街景而抹滅了。他在抵達大陸後以日式價值觀來檢視心中美好的中國印象，正顯現他受雙重教育（長輩口授漢學、殖民地日式教育）的雙重影響。那樣看似矛盾卻又同時存在的兩方，由他的童年時期（傳統漢學）至求學階段（日式教育）重疊存在，這也是日本殖民社會下的台籍知識份子普遍面臨的交混狀態（不僅是中國認同或台灣認同如此的二分法而已）。

文學是時代的產物，作家亦可能因各種理由改變作品的表現方式，而吳濁流的作品立場幾乎符合著發表當下的政治立場。筆者認為吳濁流並非因為不同政權的執政而改變了自身的認同，而是選擇了一條可以安身立命的路來保護他的著作（例如他在戰後使用日文寫作《台灣連翹》，並交代後人有關二二八事件的章節須待他逝世後再發表）。這或許正印證吳濁流自述的個性（明哲保身、夾縫性格），是他面對不同時代、不同政權立場的應對之道。這或許與前人給予的吳濁流形象不太相同，也是藉由大陸經驗的分析而看到的吳濁流的另一個樣貌。

²⁹⁷ 另外像是《胡志明》與《波茨坦科長》中的台灣人胡志明與玉蘭，都在與妻子／丈夫產生衝突後憶起昔日暗戀的日本人，顯現後悔選擇大陸人結婚的想法，含有「懷念日本」的意味。

參考資料

(以下按出版年排序)

一、吳濁流文本

- 吳濁流，《夜明け前の台湾》(台北市：學友書局，1947年6月14日)。
- 吳濁流，〈臺灣文学の現況〉，《雄鷄通信》第五卷第一号(東京：雄鷄社，1949年1月)，頁14。
- 吳濁流，《藍園集》(苗栗：英才印書局，1949年8月20日)。
- 吳濁流，《アジアの孤兒》(東京都：一二三書房，1956年4月15日)。
- 吳濁流，《歪められた島》(東京都：ひろば書房，1957年6月1日)。
- 吳濁流，《風雨窗前》(苗栗：文獻書局，1958年5月12日)。
- 吳濁流著，楊召愨譯，《孤帆》(高雄市：黃河出版社，1959年6月)。
- 吳濁流著，傅恩榮譯，黃渭南校閱，《亞細亞的孤兒》(台北市：南華出版社，1962年6月)。
- 吳濁流，《談西說東》(台北市：臺灣文藝雜誌社，1969年4月)。
- 吳濁流，《泥濘》(台北市：林白出版社，1971年11月1日)。
- 吳濁流，《夜明け前の台湾——植民地からの告発》(東京都：社會思想社，1972年6月15日)。
- 吳濁流，《泥濘に生きる——苦悩する台湾の民》(東京都：社會思想社，1972年11月30日)。
- 吳濁流，《アジアの孤兒——日本統治下の台湾》(東京都：新人物往来社，1973年5月25日)。
- 吳濁流，《吳濁流選集(小説)》(台北市：廣鴻文出版社，1966年12月)。
- 吳濁流，《吳濁流作品集(1)亞細亞的孤兒》(台北市：遠行出版社，1977年9月初版)。
- 吳濁流，《吳濁流作品集(3)波茨坦科長》(台北市：遠行出版社，1977年9月初版)。
- 吳濁流，《吳濁流作品集(4)南京雜感》(台北市：遠行出版社，1977年9月初版)。
- 吳濁流，《吳濁流作品集(5)黎明前的台灣》(台北市：遠行出版社，1977年9月初版)。
- 吳濁流，《吳濁流作品集(6)台灣文藝與我》(台北市：遠行出版社，1977年9月初版)。

-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台北：遠景出版社，1980年3月）。
- 吳濁流，《無花果》（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88年8月）。
- 彭瑞金編，《吳濁流集》（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1年7月初版）。
- 吳濁流，《台灣連翹》（台北市：草根出版社，1995年7月）。
- 錢鴻鈞編，黃玉燕譯，《吳濁流致鍾肇政書簡》（台北市：九歌出版社，2000年5月）。
- 吳濁流著，黃玉燕譯，《亞細亞的孤兒》（新竹：新竹縣文化局，2005年）。
- 吳濁流，《胡志明》、《ポツダム科長》複刻本。河原功主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集成 30：吳濁流作品集》（東京都：綠蔭書房，2007年6月）。

二、報紙、雜誌

- 金丸裕一監修，《大陸新報》複刻本（東京都：ゆまに書房，1939-1945年）。
- 黃宗葵主編，《臺灣藝術》（台北市：臺灣藝術社發行，1940-1943年）。
- 黃克正發行，黃金穗主編，《新新》第一期至第八期（台北市：新新月報社，1945年11月20日-1947年1月5日）。《新新（覆刻版）》（台北市：傳文文化出版社，聯經出版社總經銷，1995年）。
- 《臺灣文藝》（台北市：臺灣文藝雜誌社，1964-1976年）。
- 《廣東迅報》（廣東：廣東迅報社，1942年10-12月、1943年5-12月、1944年1月）。

三、專書

（中文）

- 高蔭祖編，《中華民國大事記》（台北市：世界書局，1957年10月10日）。
-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一）》（台北市：三民書局，1970年7月三版）。
-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二）》（台北市：三民書局，1970年7月三版）。
- 蔣永敬，《胡志明在中國：一個越南民族主義的偽裝者》（台北市：傳記文學出版社，1972年）。
- 魯迅，《魯迅全集第七卷·集外集拾遺》（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
- 桂崇基著，沈世平譯，《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台北市：臺灣中華書局，1973年2月）。
- 呂新昌，《鐵血詩人吳濁流：吳濁流的奮鬥人生》（台北市：臺灣文藝出版；聯臺文物發行，1984年初版）。
- 黃美真，張云編，《汪精衛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
- 蔡德金編註，《周佛海日記（上）（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7月）。

- 陳鐵健等編，《瞿秋白研究文集》（北京：中共黨史料出版社，1987年12月）。
- 雷鳴著，葉參、陳邦直、黨庠周合編，《民國叢書第一編 88 歷史·地理類 汪精衛先生傳 鄭孝胥傳》（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第一版）。
- 彭瑞金編，《鍾理和集》（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1年7月初版）。
- 周永祥，《瞿秋白年譜新編》（上海：學林出版社，1992年8月）。
- 蔡德金，王升編著，《汪精衛生平紀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6月第一版）。
- 秦紹德，《上海近代報刊史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年7月）。
- 《口述歷史第五期一日據時期台灣人赴大陸經驗》（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編輯委員會，1994年6月30日）。
- 《口述歷史第六期一日據時期台灣人赴大陸經驗》（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編輯委員會，1995年7月30日）。
- 林繼文，《日本據台末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係之研究》（台北：稻鄉出版社，1996年3月）。
- 鍾理和，《夾竹桃》（高雄：派色文化，1997年）。
- 楊碧川編，《臺灣歷史辭典》（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7年8月初版一刷）。
- 許俊雅，《臺灣文學論：從現代到當代》（台北市：南天書局，1997年10月）。
- 陳芳明、張炎憲、邱坤良、黃英哲、廖仁義編，《張深切全集（卷1）里程碑—又名：黑色的太陽（上）》（台北市：文經出版社，1998年1月）。
- 陳芳明、張炎憲、邱坤良、黃英哲、廖仁義編，《張深切全集（卷11）北京日記·書信·雜錄》（台北市：文經出版社，1998年1月）。
- 垂水千惠著，涂翠花譯，《台灣的日本語文學》（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8年2月）。
- 陳義芝主編，《臺灣現代小說史綜論》（台北市：聯經出版社，1998年12月）。
- 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北市：揚智，1998年5月）。
- 許育銘，《汪兆銘與國民政府：1931至1936年對日問題下的政治變動》（台北：國史館，1999年初版）。
- 施正鋒，《台灣人的民族認同》（台北市：前衛出版社，2000年）。
- 葉榮鐘，《台灣人物群像》（台中：晨星出版社，2000年）。
- 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台北：稻鄉出版社，2000年7月）。
- 朱棟霖、丁帆、朱曉進主編，張堂錡審訂，《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 上冊》（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2000年9月初版）。
- 林柏燕主編，《吳濁流百年誕辰紀念專刊》（新竹：新竹縣文化局，2000年12月）。
- 薛月順，曾品滄，許瑞浩主編，《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一）從戒嚴到解嚴》（台北：國史館，2000年12月25日）。
- 梁華璜，《台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研究—日據時代台閩關係史》（台北：

稻鄉出版社，2001年3月)。

- 王克文，《汪精衛·國民黨·南京政權》(台北：國史館，2001年12月)。
- 林莊生、葉光南、葉芸芸主編，《葉榮鐘全集 6—葉榮鐘日記(上冊)》(台中：晨星出版社，2002年3月31日)，頁175、205、218-222。
- 中村孝志著，卞鳳奎譯，《中村孝志教授論文集——日本南進政策與臺灣》(台北：稻鄉出版社，2002年4月)。
- 梁華璜，《臺灣總督府南進政策導論》(台北：稻鄉出版社，2003年1月)。
-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台北市：允晨文化，2003年2月)。
- 王詩琅著，張良澤編，《臺灣文學重建的問題》(台北市：海峽學術，2003年)。
- 呂新昌，《吳濁流及其小說創作理念》(台北市：前衛出版社，2003年3月)。
- 張良澤編，《王詩琅選集第八卷—臺灣人物表論》(台北市：海峽學術，2003年6月)。
- 湯淑敏、蔣兆年、葉喃主編，《瞿秋白研究新探》(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12月)。
- 藍博洲編，《吳濁流的西湖歲月》(苗栗：苗栗縣西湖鄉公所，2004年3月)。
- 李雲漢，《中國近代史》(台北市：三民書局，2005年3月增訂二版)。
- 竹內好著，孫歌譯，《近代的超克》(北京市：三聯書店，2005年3月)。
- 甘懷真、貴志俊彥、川島真編，《東亞視域中的國籍、移民與認同》(台北市：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12月)。
- 陳芳明，《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台北市：麥田出版社，2006年1月二版)。
- 荊子馨(Leo T.S. Ching)著，鄭力軒譯，《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台北：麥田出版社，2006年)。
- 卞鳳奎，《日據時期台灣籍民在大陸及東南亞活動之研究(1895-1945)》(合肥：黃山書社，2006年5月)。
- 張靜茹，《上海現代性·臺灣傳統文人——文化夢的追尋與幻滅》(台北：國立編譯館主編、稻鄉出版社印行，2006年9月)。
- 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四冊》(台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年10月)。
- 張小紅，《左聯與中國共產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
- 陳萬益主編，陳千武、林至潔、葉笛譯，《龍瑛宗全集(中文卷)第五冊 評論集》(台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年11月)。
- 李歐梵著，毛尖譯，《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 1930-1945(增訂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6年)。
- 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 增訂版(上)》(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

- 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 增訂版(下)》(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
- 諫山春樹著，日本文教基金會譯，《秘話・台灣軍與大東亞戰爭》(台北市：英堂，2007年8月)。
- 何義麟，《日本語在台灣・韓國・沖繩做了什麼？》(台北市：致良出版社，2008年2月)。
- 陳翠蓮，《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一九二〇～一九五〇》(台北市：遠流出版公司，2008年8月)。
- 張仲禮主編，《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840-1949年)》(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8年8月再版)。
- 石一寧，《真實的追問——吳濁流的文學・思想・人格》(台北市：人間出版社，2008年10月)。
- 胡俊熊，《胡志明生平考》(台中市：白象文化出版社，2008年11月)。
- 陳紅旗，《中國左翼文學的發生 1923-1933》(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7月)。
- 康來新、許秦蓁合編，《劉吶鷗全集：增補集》(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10年7月)。
- 阮斐娜著，吳佩珍譯，《帝國的太陽下——日本的南方及台灣殖民地文學》(台北市：麥田出版社，2010年9月)。
- 封德屏總策畫，張恆豪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02】吳濁流(一九〇〇～一九七六)》(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1年3月)。

(日文)

-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 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会運動史》(台北市：南天書局，1939年7月初版)。
- 尾崎秀樹《旧植民地文学の研究》(東京都：勁草書房，1971年6月30日)。
- 《朝日新聞社史(大正・昭和戰前篇 1912-1945)》(東京：朝日新聞社，1995年7月25日)。
- 秦郁彥編，《日本官僚制総合事典 1868-2000》(東京都：東京大學出版會，2001年11月1日)。
- 本庄比佐子，內山雅生，久保亨編，《興亞院と戦時中国調査》(東京都：岩波書店，2002年11月28日)。
- 西野嘉章編，《プロパガンダ 1904-1945 新聞紙・新聞誌・新聞史》(東京都：東京大学総合研究博物館，2004年5月14日)。
- 古厩忠夫，《日中戦争と上海、そして私——古厩忠夫中国近現代史論集》(東京都：研文出版，2004年9月10日初版一刷)。
- 加藤聖文、谷ヶ城秀吉，《台湾總督府臨時情報部「部報」第10卷第113第124号／昭和十六年一月～六月》(東京都：ゆまに書房，2005年3月24日)。

- 日)。
- 高綱博文編，《戰時上海——1937~45年》(東京都：研文出版，2005年4月5日初版一刷)。
 - 中島利郎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小事典》(東京：綠蔭書房，2005年6月)。
 - 河原功《翻弄された台湾文学——検閲と抵抗の系譜》(東京都：研文出版，2009年)。
 - 今井武夫，《日中和平工作 回想と証言 1937-1947》(東京都：みすず書房，2009年3月25日)。

四、期刊論文、單篇論文

- 宋冬陽，〈朝向許願中的黎明——試論吳濁流作品中的「中國經驗」〉，《文學界》第10期(高雄：文學界雜誌社，1984年5月)，頁127-146。
- 黃娟，〈再讀「亞細亞的孤兒」〉，《文學界》第13期(高雄：文學界雜誌社，1985年2月)，頁162-174。
- 李獻璋編，《王詩琅先生信札集——其所反映的光復初期生活》，《臺灣風物》第三十五卷第三期(台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85年9月30日)，頁71-98。
- 黃得時，〈日據時期臺灣的報紙副刊——一個主編者的回憶錄〉，《文訊》第21期(台北市：文訊月刊雜誌社，1985年12月)，頁58-64。
- 梁華璜，〈「善鄰會設立計畫書」——台灣總督府之南侵計畫〉，《臺灣風物》第三十四卷第四期(台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85年12月31日)，頁63-74。
- 林衡哲，〈從吳濁流的文學作品看二二八事件〉，收於陳芳明主編，《二二八事件學術論文集：台灣人國殤事件的歷史回顧》(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89年7月15日)，頁161-177。
- 林柏燕，〈吳濁流的大陸經驗〉，封德屏主編，《鄉土與文學——「台灣地區區域文學會議」實錄》(台北：文訊雜誌社，1994年)，頁334-357。
- 林慶彰，〈當代文學禁書研究〉，封德屏主編，《50年來台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三)台灣文學出版》(台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文訊雜誌社編印，1996年6月)，頁193-216。
- 藍建春，〈胡太明的祖國經驗——《亞細亞的孤兒》中的國族想像、瓦解與再擬構〉，《水筆仔：台灣文學研究通訊》第二期(新竹：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97年4月)，頁4-19。
- 河原林直人著，鍾淑敏譯，〈關於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之檔案〉，《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26期(1998年9月)，頁128-138。
- 陳昭瑛，〈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中的儒學思想〉，陳昭瑛，《臺灣儒學：起源、發展與轉化》(台北市：正中書局，2000年3月初版)，頁289-320。
- 李郁蕙，〈吳濁流『アジアの孤兒』論——その地政学的配置とジェンダー〉，

- 《日本台湾学会報》第二号(東京都:日本台湾学会,2000年4月),頁13-24。
- 廖炳惠,〈旅行與異樣現代性:試探吳濁流的《南京雜感》〉,《中外文學》第29卷2期(2000年7月),頁288-312。
 - 吳叡人,〈意志之碑——為二二八事件五十四週年而寫〉,《聯合文學》第十七卷第六期(台北市:聯合文學雜誌社,2001年4月),頁97-103。
 - 劉孝春,〈試論《亞細亞的孤兒》〉,洪宜勇主編,夏潮聯合會、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主辦,《台灣殖民地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海峽學術出版社,2004年2月),頁357-377。
 - 洪英雪,〈論二二八小說的對話性〉,《第二屆苗栗縣文學·耀日明月·研討會論文集》(苗栗:苗栗縣文化局,2004年12月),頁168-187。
 - 趙夢雲,〈「中日文化協會」に関する初步的な考察——上海分会を中心に〉,《植民地文化研究:資料と分析(第4号)》(2005年7月),頁225-239。
 - 歐宗智,〈吳濁流身分認同的心靈轉折——合讀《無花果》與《台灣連翹》〉,《臺灣文學評論》第6卷第3期(2006年7月),頁21-27。
 - 洪英雪,〈一個歷史,各自解讀——二二八小說及其相關作品選集的多元論述〉,《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三期(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年10月),頁287-323。
 - 吳叡人,〈他人之顏:民族國家對峙結構中的「皇民文學」與「原鄉文藝」〉,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企畫編輯,《跨領域的台灣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年),頁257-309。
 - 河原功,〈吳濁流《胡志明》研究〉,《台灣文學學報》第十期(台北市: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秀威科技出版,2007年6月),頁77-110。
 - 張惠珍,〈紀實與虛構:吳濁流、鍾理和的中國之旅與原鄉認同〉,《台北大學中文學報》第3期(2007年9月),頁29-66。
 - 王學新,〈南進政策下的籍民教育(1895-1937)〉,《國史館學術集刊》第十四期(2007年12月),頁97-131。
 - 陳室如,〈日治時期台人大陸遊記之認同困境:以連橫《大陸遊記》與吳濁流《南京雜感》為例〉,《人文研究學報》第41卷第1期(台南:國立臺南大學,2007年),頁33-50。
 - 陳芳明,〈吳濁流的自傳體書寫與大河小說的企圖〉,陳芳明,《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台北市:麥田出版社,2007年),頁243-262。
 - 彭瑞金,〈解讀《亞細亞的孤兒》〉,《文學台灣》第68期(高雄市:文學台灣雜誌社,2008年10月),頁37-46。
 - 豊田周子,〈『胡志明』から『アジヤの孤児』へ—その改編をめぐって〉,《東洋文化研究》12号(東京: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2010年3月),頁33-65。
 - 崔末順,〈日據末期小說的「發展型」敘事及人物「新生」意義〉,2011年3月20日宣讀於「台韓青年學者工作坊——日本帝國文學與文化領域的重層

移動」，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舉辦。

- 戴國輝著，林彩美譯，〈吳濁流的世界〉，封德屏主編，《戴國輝全集 15【人物與歷史卷】》（台北市：文訊雜誌社，2011年4月），頁133-163。
- 戴國輝，〈我與吳濁流的交誼和他的墨寶〉，封德屏主編，《戴國輝全集 18【採訪與對談卷一】》（台北市：文訊雜誌社，2011年4月），頁247-251。

五、碩博士論文

- 林長河，《戰前日本南進政策之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年1月）。
- 翟筱芸，《吳濁流文學の研究—日本統治時代中国人作家の民族意識の考察を中心にして》（台北：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1983年12月）。
- 何義麟，《皇民化與政策之研究——日據時代末期日本對臺灣的教育與教化運動》（台北：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年6月）。
- 葉瓊霞，《王詩琅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年6月）。
- 褚昱志，《吳濁流及其小說之研究》（台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5月）。
- 朱家慧，《兩個太陽下的台灣作家——龍瑛宗與呂赫若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6月）。
- 井手勇，《決戰時期台灣的日人作家與「皇民文學」》（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7月）。
- 江智浩，《日治末期（1937-1945）台灣的戰時動員組織——從國民精神總動員組織到皇民奉公會》（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6月）。
- 林秀萍，《二十世紀上海租界文學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6月）。
- 李郁蕙，《台湾の日本語文学研究—脱周縁化の軌跡—》（日本：廣島大學教育學研究所日本言語文化教育學專攻博士論文，2000年3月）。
- 鄭麗玲，《臺北帝國大學在殖民地的建立與發展——以臺北帝國大學為中心》（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4月）。
- 徐千惠，《日治時期台人旅外遊記析論——以李春生、連橫、林獻堂、吳濁流遊記為分析場域》（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6月）。
- 邱麗敏，《二二八文學研究——戰前出生之台籍作家對「二二八」的書寫初探》（新竹：國立新竹師範學院進修暨推廣部教師在職進修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語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03年6月）。
- 蕭明禮，《戰爭與海運——戰時南進政策下台灣拓殖株式會社的海運事業》

(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6月)。

- 王惠珍，《龍瑛宗研究——台灣人日本語作家の軌跡》(日本：關西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中國文學專攻博士論文，2004年9月)。
- 徐吉村，《地下戰場：戰時重慶國民政府與汪政權的暗鬥》(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1月)。
- 林瑛琪，《夾縫中的文化人——日治時期江文也及其時代研究》(台南市：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年7月)。
- 陳室如，《中國近代域外遊記研究(1840-1945)》(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年6月)。
- 盧欣怡，《吳濁流小說中的臺灣社會》(台北市：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7月)。
- 李文卿，《共榮的想像：帝國日本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年1月)。

六、網路資料

- 山本武利，〈朝日新聞は自らの戦争責任をさらに検証すべし〉，2011/04/12 檢索自 http://www.yomiuri.co.jp/adv/wol/opinion/society_110328.htm
- 20世紀メディア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20th Century Media，〈朝日新聞の中国侵略〉，2011/04/25 檢索自 <http://www.waseda.jp/prj-m20th/magazine/magazine4/asahi.html>